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歐巴馬與川普政府美、日、韓三邊「準同盟」關係之研究
(2009-2019)

On the Trilateral Quasi-Alliance Relations Among the U.S. , Japan
and Korea during the Obama and Trump Administrations (2009-2019)

葉菀絨

Wan-Rong Ye

指導教授：徐斯勤 博士

Advisor : S. Philip Hsu , Ph.D.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October 2020



摘要



2009-2019 年間，隨著美國調整其外交政策，試圖鞏固並提升其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與影響力，連帶影響了其與東亞兩大盟國日本及南韓的同盟關係。學者車維德 (Victor Cha) 在 1999 年所提出的假說指出，當美國外交政策調整而影響其所給予盟國的安全承諾強度時，出現關係變化的不僅有美國與日、韓之間的同盟關係，更包括了日本與南韓之間特殊的「準同盟關係」，透過文獻分析法檢視與探討歐巴馬與川普兩位總統任期之中美國、日本、南韓之間的互動關係，本文將論證美國的安全承諾強度變化是否仍舊深刻影響著日本與南韓之間的雙邊關係，同時描繪三國同盟與準同盟關係中共同威脅認知產生變化的主因。本論文藉由與車氏的假說對話，探討其假說是否仍將適用於近十年及未來的美、日、韓三國互動關係。本論文發現，在共同威脅認知產生變化的情況下，車氏的假說之解釋力將下降。

關鍵詞：美國東亞外交、美日同盟、美韓同盟、日韓關係、準同盟

Abstract




During 2009 to 2019, the United States had adjusted its foreign policy in order to solidify its leading position and increase its influence in Asian-Pacific region. Such adjustment brought out impacts on its major allies in East Asia - Japan and South Korea. According to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of Victor Cha(1999), if the United States changes its foreign policy and affects the strength of security commitment toward its allies, not only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Japan/Korea will be altered, the “quasi-alliance” relation between Japan and Korea will also be influenced. Utilizing document analysis , the dissertation will analyze the triangular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Korea during the term of Obama and Trump, and argue that whether the strength of security commitment is still a prominent factor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 between Japan and Korea, with description on the major cause of the shifting cognition on common threat of the triangular alliance and the quasi-alliance. The dissertation explores Cha’s theory and investigates whether it can still appl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Japan-Korea interaction in the past decade and future ; the dissertation finds out that with the change of cognition of common threat, the explanation power of Cha’s theory may be undermined.

Keywords: U.S. Foreign Policy on East Asia, U.S.-Japan Alliance, U.S.-South Korea Alliance, Japan-South Korea relationship, Quasi-alliance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前言.....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3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8
第四節 研究變項與研究架構.....	9
第五節 文獻回顧.....	12
第六節 研究限制.....	24
第七節 章節安排.....	25
第二章 歐巴馬第一任期的美、日、韓關係	29
第一節 歐巴馬總統第一任期的東亞外交政策.....	30
第二節 美國與日本、南韓的同盟關係.....	34
第三節 日本與南韓關係.....	41
第三章 歐巴馬第二任期的美、日、韓關係	47
第一節 歐巴馬總統第二任期的東亞外交政策.....	48
第二節 美國與日本、南韓的同盟關係.....	51
第三節 日本與南韓關係.....	60
第四章 川普第一任期的美、日、韓關係	67
第一節 川普總統第一任期的東亞外交政策.....	68



第二節	美國與日本、南韓的同盟關係·····	72
第三節	日本與南韓關係·····	82
第五章	美、日、韓共同威脅認知改變·····	91
第一節	北韓所造成的核武威脅·····	91
第二節	中國崛起的挑戰·····	93
第三節	日本與南韓的相互認知·····	96
第四節	小結·····	98
第六章	結論·····	99
第一節	主要研究發現·····	99
第二節	理論意涵·····	102
參考文獻 ·····		105

圖目次

圖 1-1 美國安全承諾與日韓關係·····	24
圖 1-2 美、日、韓同盟關係圖·····	25
圖 2-1 歐巴馬第一任期的美、日、韓關係簡圖·····	29
圖 3-1 歐巴馬第二任期的美、日、韓關係簡圖·····	47
圖 4-1 川普任期的美、日、韓關係簡圖·····	67

表目次

表 2-1 2009-2012 日韓高層互動統計·····	42
表 2-2 2008-2012 日韓安保對話統計·····	43
表 3-1 2013-2016 日韓高層互動統計·····	61
表 3-2 2013-2016 日韓安保對話統計·····	62
表 4-1 2017-2019 日韓高層互動統計·····	83
表 4-2 2017-2019 日韓安保對話統計·····	85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前言

縱覽東亞國際關係歷史，日本與朝鮮半島的恩怨糾葛以 1910 年日本統治朝鮮半島時期為起點，在經歷殖民、戰爭、南北韓戰後分治及南韓與日本相繼經歷了經濟實力快速增長與民主化後，隨著兩國政權的移轉與雙邊經濟貿易需求，以及東亞國際關係環境的改變，近二十年來，兩國之間的關係也展現了與過往不同的全新變化。另一方面，隨著日韓的共同同盟國美國在 2010 年後再度將亞太區域視為重要的戰略標的 (Obama, 2010)，除了美國與東亞同盟國家的關係外，美國在東亞兩個重要同盟國家：日本與南韓間的關係也成為國際焦點，在維護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的前提下，日本與南韓兩國關係的發展與波動並不僅僅受到兩國歷史關聯的影響，美國因素與區域安全環境變動也是改變日韓關係的強大動力。

然而，日本與南韓的關係在二戰結束後始終籠罩在兩國因殖民與戰時徵用婦女及勞工所種下的仇恨陰影之下，雖然兩國之間擁有共同盟友美國，卻始終僅能保持著擁有共同盟國的「準同盟國 (Quasi-alliance)」關係 (Cha, 1999)，難以更進一步成為實質上的同盟國，歷史問題也在近年來持續成為兩國發展外交與經貿關係的重大阻礙。

2017 年，南韓在前總統朴槿惠因案遭彈劾下台後舉行大選，由文在寅獲得五年執政權力，文在寅在就職後表達了願意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談話、和解的意願，然其對歷史問題（如慰安婦、徵用工問題）的態度與立場強硬（日本產經新聞，

2017/07/01) ，因此使得日韓關係再度出現動盪。



2018 年 10 月 30 日，韓國大法院（相當於最高法院）判決支持四名在二戰時期遭日本殖民政權強行徵用的韓國勞工有權向相關的日本企業索賠，並要求日本企業必須賠償四名原告各一億韓元的賠償金；次月（11 月）底韓國大法院再度判決要求日本三菱重工須賠償戰時受徵用的五名韓國勞工，這兩起判決引發日本國內輿論反彈，日本政府主張日韓間的賠償問題，包括個人與國家的賠償請求均已在 1965 年簽訂的《日韓請求權協定》中獲得「最終解決」，南韓方面在簽訂協定時已同意由日方賠償五億美金（兩億美金作為贈與的賠償金，三億美金則為有償的長期貸款）作為二戰期間日本造成韓國國家與國民損失的補償，因此這兩起判決是對 1965 年協定的公然違反（The New York Time，2018/11/29），判決確定後即成為日韓關係破裂的導火線，在同年底又爆發了韓國海軍與日本海上自衛隊因雷達鎖定、意圖開火所導致的衝突事件（日本防衛省，2018/12/21），導致日韓關係急轉直下，2019 年甚至轉為貿易戰爭，日本與南韓均透過限制工業原料與產品的進出口來對兩國間的經濟貿易情況施壓，試圖使得對方讓步低頭，南韓也進一步宣稱將終止日韓間在 2016 年所簽訂的《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GSOMIA）》，雖然後來在美國的介入下，南韓同意暫緩廢止 GSOMIA 的決定，日韓兩國交惡的情況迎來較為和緩的時期，但日韓之間至今仍未見和解曙光。

日本與南韓間的雙邊關係演變除了牽動兩國與美國的同盟體系之外，也將影響東北亞與東亞的戰略安全環境，而當朝鮮核武問題與中國崛起使得東亞安全環境出現不穩定與改變時，日、韓兩國的關係也將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而本文將藉由近二十年來日韓關係的變化跡象來探討日韓關係變化的背景與因素，進一步勾勒出東亞區域內安全環境的變化。


第二節、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美國與蘇聯兩強對峙的環境中，韓戰的爆發使得南北韓，南韓與鄰近的日本與美國成為兩組雙邊軍事同盟關係（Military Alliance），南韓與日本也成為美國在冷戰時期於東亞圍堵共產勢力擴張的重要夥伴，其個別的同盟關係也隨著時間推進延續到今日，學者車維德（Victor D. Cha）於 1999 年所著的“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The United States-Korea-Japan Security Triangle”一書中將日本與韓國的關係視為「準同盟（Quasi-alliance）」，即日本與韓國各自與美國存在美日與美韓同盟，但日韓兩國間卻不存在實質的同盟關係，其認為日本與韓國間的互動關係是存在於美國-日本-韓國三角關係之中的特殊議題，而美國與日本、韓國間的同盟關係則是這個特殊議題所面對的結構（Structure）。

車氏認為影響美-日-韓三角關係的主因是外部威脅的存在與否以及其強弱，美國是這個三角關係中最主要的主導者，其擔負起大多數的同盟義務並為日本與韓國創造了一個得以將安全責任轉嫁的環境（Freedom of irresponsibility），而對威脅的共同認知（cognition）是維持三角互動關係以及兩組雙邊同盟關係的重要環節，從 Glenn Snyder 所提出的同盟安全困境出發，車氏為美-日-韓三角關係的互動設定了重要假說：當日本與韓國認為美國的同盟承諾強度開始削弱，日、韓兩國會共享被美國這個同盟主導者拋棄的恐懼（fear of abandonment），因此兩國的安全關係會傾向於合作（cooperation）大於摩擦（friction），在此情況下，日韓的安全關係則會趨於緊密，反之，當美國的安全承諾強度增加時，日韓安全關係則趨向摩擦（合作程度下降），車氏透過二戰結束後到 1980 年代所進行的分析，此假說得到了驗證。

然而，隨著朝鮮核武問題的惡化以及中國在改革開放後以經濟實力崛起的態



勢，東亞區域內的安全環境以及威脅標的也因此出現改變，本文的重要研究目的即是探討在此一出現重大改變的環境之中，車氏對日本與南韓關係的重要假說——即日韓關係的變化深受美國承諾強度的影響——是否仍能夠解釋在 2009 年至今的日韓關係波動：美國在 2009 年到 2019 年間歷經兩任總統，在歐巴馬（Barack Obama）與川普（Donald John Trump）主政時期，美國對東亞盟國承諾的強度變化是否真與日韓兩國關係的變化吻合，尤其在兩位不同總統的領導之下，美國的外交政策實際上出現了許多變化與差異，在此變動中，日本與南韓的關係遠近也有所不同。

第一，車氏在建構其理論與假說時，所研究的時間範圍是二戰後到冷戰結束初期，在此歷史區間中，東亞區域內的威脅標的與安全環境是呈現高度穩定且單一的，在其所研究的這段時間中，南韓、日本與美國所面對的單一旦共同的敵人即是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而國際環境所給予日本與南韓的戰略安全選項也相對貧乏（即只能在共產與民主兩大陣營中選擇），但時至今日，不論車氏的假說在本文的探討中能否對近年來的日韓關係提供解釋，東亞與東北亞區域中國際關係的變化與安全戰略選擇的多元是不容忽視的背景因素改變，因此本文在探討上述日韓關係是否與其假說相符之餘，仍期望透過描繪現今東亞安全環境的變遷，藉以提供與原先假說不同的可能變項。


而歐巴馬總統在 2009 年上台後，陸續發佈多份國家戰略與外交相關的報告，其中多提及美國將重新檢討其在過去所推行的東亞戰略政策，並試圖將東亞區域安全重新納入美國重要戰略目標之一，在車氏的理論中，此一強調東亞戰略佈局的宣示可被視為美國承諾的加強。相對而言，川普總統自 2017 年上任後，其外交政策的主軸是「美國利益優先」，認為美國應要求盟國負擔更多安全責任以及駐軍費用，對美國現有的同盟國而言，這些要求都象徵著盟國必須付出更多成本以換取美國維護盟國與區域內安全，可被視為對盟國安全承諾的退縮，美國的外交政策在兩



位美國總統的任期中明顯出現對東亞盟國安全承諾強度的變化，因此值得深入探討。

第二，川普在上任後因其確保美國利益的外交政策主軸，美國在外交政策的調整上也導致與東亞國家的關係出現些許變化與矛盾：首先，美國與東亞最重要盟友國家日本在駐日美軍軍費負擔以及重新簽訂美日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的議題上出現摩擦，川普主張日本應負擔更多駐日美軍的軍費支出，美日間就駐軍費用所達成的協議將在 2020 年重新談判，美國已經多次要求日本在本次談判中進行讓步。雖然美國政府對日本的施壓與要求增加，日本仍願意增加年度軍事預算用於採購美國所出售的 F-35 戰鬥機等軍事設備，美方也肯定並支持日本藉此強化安全防衛能力，軍購案的達成背後不僅代表著美日雙方對軍事安全合作的共識堅定，也代表美國政府實際上仍願意對日本提供安全上的支持。

同樣地，美國與南韓的同盟關係也在川普總統上台後出現波動，除了與日本相同面對美國對軍費負擔與重擬自由貿易協定外，南韓政府在朴槿惠主政時期同意美國所提出的防衛要求：在南韓境內部署終端高空防禦飛彈（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薩德系統），雖然最終因中國對 THAAD 部署的強烈反彈，隨後上任的文在寅政府決定暫緩 THAAD 的永久部署，改為僅部署部分發射車且不後續追加的方式，但美國在 THAAD 部署上的姿態仍可被視為對南韓安全承諾的加強；而美國與北韓的關係，也隨著川普就任出現變化，川普對解決北韓核子武器問題採取軟硬兼施，一方面措辭強硬要求北韓「停止威脅美國」，並與南韓實施共同演習（「乙支自由衛士」美國與南韓的年度聯合軍事演習，重點之一是演練北韓斬首行動）威嚇北韓領袖金正恩，另一方面則釋出願意與金正恩進行會談的善意，也成功在 2018 與 2019 年間舉行三次領袖會談，對長期對抗且停滯的美朝關係而言，無疑是歷史性的突破。



然而，川普與金正恩三次會談的結果未能就「朝鮮半島無核化」達成共識，使得美國與北韓的關係進展再度停滯；而南韓在文在寅主政後，在南北韓關係上顯得更為積極且亟欲拉近兩國關係，除了促成美國與北韓的三次領袖峰會外，北韓與南韓的領導人也多次進行會面，兩韓關係達到近十年來的高峰，但在美國與北韓的核武問題談判陷入僵局之際，做為同盟國的南韓仍多次表達希望兩韓能以「統一朝鮮半島」的目標邁進，並認為美國對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的實際行動不若其所宣稱的積極（Kim，2019），因此使得美國與南韓關係出現裂痕，對於一急需美國提供安全保障的國家而言，南韓政府此躁進的舉動令人費解。

總結上述而言，美國一方面對於同盟國的日本與南韓施加壓力，並以撤離駐日及駐韓美軍作為威脅，欲迫使日本與南韓在軍費與其他雙邊關係議題上進行讓步，但另一方面仍透過增加軍事採購與防衛性軍事設施部署來加強對亞洲同盟國家的安全保障承諾；在北韓核武問題上，美國與南韓則出現了行為不一致的情況，本文將進一步探討這些矛盾與不一致的外交政策作為，並尋求解釋的可能性。

第三，川普總統在 2017 年上任後，除了將美國的國家利益視為外交與同盟關係中首要維護的目標外，更為引人注目的是其外交政策對中國所展現出的明顯敵意，在 2017 年底於川普總統任期內首度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7）中，將中國與俄羅斯並列為亟欲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利益且挑戰美國的強權國家，隨著中國在亞洲與太平洋地區的勢力擴大，川普政府勢必需要透過加強與亞洲盟友國家的關係以獲得反制中國崛起的效果。但「與盟友關係的加強」與「維護美國國家利益」此兩項政策目標在軍事合作上所出現的矛盾如軍費負擔問題引起盟國不滿、美國要求盟國負擔部分防衛責任引發盟國不安等問題也浮上檯面，在「拉攏東亞區域內同盟國並合作對抗中國」與「美國單邊利益優先」兩項外交政策目標中的衝突與平衡已經成為川普亞太外交政策中不容忽視的特點，尤其

在防堵中國擴張的第一線東亞與東北亞，美國是否會因此選擇再度提供盟友國家更強力的安全承諾，將圍堵中國視為最重要外交政策目標，以避免中國的勢力持續增加也將是本文欲探討的重要目標。



綜上所述，本文的研究問題將聚焦在歐巴馬與川普主政時期中美國與日本、南韓間的同盟互動關係，以車氏所提出的假說為基礎，開展出的幾個研究問題分別是：

(一)在歐巴馬與川普主政時期，Cha 的理論假說是否仍能夠描述日韓關係在 2009 年後經歷美國外交政策調整與同盟安全承諾強度變化下所產生的變化，並與其假說的結論相符合？

(二)而符合或者不符合間，其三國互動關係所面對的背景因素是否產生變化？

(三)而美國的外交政策在川普主政時期出現重大變化，在中國成為美國最大戰略對手之後，積極的拉攏東亞盟友國家共同對抗中國的政策目標其重要性是否將凌駕川普總統所追求的提升美國單邊利益目標？


本文將著重於回答問題（一）與問題（二），將透過第二到第四章的主要篇幅進行研究與討論，而在研究過程中，透過對川普政府外交政策與三國關係的探討，將在第四章內容中回答問題（三）。

第三節、研究途徑與方法



本文的理論途徑將採用前文所提及學者車氏在 “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 : The United States-Korea-Japan Security Triangle” 書中所提出的假說一：日本與南韓的關係會隨著共同同盟國美國的安全承諾強度變化而出現波動，其在書中的結論是當美國對同盟國家的安全承諾強度提升時，日本與南韓對被美國拋棄的恐懼將會下降、對區域中安全的信任感將上升，則日本與南韓即失去了合作的原因，因此日本與南韓的雙邊關係將會隨之趨向摩擦；反之在美國出現同盟承諾動搖之際，日本與南韓將在國家安全議題上感到恐懼，則日本與南韓的關係將會趨向合作以對抗區域中的威脅，以填補美國在區域安全環境中退卻後所留下的空缺。因美國、日本與南韓的同盟關係主要重心是軍事合作，因此本文的研究重心將著重於日本與南韓在外交與軍事安全議題上的互動關係，並與車氏的理論進行對照與驗證。

而車氏在假說中提到，日本與南韓之間所存在的是一擁有共同同盟國，但並未真正形成三國同盟體系的「準同盟（Quasi-alliance）」關係，受限於歷史問題以及國內其他政治因素，日本與南韓之間並未真正透過締結條約等正式成為同盟，並且受限於日本和平憲法的約束，在日本放棄宣戰、交戰權力等武力動用權的情況下，除了美國以外，日本在遵守憲法的前提下，難以與其他國家締結相關的軍事攻守同盟關係，但日本仍有能力與其他國家發展近似於同盟關係的戰略夥伴合作關係，如日本與印度所發展的戰略性全球夥伴關係，並且藉此關係的連結在印度洋進行聯合軍演的緊密軍事合作（林賢參，2018：51-52），因此本文在此處透過車氏假說所提出的準同盟，將檢視日本與南韓之間各項軍事合作項目發展，進行對日韓準同盟關係的討論。



本文將採用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進行質性研究，並輔以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方法敘述評估日本與南韓外交與安全合作關係變動的幾項指標，藉以勾勒出 2009 年美國歐巴馬總統第一個任期開始至 2019 年川普總統任期過半的這段時間當中，日韓關係的變化與美國對同盟國的安全承諾強度變化、美國亞太外交政策的變化、國際環境變動、同盟國之間共同的威脅認知改變等因素之間的關係，並與學者車氏所提出的理論假說進行互動與對話，除了檢視車氏的假說與結論是否仍能解釋近十年來的美國、日本與南韓間的互動關係，並且解釋日本與南韓關係的遠近是否仍深受美國安全承諾強度的影響之外，也期待透過對東北亞區域內國際環境變動的描述與分析，補充車氏理論中因為探討的歷史區間多是較為單純國際環境所可能產生的缺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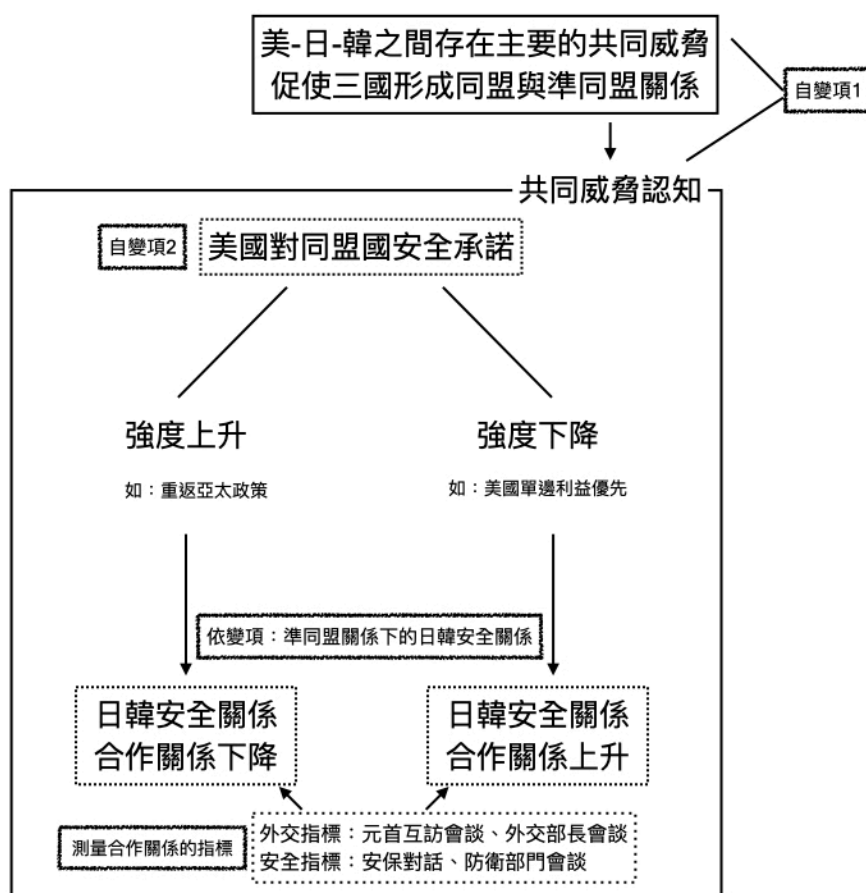
第四節、研究變項與研究架構

本文的研究架構如圖一與圖二所示。圖一中將自變項 1 設定為構成美、日、韓三國同盟與準同盟體系的主要成因：對外共同威脅認知，其在車氏的書中被認為是一基本前提，之所以是前提而非變項，是因為在車氏所研究的時空中，此共同威脅認知並未出現變化，但在本文第四及第五章中，此一共同威脅認知出現變化，因此本文將其設定為其中一個自變項進行討論。自變項 2 設定為美國對盟友國家的安全承諾強度，其變化所影響的依變項則為日本與南韓之間的安全互動關係，在車氏原有的假說中，其背景是冷戰時期，因此美國的安全承諾強度變化基本取決於美國的外交政策方針與目標，日本與南韓主要是被動的接受美國所給予的軍事安排，然而時至今日，日本與南韓在外交政策層面上的能動性有所提升，因此在本文中探討美國安全承諾強度變化時，多數時間將以美國與日本、南韓的軍事安全雙邊合作關係進行討論，而不再僅僅局限於美國對東亞區域外交政策的改變，也將把美國與日本、南韓所進行的軍事合作事項，視為美國安全承諾強度的變化指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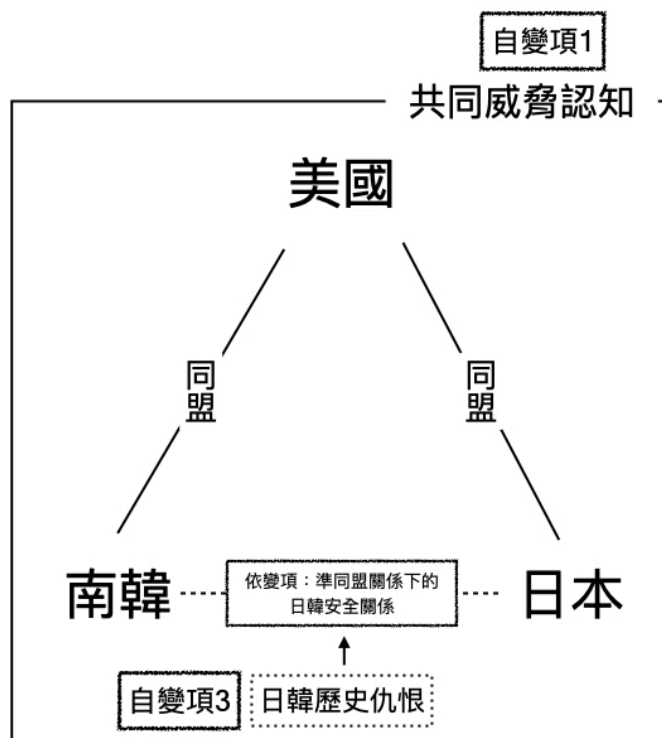
在探討日韓之間安全關係變化時，本文所使用的指標有二：第一個是與車氏書中一致，使用雙方領導人、外交高層官員會談與相互訪問的次數，藉此探知雙方在外交關係的互動情況；另一個指標則是日本與南韓兩國進行安全合作對話的次數，由於車氏在書中使用的安全合作指標如駐外武官的派駐已成為當代國際外交的常態，因此本文將採用自 1999 年起第一次舉辦的日韓安保對話作為指標，日韓安保對話並無固定的舉辦時間，端視日韓關係、東北亞區域安全環境變化情況決定是否舉辦，因此本文認為可作為探知日韓安全合作情況的指標。

圖 1-1、美國安全承諾與日韓關係（作者自行繪製）



圖二則顯示了本文所探討的三國同盟、準同盟關係的結構圖，由於日本與南韓之間長期存在因殖民與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起的歷史仇恨問題，車氏在其書中將此一歷史仇恨是為較為固定的背景條件之一，並認為其對雙方關係的影響有限，但本研究發現日韓雙邊關係中所存在的歷史仇恨，重要性在近十年來有所提升，並且會隨著南韓領導人對歷史問題的重視程度有所變化，因此本研究將之列為自變項 3，在後續章節中一併進行討論。

圖 1-2、美、日、韓同盟關係圖（作者自行繪製）



第五節、文獻回顧




壹、冷戰結束前的美國、日本、南韓的同盟關係

“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 : The United States-Korea-Japan Security Triangle” 是車氏於 1999 年所出版的，書中針對美國、日本、南韓的安全互動的三角關係提出假說與檢證，透過對歷史的分析建立理論背景，其認為在這組三角互動關係中，存在兩組相互影響的互動關係（即其所提出的假說）：假說一認為美國對日本及南韓兩個同盟國家的安全承諾強度增強時，日本與南韓會因此感受到美日與美韓關係的穩定與強韌，因此降低了在國家安全上被同盟國家拋棄（abandonment）的恐懼感，使得日本與南韓兩個國家並不會為了對抗（或平衡）威脅而拉近關係，在此假說中，美國的承諾強度即是自變項，而日韓安全關係的變化則是依變項；假說二所針對的則是日本與韓國的準同盟關係：當面對威脅或安全問題（如北韓核武問題），日本感受到被拖累的恐懼（fear of entrapment），而南韓感受到被拋棄的恐懼（fear of abandonment）時，則兩國的行為會傾向於摩擦（friction）而非合作（cooperation），而兩個假說在書中所提及的幾個歷史分期中得到了驗證。

一、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總統主政前期（1969-1971 年）

尼克森總統認為美蘇冷戰的白熱化已經使得核子武器大戰的可能性增加，因此期待透過推動軍備控制與一系列緩和政策來降低美蘇之間的對抗程度，並在東亞政策上降低駐外美軍的數量，並且調整與日本等同盟國的同盟關係以求更大程度的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同時避免美國再度於亞洲陷入越戰等區域戰爭的泥淖之中，並且與中共開始改善關係，然而這樣的東亞政策造成了日本與南韓兩個美國



同盟國的緊張，其對被美國拋棄的恐懼急遽增加，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雖然當時日本與南韓間仍有眾多摩擦與分歧，卻在感受到同盟關係可能生變的恐懼中，兩國決定暫時放下成見進行部分合作，使得日韓關係在此時期相對和緩且靠近。

二、尼克森總統主政後期（1972-1974 年）

尼克森總統在 1972 年訪問中國後，蘇聯與美國間的對抗態勢也出現緩和態勢，而美國也向盟友日本表示不會放棄或減損對其所承諾的安全與穩定，同一時間日本與北韓的關係也出現改善可能以期避免日朝關係的惡化造成東亞安全環境再掀波瀾，使得南韓政府在北韓問題上，再度陷入可能被拋棄的恐懼之中，並認為有可能被美國與日本所排擠、孤立，在這樣的恐慌心態下，日韓關係進入相對低點。

三、卡特（James Earl Jimmy Carter, Jr.）總統主政時期（1975-1979 年）

1975 年 4 月 30 日，最後一批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離開越南，標誌著美國在越戰的失敗，卡特總統在極端的反戰浪潮中上任美國總統，感受到美國人民對於美國過度介入亞洲事務導致犧牲眾多軍人生命的厭惡，並因此認為美國應撤除多數駐在南韓與日本等盟國的美軍、從亞洲的國際衝突泥淖中脫身，使得日本與南韓對於被美國此一最重要同盟國家放棄的恐懼加深，並迫使兩國必須合作說服卡特政府：駐日及駐韓美軍部隊對東亞安全環境與同盟國關係有重大意義，美國應持續維持駐東亞的美軍數量以確保同盟關係穩定，在此時期，雖然南韓政權未能如美國與日本所期望的民主化，然而在國家利益的驅使下，日本與南韓進行更為緊密的合作以期確保與美國的同盟關係能持續並穩定發展，而非將歧異置於雙方關係之間導致關係破裂，因此這個時期的日韓關係表現與車氏的假說相符。

四、雷根（Ronald Wilson Reagan）總統主政時期（1981-1988 年）



雷根總統在 1981 年接替卡特總統的位置，與卡特總統有著相當不同的外交理念，雷根總統在對抗蘇聯及其共產盟友的立場上更為堅定，認為美國應該加強與盟友國家的合作關係以確保共產勢力無法繼續擴張或壯大，因此對日本與南韓兩個重要的亞洲盟國提供武器與軍事合作，希望加強盟友國家的防衛能力，並保障區域的安全穩定。而在此時期中，日本與南韓之間的關係已改善不少，自卡特總統任內所延續下來的日韓合作關係也獲得延續，但從結果而言，日韓關係的樣貌在此時是兼具合作與衝突樣貌的：在外交關係上，日本與南韓在 1983 與 1984 年進行了雙方歷史上首次的元首互相訪問，象徵著日韓關係開啟了新的發展階段，同時在此之後也維持著國防安全（如駐外武官的持續派任）等共同合作項目。

另一方面，日韓間的衝突也在此時期先後出現且造成國內政治的反彈聲浪，如 1973 年南韓政府在日本領土內公然對流亡東京的金大中進行綁架，使得日本政府與民間認為南韓侵犯主權，而南韓卻不以為然，造成日本輿論不滿。而日韓間因二戰賠償與銀行界投資而存在的貸款關係，因償還問題而出現爭執，雖然最終日韓兩國仍達成了協議，卻已傷害了日韓關係，也影響了兩國國內民意對雙方國家的看法。1982 年日本修改教科書並試圖淡化日軍在二戰前後對東亞其他國家的侵略行為，造成南韓輿論與政府對此次教科書修改的大力反彈，也顯示了日韓關係雖然在外交上有所進展，但在許多經濟與核心價值問題上仍存在著緊張關係，而這些緊張關係並未因兩國外交關係好轉而隨之解決，反而成為兩國關係發展上難以避免的障礙與侷限，因此車氏在結論中提到，此時的日韓關係看似違反了其原初對日韓關係變化的假說，但實際上在結果面上仍呈現與其假說一致的情況。

時至今日，車氏書中所描繪的冷戰格局已不復存在，在中國崛起成為強權的因

素加入後，東亞國際關係結構的變遷使得戰略安全環境已與車氏書中所描述的不同，而美國的外交政策在策略上也出現了變化，這些因素的改變對美國、日本、南韓間同盟關係與日韓關係的影響，即是本文期待補充說明並論證的重要關鍵。

值得一提的是，車氏在書中認為日本與南韓間的歷史仇恨是始終存在的，但在國家利益的考量上，日本與南韓會為了保全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選擇跨越歷史仇恨的鴻溝相互合作，但實際情況而言，日本與南韓的歷史仇恨至今難以消解，且更可能因為領導人對歷史仇恨的在乎而出現重要性增加的情況，如南韓現任總統文在寅即認為日韓間的歷史問題必須尋求更積極性的解決，因此本文也將就此進行討論。

貳、歐巴馬與川普主政時期的美國與日本、南韓的同盟關係

一、美國的東亞外交政策

2009年歐巴馬接替小布希總統上台後，宣示將重新檢討美國的外交政策方針，其中對東亞的外交政策調整引發注目，象徵美國在小布希時期將亞洲外交政策重心置於中東地區的主軸將有所改變，2010年所發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0）中強調為了因應新興大國如中國、印度等對亞太地區安全戰略環境的影響，美國基於國家利益與安全的維護，應加強對亞太區域的重視並提出因應策略，避免喪失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這份被外界稱為「美國重返亞太宣言」的重要報告中更認為美國必須加強與亞太地區的合作與經貿交流，避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安全合作與經貿整合之中被邊緣化或忽視。而廖顯謨與張凱銘（2013）基於歐巴馬總統任內對於亞太政策的佈局，認為其中一重要面向是強化亞太地區的安全部署，此政策面向所包含的重要意涵包含了強化美國在亞太地



區的盟友關係與軍事戰略合作，具體實踐上則是包括了與日本、南韓等重要盟友國家的聯合軍事演習、駐外美軍的調度以期達到強化對盟邦安全承諾的效果等。

唐欣偉（2015）則認為，美國在後冷戰時期所採行的一貫外交政策原則是「離岸平衡」，又因其與中國經濟貿易的交流十分頻繁且規模龐大，在這樣的狀態下，美國對中國的防衛政策必須依靠日本、南韓等盟友國家的幫助，因此美國在歐巴馬總統主政時期會透過加強與盟友國家的軍事安全合作來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並維持優勢軍力以嚇阻北京對外的可能軍事擴張。

另一方面，William T. Tow（2015）在其文章中提到，隨著中國的軍力與國力崛起，東亞盟國對美國的重要性勢必增加，而在加強美國與盟友國家的關係之外，讓日本與南韓兩個重要盟國之間的關係改善也是歐巴馬政府在 2011 年後亟欲促成的政策目標之一，然而，雖然在北韓這個共同威脅的議題上，日韓願意合作，但在其他有關歷史仇恨的問題上，日韓仍僵持不下，成為歐巴馬亞太政策中的一大難題。Hans Binnendijk（2016）則提到，雖然在面對北韓威脅時，日本與南韓都願意隨著美國的戰略政策調整彼此之間以及與美國的合作關係，但在日本與南韓內部所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仍可能影響兩國政府在處理雙邊關係時的態度。

而川普總統在 2017 年上任後，美國的外交政策主軸再度經歷了一連串的改变與重整，Michael Anton（2019）認為，川普在競選時期所高舉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在其上任後仍然是其外交政策的主軸，川普認為要求盟友國家負擔更多的安全防衛義務與駐軍費用有助於盟友國家負起盟國的責任，避免在美國所建構的安全秩序之中出現單純依靠美國提供保護的搭便車（free-rider）國家，但這樣的要求也的確造成了盟友國家的不安。Joshua Shifrinson（2019）也撰文指出，隨著川普總統在外交政策上的調整，美國與東亞盟國間的緊張關係可能難以在短時間內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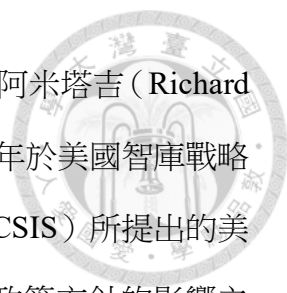
息，而這樣的緊張關係可能促使盟國懷疑美國對其所給予的安全承諾是否可信，並使得盟國因此期待提高自我保衛能力，而衝撞或脫離美國掌控的同盟結構。

然而，張中勇（2016）認為在東亞區域內，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雖依舊維持著美國利益優先的態度，但也不斷強調與東亞盟友國家合作的重要。李大中（2019）認為隨著美國的亞太政策在川普任內調整為「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與中美競爭態勢的明朗，川普政府勢必會加強與日本、南韓等國家的同盟關係，並期望以美國、日本、南韓的三角同盟關係作為對抗中國的重要著力點。

整體而言，學者多認同歐巴馬時期的美國東亞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是加強與東亞盟國的合作關係，在本文的理論脈絡之中可被視為美國對盟友國家的安全承諾強度提高。而川普總統上任後，其對東亞盟國的要求與施壓提高，導致美國與盟友國家的關係出現變化與不確定性，並指出美國與東亞盟國的合作關係仍至關重要，美國在外交政策的調整上勢必要顧及盟國間的關係與信任；然而，在美國、日本、南韓的三角互動關係中，上述學者除了點出日韓關係中仍舊存在的隱憂與障礙之外，多半未能將歐巴馬時期的與川普時期之中，美國外交政策變化與日韓互動關係的相互影響做出完整且具有因果邏輯的連結與描述，即本文期望整合描述的重要目標。

二、美日關係

美國與日本的同盟關係正式確立始於 1960 年所簽訂的美日合作與安全保障條約 (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其揭示了美國與日本的軍事同盟關係以及駐日美軍的法律條文基礎，美日關係變基於此同盟關係發展，隨著日本經濟復甦以及東亞國際局勢改變，美國與日本之間




的關係也隨之出現變化。從美國的角度出發，美國前任副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L. Armitage）與知名國際關係學者奈伊（Joseph S. Nye）在 2012 年於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所提出的美日同盟關係報告中提到，美國與日本的關係除了受到美國外交政策方針的影響之外，日本本身對於實踐同盟國責任與國家利益維護的意願也至關重要，而美日關係的深化對美國與日本的國家利益是十分有利的，隨著美國與日本的軍事合作加強以及日本對國家責任的擔負意願提高，美日關係將朝向更具有互信基礎以及對周邊區域安全環境更為有利的方向前進。

Evelyn Koh（2011）在國際事務期刊（International Affairs）中撰文指出，日本在美國於冷戰後所建構的東亞國際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在面對中國這個區域中崛起的大國時，日本的存在也有助於抵抗中國在區域內持續擴大的影響力，避免美國主導的區域安全秩序出現質變，但另一方面，中國的國力增長與對區域秩序的著力也可能使得美日關係出現變化，美國必須持續加強與日本的關係，避免為了促進中國融入世界秩序而疏遠日本，導致區域內缺乏可以平衡中國勢力的重要大國。

美國國會研究處（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在 2019 年所更新的美日同盟報告中也提到 2015 年所更新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the Guidelines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有助於日本在東亞區域中承擔更多盟國責任，擴大了美日安全合作所涉及的範圍，對美日關係而言有著正面且深刻的影響。

另一方面，作為美國在東亞區域中重要的同盟夥伴，在冷戰結束後，日本的合作意願與態度亦是美日關係波動的重要原因，古詩涵（2017）認為 2009 年贏得大選的日本民主黨急欲改變長久以來對美國單方一面倒的外交政策，期望透過開



展更多元的外交關係來取代對美國的過度依賴，尤其是與東亞其他鄰國的關係改善，更被民主黨首相鳩山由紀夫視為重要目標，同時也希望日本與美國的同盟關係能夠更加對等，而非由美國單方面決定同盟合作的事物，然而這樣的外交政策目標使得美國懷疑日本對同盟關係的忠誠，造成美日關係的緊張與僵化，而在 2011 年由自民黨成功奪回政權後，再度擔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再度將日本的外交政策主軸調整為以美日同盟關係為中心，在同盟穩固的基礎上開展外交關係，並與歐巴馬政府所提出的亞洲再平衡（**rebalance**）政策相互呼應，美日關係重回熱絡。

蔡增家（2017）也認為，安倍政權在面對中國勢力日益擴張之際，其對美日同盟的依賴將會加深，而日本將與美國合作並致力於維護由美國所主導的東亞安全秩序，美日同盟也從冷戰後的一度漂流轉為更加穩固且相互信賴的同盟關係。然而，川普政府的上台也使得安倍晉三的外交政策面臨全新考驗，何思慎（2018）認為，川普所標舉的「美國優先」及對盟國的錙銖必較已經使得日本政府對美日同盟關係的信任產生動搖，日本必須在美國安全承諾不穩的情況下保全國家利益與國防安全，因此將採取其他手段如增加日本自衛隊的攻守力量或與其他大國友好，以避開美國安全承諾強度降低對國防安全所造成的風險。

在既有文獻中提到，美日關係已經隨著時間推進，由美國能夠單方面透過其外交政策主導轉為美國與日本均是同盟中有能力影響彼此關係的行為者，但學者們多聚焦於美國與日本同盟關係中的政治角力以及利益衡量，同時也多以較為單方的國家角度出發（如從美國或從日本的角度）去探究美國與日本的同盟關係，卻未能就美國與日本間的雙邊外交關係出發，進一步描繪日本在美國政策的影響下做出外交選擇時所代表的意圖與考量，也並未具體解釋同盟關係中美國安全承諾強度的變化對日本外交政策的影響，因此本文期待透過探討美國外交政策改變、給

予日本安全承諾強度的變化以及日本自身的戰略安全選擇進行綜合討論，藉以補足文獻未竟之處。



三、美韓關係

美國與南韓的同盟關係建立於 1953 年，韓戰結束後，美國與南韓簽訂《韓美共同防禦條約》（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相較於美日關係，美韓關係的波動始終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除了美國本身對同盟國所採行的外交政策以外，還有南北韓雙邊關係交惡所導致的問題，北韓（朝鮮人民共和國）在冷戰結束後成為東亞區域內既有安全環境的主要威脅，而在北韓持續發展核子武器後，南韓主政者更必須謹慎處理外交關係避免引發半島緊張局勢升級或戰爭。

學者劉德海（2010）認為，歐巴馬政府在第一任任期內，面臨東亞重要盟國日本的疏離（民主黨主政的日本政府），其外交政策相較以往更為依賴美國與南韓之間的同盟關係，然而中國的崛起以及南韓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使得南韓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出現了些許變數，2010 年所發生的天安艦於兩韓爭議海域沈沒事件揭示了東北亞國際局勢已經與冷戰時期相比變得更為複雜，而在美國與中國都積極期待展現在東亞的實力之際，南韓欲透過加強美韓同盟來因應北韓對其國家安全所造成的威脅，卻又期待透過與中國的關係友好來影響北韓並保持中韓間的經濟利益，使得南韓成為在中國與美國兩強間的夾心餅乾。


Victor D. Cha 與 Katrin Katz（2011）則撰文指出，美韓關係在歐巴馬總統任內達到歷史高峰並非偶然，而是在南韓政府積極展現鞏固美韓同盟關係的情況下，又因天安艦事件的加溫所出現的必然結果，而美國在軍事以及安全承諾上所給予

的強烈支持使得南韓對美韓同盟的信任提升後，美韓關係仍需要面對來自中國與北韓核武因素的影響，且南韓內部民意對大幅度倒向美國並在經貿議題上讓步的南韓外交政策有所疑慮，使得美韓關係仍存在許多未知。



朴槿惠在 2013 年接替李明博上任韓國總統，上任之初朴槿惠即訪問美國，宣示其鞏固美韓同盟關係的決心，黃奕婷與張登及（2017）提到，朴槿惠雖然認同李明博任內持續強化美韓同盟關係的外交政策，但朴槿惠除了維護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外，也亟欲改善與中國、日本等東亞鄰國的關係，隨著北韓情勢升高與中國在北韓核武問題上的消極態度，朴槿惠才再度將加強美韓同盟關係視為南韓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標，而朴槿惠總統任內接受美國要求決定部署的薩德（THAAD）系統更是美韓同盟關係進一步鞏固的重要里程碑。

隨著美國與南韓均在 2017 年迎來新的國家領導者，川普總統與文在寅總統的外交方針變化也使得歐巴馬執政時期達到高點的美韓同盟關係出現變化，Abraham M. Denmark（2019）與 Heung-Kyu-Kim（2017）均撰文指出，雖然美國與南韓需要在北韓議題上緊密合作，但南韓與中國的關係仍可能成為美韓同盟關係中的巨大變數。而除了中國因素的影響，Scott A. Snyder（2019）認為，川普總統在軍費分擔與自由貿易協定上的強硬態度，已經造成南韓對美國安全承諾產生不信任感，並可能促成南韓與中國關係的近一步靠近、合作。S. Nathan Park（2019）也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撰文指出，川普對東亞盟國錙銖必較的外交政策，可能使得美韓關係鬆動，雖然南韓願意在自由貿易協定等議題上對美國有所讓步，但長期而言，美國對盟國的施壓可能動搖原本穩固的同盟關係，美韓關係中的緊張態勢也可能持續。




綜上所述，美國與南韓的同盟關係在學者眼中多不僅只受到美國外交政策方針的影響，南韓在同盟關係中所面對的掙扎同樣對兩國的同盟關係有所影響，而與共同威脅北韓的鄰近也使得南韓對美國所提供的安全承諾強度變化更為敏感，這樣的敏感特性使得南韓在外交政策的運作上，出現與其他美國在亞洲的盟國更加不同的模式，如南韓對於威脅來源的認知往往會影響其對於美國安全承諾的看法，而本文對於這部分既有文獻的補充在於，在美韓關係研究中，學者多聚焦在美韓同盟在面對北韓威脅時的反應與政策做法，以及美韓關係在不同執政者領導期間所產生的變化，未能具體將美國安全承諾的強度與南韓外交政策變化進行連結，本文將在第二至第四章中針對此一部分，進行較為細緻的連結。

參、日本與南韓關係

日本與南韓擁有同一個同盟國家美國，又因其地理位置的接近、日本在朝鮮半島的殖民史、領土爭議等因素，使得日本與南韓的雙邊關係始終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而呈現波動頻仍的情況，在美國宣示重返亞太的政策目標後，日本與南韓兩個重要東亞盟國之間的關係也成為美國亞太政策的注目焦點。

2012 年在南韓總統李明博登上日韓爭議領土獨島（竹島）後，日韓關係再度因為領土問題而急凍，J. Berkshire Miller（2014）撰文指出，雖然歐巴馬政府亟欲拉近日本與南韓的關係，並促使兩國得以和解，但日韓兩國在歷史問題認知與領土爭議的爭執似乎在美國介入下也難以解決，而美國對日本國家正常化的支持也使得南韓質疑美國立場的偏頗，美國的介入調停可能只能換取日韓關係表面的和緩，對實質情況的改善幫助有限。

神戶大學教授木村幹（2013）在文章中提到，日本與南韓在 2012 與 2013 年先



後經歷政權換新，但兩國的新領導者卻並未如外界期待的對凍結的日韓關係提出對應的修復政策或行動，木村認為日韓關係之所以難以在安倍晉三與朴槿惠的領導下出現回溫跡象的原因除了舊有領土爭議再度成為焦點，使得兩國人民在情感上難以和解外，更深受國際環境轉變的影響：在中國崛起後，南韓與日本對中國的認知出現歧異。美國對日本的安全承諾保證明顯比對南韓的穩固，縱使日本民主黨政權與美國出現爭執，但安倍晉三所領導的自民黨上台後，美日關係修復良好，使得南韓在同盟關係中的地位下降，南韓對美國和日本所提供的同盟承諾出現不信任；而日本在安倍上台後所進行的軍事相關改革也使得南韓對日本的提防再度上升，種種因素使得日本與南韓的關係雖然並未在登島事件後再出現大幅度下降，卻也難以提升，木村認為日韓關係的難解深受國際環境與兩國國內政策、外交政策的影響，當兩國在國內認同與外交政策方針都出現分歧時，日韓關係便會變得難以修復。

而 Kevin J. Cooney 與 Alex Scarbrough (2008) 的文章指出，基於現實主義中國家對國家利益的理性追求，日本與南韓共同身處在變動極大的東北亞區域中，並且面對北韓這個共同威脅，將自然地形成同盟並在各種議題上通力合作，以求保障國家安全與促進國家在區域內的利益最大化。

然而，事實上的日本與南韓關係並未如現實主義學者們所預測的，文中認為主因是在日本與南韓關係中存在難以跨越的障礙：日本曾經侵略東亞鄰國（包括朝鮮半島）所遺留的恐懼以及日本殖民朝鮮半島所遺留的歷史仇恨，這些恐懼與仇恨使得南韓民眾與政府始終對日本抱持著一定的敵意與戒心，縱使美國這個共同盟國期望日韓合作關係能更為緊密，日韓關係仍難以更進一步。與此同時，文章中也提到，日本與南韓的關係實際上深受兩國領導人意識形態的影響，在國際環境與國家利益需求沒有顯著變動的情況下，日本與南韓兩國的外交政策常因領導人的變更

而出現極大甚至是根本性的變化，雖然這並不符合現實主義中對國家理性的假設，但這樣「不理性」的現象也正代表日韓之間的意識形態歧異在特定情況下可能會勝過對國家利益的理性追求，成為影響兩國外交政策的重要關鍵。



Alexandra Sakaki 及 Junya Nishino (2018) 便指出，2012 年後與南韓的關係已經成為日本領導者難以處理的困境，日韓關係間所存在的矛盾難以消解，而這樣的困境已經使得日韓關係兩國在戰略安全上的合作難以推進，縱使南韓先後在 2013 年與 2017 年經歷政權轉移，兩位南韓領導者的外交政策上也有所差異，然其對日本的敵意以及不信任卻高度一致，使得日韓關係無法改善，雖然南韓顯然對於國家安全保障的需求高過於日本，在南北韓出現衝突時也極有可能必須依賴美國與日本的軍事援助，但南韓政府與社會對日本跟隨美國所提供的安全承諾仍抱持懷疑態度，在此情況下，日本或許僅能依靠美國這一同盟國的力量來降低日韓之間的衝突與緊張，並且避免南韓在此情況下倒向中國，而使得日本與美國所建立的東亞秩序受到衝擊。

在此部份中，既有文獻裡學者們對日韓關係的著墨勾勒出了日本與南韓之間難解的歷史仇恨背景、複雜的國際環境與秩序變動以及意識形態差距，日韓關係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始終浮浮沈沈，地理位置上的鄰近以及區域安全維護上合作的必要性都未能夠實質拉近日本與南韓之間的關係，然而雖然不同學者對日韓關係的變動提出了不同解釋，並有部分學者認為意識形態所代表的歷史仇恨問題之重要性是隨領導人（或是執政黨意識形態）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仍未能夠系統性的統整並建立出影響日韓關係變化的各項因素以及其因果關係，而本文欲透過美國對盟國安全承諾的強度變化探討其對日韓關係波動的影響也未能在上述學者的研究中得到驗證或解答。




第六節、研究限制

本文的研究雖是針對車氏所著 “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 : The United States-Korea-Japan Security Triangle” 一書進行討論，然本文將聚焦於其對美國、日本與南韓三國同盟互動關係中的假說一，即美國的安全承諾強度將影響日本與南韓的互動關係，而書中所提出的假說二，在本文之中將不會特別進行討論與研究，因此受限於此選擇，本文將未能描述日本與南韓間對於被拖累（Entrapment）與被拋棄（Abandonment）的恐懼與被這些恐懼所影響的日韓互動關係做出細緻且系統性的描述。另一方面，由於本文所指涉的日韓關係僅限縮於安全與外交互動、合作關係，然國際間的互動關係不僅止於安全或軍事互動，經濟與貿易層面的國際雙邊關係在本文將不被討論。

第七節、章節安排

本文的章節安排將以美國歐巴馬總統與川普總統主政時期作為時間分界節點，除了第一章緒論以外，以任期所經歷的時間作為章節安排依據，分為歐巴馬第一任期 2009-2013 年、歐巴馬第二任期 2013 年-2017 年、川普任期 2017-2019 年以及最末章的結論，在各章節中，除了討論美國外交政策所導致的對盟國安全承諾強度變化、日韓關係變化外，也將討論美國、南韓與日本對區域中所存在的威脅是否仍存在共同認知，以及其他國際環境的變動因素。

第二章將以歐巴馬第一任期為依據，對這期間日本與南韓關係與美國安全承諾強度的變化之間做出描述與探討，歐巴馬總統在上任之初雖然宣示了其將調整美國在布希總統時期相對退卻的亞太政策（張凱銘，2011），其對亞太外交政策的



調整，對日本與南韓兩個東北亞盟國關係也帶來了影響，而在此時間區段中，北韓對南韓的外交政策轉趨強硬，而中國在東北亞局勢中的影響力也日漸提昇，在這些變動之中，無論是美國與同盟國家的關係或是日本與南韓雙邊關係勢必出現變化。

第三章則以歐巴馬第二任期為核心，2013 年後隨著南韓與日本先後經歷執政者更替，無論是美國與日本或是美國與南韓間的同盟關係，都隨著新任國家領導者的外交政策調整出現變化，而歐巴馬總統在第二任期內所推動的亞太政策仍維持著第一任期中所提出的「Rebalancing（再平衡）」、「Pivot to Asia Strategy（重返亞太策略）」，並積極推動日本與南韓的和解並進一步加強在軍事安全上的合作關係（William T. Tow，2015），但隨著中國在區域內的影响力持續提升，北韓的僵局也難以突破，實際上歐巴馬總統在第二任期內的亞太外交政策面臨許多困難與限制。

下一個章節則聚焦在川普總統於 2017 年上任後所帶來的眾多改變，川普總統自競選時期及標舉孤立主義大旗，並認為美國在外交政策上首要考慮的應是美國的國家利益，在各項外交與國際議題上，盡力保守美國利益是其外交政策的優先目標（王信力，2019），而南韓也在 2017 年迎來在意識形態議題上更為強硬的新任總統文在寅，除了南北韓和解與朝鮮半島無核化談判外，在川普主政時期，日韓關係也出現巨大起伏，2018 年底因種種事件惡化的日韓雙邊關係，可能進一步損及美國、南韓與日本間的同盟互動，而急劇升高的美中對抗態勢，也為區域的安全穩定增添波瀾。

第五章將討論維持美、日、韓同盟與準同盟關係的主因：「對外的共同威脅認知」是否出現變化，美、日、韓三國是否仍對於主要的外在威脅北韓存在共同認知，以及當美國與中國的對立情勢升高，日本與南韓對於中國的認知是否也出現了轉

變，同時也將討論日本與南韓雙邊互動中，日韓之間的彼此認知為何，以及造成此認知的主要原因，藉此補充說明在現今時空環境中，敵我認知因素的變化。

最後，末章則總結上述章節的研究成果，並對研究目的中所提到的幾個問題做出回應，並檢驗車氏的理論是否仍對二十一世紀以後的日韓關係具有解釋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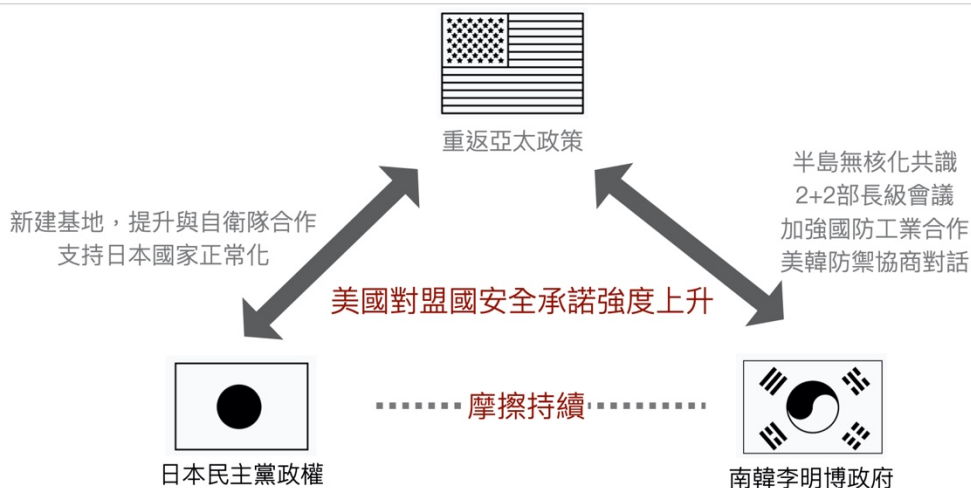


第二章 歐巴馬第一任期的美、日、韓關係

歐巴馬總統在美國身陷中東戰事的情況下接任美國總統，在美國經歷金融海嘯與戰爭拖累的情況下，歐巴馬政府調整了前朝以中東地區為重的外交政策，使得亞太地區的重要性獲得提升，美國外交政策此一大幅度的調整，牽動了東北亞與太平洋地區的國際環境，美國與日本、南韓的同盟關係也隨之出現變化。本章之中將對歐巴馬政府的外交政策變化，以及其對美日、美韓和日韓關係的影響。

圖 2-1 歐巴馬第一任期的美、日、韓關係簡圖（作者自行繪製）

歐巴馬第一任期（2009-2012）的美日、美韓、日韓關係




第一節、歐巴馬總統第一任期的東亞外交政策



2009年1月，歐巴馬（Barack Obama）自小布希（George Bush）手中接下美國總統一職，而布希總統所留下的外交政策困境也一併交付給歐巴馬，2001年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美國的外交政策重心即轉向中東反恐戰爭，對亞太地區的關注下降，雖然布希政府仍強調加強與亞洲盟國的合作關係是美國重要的國家利益，但仍引發亞洲盟國的疑慮，歐巴馬上任後即表明將重新調整美國的外交政策以期維護美國國家利益與保持與盟邦的友好穩定關係，然而其上任之初仍著重於處理中東戰爭問題及對抗恐怖主義擴張，直到2010年，美國的東亞外交政策才出現實質上的轉變與發展。

2010年，歐巴馬總統發表其任內第一份國家戰略相關報告：《國家安全戰略報告2010》（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0），其中提到隨著中國與印度等區域大國對國際事務的參與加深，美國必須透過更全面、積極的參與國際事務與區域議題來維持並強化影響力，並且加深與盟邦、同盟國的合作關係，使國際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更符合美國所追求的安全環境，而在亞太區域內，報告中也提到日本與南韓在區域中已經成為應對區域與全球議題上的重要夥伴國家，而美國與日本、南韓間的軍事同盟體系也是美國在維護東亞區域安全的重要基礎，美國也將維持駐在日本與南韓的美軍力量以維持區域安全的穩定，持續性地與重要同盟國發展安全等合作關係將是美國在東亞外交政策上的重點（Obama, 2010: 43-46）。


在較早之前所發佈的《四年期國防部防務報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10）中，美國國防部也肯定了日本與南韓在美國東北亞、東亞區域安全維護中的重要地位，並認為持續性地維持美軍駐地數量有助於鞏固美國與兩個重



要盟國間的安全承諾，此防務報告也指出，在中國國力持續增長之際，東亞的區域安全環境已經出現巨大變化，美國將據此調整與日本、南韓之間的軍事合作與防衛方針，確保同盟國家與美國的安全均能獲得保障與嚇阻潛在的威脅（U.S. Department of Defense，2010：1-4）。

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Diane Rodham Clinton）2010 年於布魯金斯智庫機構（Brookings Institute）的演說也提到（Clinton，2010），美國在國際上的領導地位需要透過更多的國際參與及提供更多合作與援助機會才得以維持，而在眾多國際事務的挑戰下，美國不僅需要協助其他國家克服挑戰，同時也需要盟友國家的支持才得以處理複雜且多變的全球性議題，而日本與南韓兩大同盟國即是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重要支柱

2011 年美國國防部所發表的《國家軍事戰略報告 2011》（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2011）則提到，區域強權的興起已經使得全球安全環境出現變化，尤其是在亞洲區域之中，存在著快速茁壯的區域強權，而美國與其盟國必須面對並適應這一嶄新的安全環境，同時提出對策才得以維持美國在亞洲區域內的影響力與安全秩序，報告中（U.S. Department of Defense，2011：2-4）也強調在亞洲尤其是東亞區域之中，美國與南韓、日本的合作關係對維持區域中的安全穩定極為重要，維持美國在東亞區域內堅實的同盟關係，並給予同盟國強而有力的安全承諾是美國戰略安全佈局的重要目標。另一方面，此報告也認為美國應該協助南韓與日本在同盟體系中負起更多責任，包括美國應與日本合作提升日本的防衛能力等；而同樣地，美國國防部（2011：13-14）再度強調駐日美軍與駐韓美軍在東北亞區域中的重要地位，並認為美國應加強與東北亞盟國的軍事安全合作關係，藉以面對中國崛起後產生變化的東北亞安全環境。



2011 年年底，美國時任國務卿希拉蕊於《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發表了名為〈美國的太平洋世紀〉（*America's Pacific Century*）的文章，被視為是美國對外與對內展示其嶄新亞太外交政策主軸的重要宣告，內容提到在中東問題告一段落後，雖然對抗恐怖主義仍是美國的重要任務，但亞太地區將逐步成為國際事務與美國外交政策推展的核心，美國接下來外交政策所著重的將是在亞太（*Asia-Pacific*）地區之中推展美國的經貿、外交與軍事利益、加強在區域中的影響力，並且加強與區域內強權國家（如中國）的合作關係，同時避免美國在區域內被邊緣化，同時，美國對其國家定位也出現轉變，積極表態其為「太平洋國家」的一員，在各項利益的保障上均與其他太平洋國家相互關聯（*Clinton, 2011*）。


另一個觸動美國更新亞太外交政策的關鍵點即是中國的崛起（*Pettyjohn, 2012: 92-93*），隨著中國在改革開放後迅速累積經濟實力並提升軍事能力，其不僅對周邊國家的安全造成挑戰，對區域中舊有霸權美國也構成壓力，雖然中國始終強調和平崛起、不對世界秩序帶來威脅，但美國仍必須正視中國在區域內實力擴增的事實（*Kelly, 2014: 48*）。對美國而言，中國對其在亞洲原有的軍事部署、推行的價值體系與所提供的安全承諾甚至是經濟利益都構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戰，而東亞區域內與美國享有軍事同盟關係的國家也因此需要加強與美國的安全合作、要求美國提供更為有力的安全承諾來保障國家安全，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安全利益與價值觀念（人權保障、民主政治等）的推展都必須有穩固的同盟關係與宏觀的外交政策佈局來支撐（*Terrence et al., 2014: 58-59*），而這些關鍵國家利益的保障即是美國在歐巴馬時期亞洲外交政策的目標與基礎。

而 2012 年底，美國國防部的《維持美國全球領導地位：21 世紀防衛的優先性》（*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報告中提出了「再平衡（*Rebalancing*）」概念，認為在中國對區域安全環境造成挑戰時，美國

必須投入更多資源與軍事部署、加強與盟邦的合作關係才能在中國戰略意圖尚不明朗之際，維持美國在區域中的優勢地位與對東亞盟邦的安全承諾（U.S. Department of Defense，2012：6-7）。



歐巴馬任期中，美國的東亞區域外交政策目標是改變前任政府對東亞與亞太地區較為退卻、冷淡的情況，在先前段落所提及的多項政府報告書中也指出，東亞地區內已然因中國的國力提升而出現與以往不同的安全環境變化，而美國在其「重返亞太」、「亞太再平衡」的一系列外交政策作為中，在東亞盟國的同盟關係鞏固上主要有幾項較為重要的戰略佈局方針：使盟國負擔更多維護安全環境穩定的責任、維持盟國對於同盟體系的意志以及謹慎應對區域內安全環境與氛圍的變化（張凱銘，2011：188-189）。第一，美國期望透過軍事裝備的販售、軍事相關事項的合作等方式加強其東亞盟國對於國家安全的防衛能力，同時也希望盟國能在區域中參與更多合作事務，從依賴美國提供安全保護的依賴者轉變為能夠協助美國的夥伴國家（U.S. Department of Defense，2011：7-8）。第二，美國期望維持東亞盟國對同盟關係的信任，尤其在南韓、日本兩大同盟國相繼出現主張「外交自主」的領導人後，美國在東亞的同盟關係更是需要同盟國的穩定支持，因此美國也透過建立穩定且密切的交流溝通機制、更為擴大的安全交流與合作（唐欣偉，2013：8-9），期望挽回因美國早前外交政策偏重中東地區而疏離的東亞盟國。第三，由於區域安全情勢的轉變，美國與中國、俄羅斯等區域強權國家時有摩擦，而零星出現的緊張情勢一旦成為戰爭的導火線，對美國與其區域同盟國家都將極為不利且帶來巨大損失，同時，北韓核武問題也持續造成區域的安全局勢不穩（李大中，2010：19-20），因此美國必須謹慎把握東亞與亞太地區的安全氛圍，在衝突升溫或對抗增加時，做出相對應的措施解除緊張以維持區域內安全環境的穩定（張凱銘，2011：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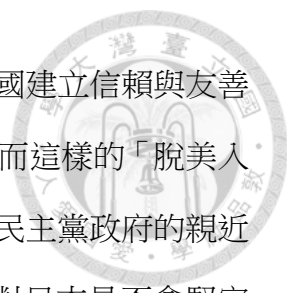
總結而言，歐巴馬政府在 2009-2013 年間的東亞外交政策，自 2010 年底將亞太地區列為外交與國際事務重心的態勢明朗後，美國與同盟國家、太平洋週邊其他友好國家的交流與合作皆趨於密切，而美國與中國的互動也影響著區域內國際關係的變化，隨著美國國家定位的改變以及對中國國力上升的現實認識，美國在東亞與亞太區域內追求影響力維持的目標之際，也必須避免區域安全環境因強權競逐而出現衝突或戰爭的可能，而美國與其在東亞重要的同盟國家日本、南韓間的互動關係也隨著美國外交政策重心的調整而出現變化，這些變化使得美國給予兩國的安全承諾強度隨之改變，在本文的研究脈絡中，美國給予日本與南韓的安全承諾強度變化將會進一步牽動美、日、韓三角關係，這些變化將在接下來的段落中詳述之。

第二節、美國與日本、南韓的同盟關係

隨著美國於各項報告、政府文書與官員演講上不斷宣告與強調「重返亞太」政策的啟動，美國與東亞兩大同盟國家的關係也受到矚目，面對中國在區域中不斷增加的軍事力量，美國需要南韓與日本在區域中共同提防中國的擴張意圖，而南韓與日本也需要美國持續提供穩固的安全承諾來保障國家安全，因此隨著美國的外交政策方針調整，美國在東亞兩組雙邊同盟關係也出現變化。

壹、美國與日本的同盟關係

2009 年，不僅美國迎來了新的領導者，日本政界也正經歷著民主化以來少見的改朝換代，多年來由自由民主黨（簡稱自民黨）稱霸的政壇風雲變色，由民主黨贏得眾議會大選，其黨魁鳩山由紀夫成為日本首相，隨著美國歐巴馬總統與日本民主黨首相相繼對國家的外交政策作出調整，日本與美國的關係也迎來冷戰結束後的重大轉捩點。有別於自民黨政權對美國的親近與依賴，民主黨政府主張日本應該



加強與亞洲國家，尤其是東亞區域內各國的連結與合作，並與中國建立信賴與友善的雙邊關係，同時應該與美國建立「對等」的同盟夥伴關係，然而這樣的「脫美入亞」的政策主張動搖了長年穩固的美日同盟關係，美國認為日本民主黨政府的親近亞洲國家政策是期望將美國排除在東亞區域秩序之外，同時也對日本是否會堅定維持與美國的同盟關係產生不信任感，而日本與中國改善的雙邊關係也引發美國的疑慮（何思慎，2012：8），因此美日關係在歐巴馬總統的任期之中，是在波濤洶湧之中揭開嶄新序幕的，雖然美國在 2010 年真正展開「重返亞太」的外交計劃，亟欲拉近與鞏固和日本的同盟關係，但同盟的雙邊關係中仍存在問題與嫌隙。

2010 年，日本首相由菅直人接替上任，美國與日本的同盟關係仍波動頻仍，美國期待日本落實已經延宕多時的駐日美軍普天間基地的遷移建設案，而日本民主黨政權仍因新基地選址所在地的居民反對及違背大選時政策承諾等因素對此舉旗不定，歐巴馬政府認為基地的遷移與興建將有助於維持駐日美軍的嚇阻力量、保障日本國家安全，同時解決美軍駐在地當地居民不滿的情緒（遷移案中將基地由人口密集處遷往沖繩島上人口較為稀疏的地區），因此強烈希望日本盡快動工興建普天間基地（林賢參，2010：113）。

隨著美國對參與東亞區域內事務的興趣提升，歐巴馬總統在 2010 年 9 月訪問日本，與首相菅直人的首腦會談中重申了美日同盟對東亞安全環境穩定的重要性，並且強調美方對美日同盟關係的信心與支持，同時中國與日本之間的領土爭議、中國國力與軍力崛起造成日本國內不安，以及 2010 年中升高的朝鮮半島緊張局勢，北韓對日本的威脅未減等等因素，使得歐巴馬所拋出的橄欖枝為日本民主黨政府所接受，菅直人政府重新調整了外交政策方針，強調美國與日本間的同盟關係仍是日本極為重要的戰略安全基礎（晉林波，2012：45），雖然普天間基地問題仍未獲得明確進展，但美日之間的緊張關係仍然獲得了緩解。



在美國的亞太政策中，日本作為東亞重要的軍事同盟國家，且有總數近四萬的駐外美軍駐紮在日本境內，因此美日同盟關係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外交、軍事部署均相當重要，在歐巴馬政府宣布美國將以亞太地區做為國際事務重心後，美國與日本的軍事合作也隨之增加，2010 年美軍在鄰近東京的神奈川設立新的前進作戰基地（Forward Operating Headquarter），以便因應緊急事件與加強與日本陸上自衛隊的合作，日本航空自衛隊也將指揮部移動到靠近駐日美軍橫田基地附近，以便協調防空系統的合作，在軍事合作上，雖然美軍沒有增加駐日美軍的數量，同時延宕的軍事基地遷移問題也造成美日關係的摩擦（Matteo，2014：151），但總體而言，美國仍向日本表達了其安全承諾的有效性，增加的合作項目也代表著軍事安全承諾上的加強，對維繫美日關係有著正面效果。

而美國重返亞太政策也使得日本的軍事防衛能力受到重視，而日本在追求「國家正常化」的努力，也隨著美國亞太外交政策調整而獲得支持，對美國而言，在國力與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若想維持美國在東亞的戰略優勢，則同盟國本身的防禦能力及承擔安全責任的能力均需要提升，才得以在美國整體的戰略佈局中奉獻足夠力量來維持美國與同盟國家在區域內部的軍事影響力，因此日本逐步進行的「國家正常化」政策中所牽涉的防衛力量升級、和平憲法修改等，對美日關係而言即不僅是日本的內政議題，而是牽涉了美國東亞戰略佈局的重要事件（Matteo，2014：160），因此歐巴馬政府樂見日本能夠在區域內透過國家正常化的政策擔負起更多安全責任，並協助對抗區域內部潛在的安全威脅，而對日本而言，美國所提供的支持也代表著同盟關係中承諾的穩定與加強。

在本文所採用的研究途徑中，美國對日本的重視程度提升、軍事合作的增加與駐日美軍數量的維持均代表著美國並未降低給予日本的安全承諾強度，而美國支




持日本提升防衛能力等行動也可被視為安全承諾強度的提升，美日關係在此時期雖有波折，但在美國重返亞太政策的推波助瀾下，美日關係仍然保持在相對穩定並和諧的情況。

總結來說，在歐巴馬第一任期之中，日本在民主黨政府的帶領下試圖開展與以往一面倒親美有所差別的外交政策，企圖改善與周邊亞洲國家的關係、尋求美國以外的其他外交標的，但在中國崛起等因素所造成的區域內安全環境變化使得美日關係的穩定成為日本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因此雖然美日關係經歷了些許摩擦，但實際上的軍事合作、雙邊關係均有所增加及提升，並未因這些外交方針上的改動而造成美日同盟關係破裂或冷凍。

貳、美國與南韓的同盟關係

2008 年，南韓大選結果出爐，新任總統李明博上台後，與前任盧武鉉政府時較為疏遠美國的外交政策不同，認為南韓應該在美國、中國、北韓等重要外交關係中保持平衡，不過度傾向於特定國家，在追求國家意義的保障上更加務實，因此美國與南韓的關係在其領導南韓的期間有所增溫（蔡維心，2015：70），加上美國隨著歐巴馬總統上任並宣告重返亞太政策開始進行後，更加著重與東亞同盟國之間的關係，因此美韓關係與盧武鉉執政時期相比改善許多。

在上一個小節中提到，美國與日本的關係隨著日本民主黨政府的執政而出現了疏離的情況，日本在追求更加自主的外交政策之際，挑動了美國對於同盟關係的不信任感，而這樣的美日關係疏離，成了決定修正前朝疏遠美國政策的李明博政府一個大幅度改善美韓關係的機會，李明博政府在美國推出重返亞太計畫後，即表達其支持並願意與美國加強各項合作關係，而美國與南韓也因此除了原先的軍事演




習、軍事合作、駐韓美軍數量維持以外，美韓兩國更逐步在促進區域安全、北韓問題以及對外國援助等議題上攜手合作，從地區性的軍事同盟夥伴關係，進一步走向「全球性夥伴關係」，雖然南韓親近美國的外交政策引發北韓強烈不滿，南北韓關係也在此時期降至低點並出現衝突跡象，但美國在北韓問題上對李明博政府的政策表示支持，也使得美韓關係在北韓問題上並未出現立場歧異（李明，2012：15），美國與南韓之間的安全承諾強度也因此獲得提升，南韓也對美韓同盟關係表達了更勝以往的支持與信任。

北韓於 2009 年宣布退出六方會談後，即宣布重新開始進行核子武器試驗，並不顧國際制裁與反對持續發展核子武器與洲際飛彈，隨著北韓金氏政權言語與實質行動上的挑釁頻率增加，美韓同盟的動向也因此受到影響。在李明博政府積極與美國加強同盟關係的同時，兩韓之間的衝突問題更加惡化，2010 年 3 月，南韓海軍天安艦在黃海海域進行例行性巡邏時被魚雷擊沉，造成嚴重死傷，而經過南韓組織跨國小組調查後，認定天安艦是遭到北韓魚雷攻擊才導致爆炸沈沒，但北韓並未承認，但美國在此事件中對南韓表達強烈支持，並大力譴責北韓挑釁行為不僅無助於半島和平，也對區域安全造成威脅（Reuters，2010/05/20）。

美國政府支持南韓政府的說法，再度引發美國與北韓的關係惡化，南韓卻感受到美國的善意，在 6 月時同意推遲盧武鉉總統執政時期已談判完成的戰時作戰指揮權（原先預計 2012 年，由美國移交給南韓）時間至 2015 年（劉德海，2010：1-2），同時美國與南韓均同意加強兩國同盟關係與軍事合作，已便應對對北韓持續升高的對抗意圖。

2010 年 11 月，南韓在進行年度例行性軍事演習，北韓對南韓位在延坪島的砲兵陣地進行攻擊，發射超過 150 枚砲彈，而南韓也發射砲彈回擊，雙方互相射擊超



過 200 枚砲彈並造成人員傷亡，南北韓此次武裝衝突不僅造成國際緊張，也造成南韓國內民意認為北韓仍是造成國家安全威脅的主要原因，並且有 6 成以上的南韓民眾認為天安艦事件的罪魁禍首就是北韓，超過半數的南韓民眾也認為北韓持續發展核子武器與其他飛彈或火箭是造成半島局勢不穩（以及南北韓無法進行統一相關進程）的重要因素（Kim and Friedhoff, 2011）。

2010 年接連發生的南北韓衝突造成半島局勢緊張，而延坪島事件發生後，美國也在第一時間決定與南韓進行美國與南韓聯合軍事演習來嚇阻北韓進行新一波攻擊的意圖，而延坪島砲擊事件與其引發的後續緊張情勢也為美韓軍事合作關係進一步拓展推波助瀾，除了 2010 年開始舉行的美國與南韓間的 2+2 部長級外交防務磋商會議外，南韓也決定提升國防工業水平，因此與美國展開一系列軍事國防工業相關的合作與技術交流，企圖提升南韓自身防衛力量；2011 年，美國與南韓決定開始進行「美韓防禦協商對話 (Korea-U.S. Integrated Defense Dialogue, KIDD)」，由兩國的國防部官員主持，共同處理美國與南韓之間的安全訴訟機制，這些關鍵且重要的措施與政策，使得美國與南韓之間的戰略安全合作更為緊密、全面，同時也強化了危機管理、情報交流等軍事合作機制（蔡維心，2017：138-141），這些緊密合作、加深同盟關係的措施均可被視為美國對南韓的安全承諾強度提升。

車氏的假說認為，美國對同盟國所採行的政策與合作計畫將牽動同盟國對同盟關係的信任程度，而做為東亞重要同盟國的李明博政府，實際上對美國的安全承諾仍有些許懷疑（Cha & Katz, 2011：61），隨著歐巴馬政府與李明博政府的交好，南韓與美國之間的軍事交流、國防工業合作以及 2+2 部長級會議的舉辦，美國政府向南韓展示了其鞏固東亞同盟國關係的決心（安全承諾強度上升），美韓關係的提升也代表著南韓信任美國所提供的同盟承諾。面對北韓問題，南韓在李明博政府的領導下，與美國期待完成半島無核化的立場一致，因而與北韓關係惡化，在國家安全

威脅與戰爭風險增加的情況下，美國的安全承諾對南韓而言顯得格外重要（李明，2013：42），因此在美國外交政策方針改變與北韓威脅的促成之下，美國與南韓關係來到冷戰結束後的高點。



總結來說，在歐巴馬第一任期中，在李明博政府對北韓採取強硬態度後，南韓對於半島爆發戰爭的恐懼加深，美國的安全保護傘及駐韓美軍的存在對處於戰爭恐懼的南韓而言更顯重要，美國政府也期望南韓透過調整國防政策進一步負擔並協助美國維持東亞安全秩序的責任，而天安艦沈沒事件與延坪島砲擊事件的發生，明顯使得南韓意識到美國的支持及安全承諾是其在東亞區域中維持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的重要基礎，加上美國政府在這些事件上對南韓所表露的堅定支持，讓南韓與美國的關係進入更為緊密連結的新階段，美韓同盟也更加鞏固，美國所提供的安全承諾強度提升也取得了南韓的信任。

綜上所述，在歐巴馬第一任期中，隨著美國重返亞太政策（2010 年起）的宣告與推展，相較於早前較為冷淡且缺乏關注的美國與東亞地區關係，在 2010 年以後，美國與日本、南韓兩個東亞同盟國的關係均獲得了強化與積極進展，雖然日本在此期間經歷了政權轉換與外交方針調整，而南韓則經歷了與北韓之間緊張情勢升高的挑戰，但在兩組雙邊關係的互動中，仍可觀察到在美國加強對盟國安全承諾的強度後，美韓與美日同盟關係都出現了增溫的情況，而各種軍事合作、演習與國防工業交流也逐步開展，再再顯示美國重返亞太政策給予了東亞盟國的信心與支持，且進一步也促進了美國所建構的東亞安全秩序之維持，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從車氏的假說出發，此一時期是美國所給予的安全承諾強度上升，日本與南韓兩大同盟國對美國信任上升，使美韓與美日之間分別出現同盟關係鞏固的時期。

另一方面，在歐巴馬第一任期之中，北韓仍是造成美國、日本、南韓國家安全

威脅的主要來源，而美、日、韓三國在對應北韓核武威脅的外交政策上，仍將其視為一造成區域安全不穩的共同威脅，也因此三國在此時期仍存在著對外共同的威脅認知。



第三節、日本與南韓的關係

在探討日本與南韓之間的關係時，本文將採用的兩個指標分別為：首腦與外交高層官員的互相訪問次數以及日韓兩國進行雙邊安全保障對話的次數，由於外交關係的疏遠或緊密通常反映在兩國元首與高層官員互動、訪問的頻率上，因此將日韓官員互訪的次數列為評估兩國關係的重要指標；而「日韓安全保障對話」是日本與南韓之間就國家安全、區域重要安全議題交換意見與合作的對話平台，由國防與外交高層官員出席，其舉辦的時間並不固定，自 1998 年首度舉辦後，日韓安保對話通常會視兩國關係與周邊區域內安全相關事件、政策的需要而決定舉辦時間，因此可被看作是日韓安全合作關係親疏程度的重要指標，本文將採用這兩個重要指標作為探知日韓外交與安全合作關係的變化依據。

在歐巴馬第一任期中，日本與南韓之間所進行的元首（首腦）、外交高層官員互訪與會談次數如表 2-1 所示，若以歐巴馬總統與其外交團隊真正開始進行「重返亞太」政策的 2011 年為分界點，美日與美韓關係的具體改善、鞏固與強化連結均是發生在此政策開始實施之後，那麼可以觀察到，在 2011 年後，日韓兩國領導人之間實際的會面、互訪與電話會談次數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雖然外交部長層級會談沒有出現大幅下降趨勢，但與前幾個年度相比，2011 年起日本與南韓之間首腦進行對話的次數不僅呈現下降，更重要的是，以往兩國領導人亦常會就北韓飛彈試射等緊急事件進行電話會談並交換意見，並透過實際會面的場合進行兩國首腦會談，但在 2012 年兩韓關係依舊緊繃且北韓仍有進行透過火箭發射衛星等動作的情

況下，日本與南韓卻僅僅在 12 年 5 月時於參加日、中、韓高峰會時進行當年度唯一一次領導人會談，其他顯見雙邊關係有所降溫，會中就北韓問題、日中韓簽署 FTA 等相關議題進行討論（日本外務省，2012），但會後也並無進一步合作，因此對日韓關係的推進而言，2011 年與 2012 年不僅是磨擦增加的重要時間點，也是對話頻率、廣度與深度均下降的時期。

表 2-1

2009-2012 日韓高層互動統計

年份	日韓領導人互訪 與會談（實際會 面）	日韓領導人電話會談	日韓外交部長會談
2009	4	4	11
2010	4	5	6
2011	4	3	7
2012	1	0	7

（單位：次數）

資料來源：日本外務省，2009-2012，〈大韓民国 過去の要人往来・会談〉

另一項日韓關係指標：日韓安全保障對話，則只有在美國外交政策重心仍在中東地區、重返亞太計畫尚未提出的 2008 年（第八次）與 2009 年（第九次）各舉辦了一次，2008 年時日本與南韓在這兩次安保對話中認為做為美國的盟國，雙方應該就安全議題上相互合作，同時也必須合力避免北韓核武問題動搖區域安全與雙方的國家安全（日本外務省，2008），而 2009 年的安保對話也特別就北韓違反六方會談協議的情況進行討論，並繼續尋求在安全方面的協力與合作，並肯定日韓雙方持續進行的對話與交流有助於提升雙邊的國際關係，並且加深對彼此的理解與信賴（日本外務省，2009）。



日韓雙方在 2010 年後即沒有再舉辦日韓安保對話，但北韓在 2010 年後的挑釁行為、飛彈試射等威脅並未減少，甚至其發射飛彈與火箭的頻率有增加的跡象，而 2010 年中接連發生天安艦遭魚雷擊沉與延坪島砲擊事件也是對於兩國國家安全重大威脅的警訊，北韓一連串的行為與挑釁也造成區域內鄰近國家的緊張以及引發國際關切，而同時間中國對外的軍事擴張也並未止息，在此國際安全環境劇烈變動之際，卻未見日韓兩國針對此重大國家安全威脅再度進行安保對話，可探知兩國關係可能出現低盪與摩擦，因此就算面對共同威脅對象的壯大與激烈挑釁行為，仍為促使日本與南韓再度討論應對方式與合作共識。


表 2-2

2008-2012 日韓安保對話統計

年份	日韓安保對話
2008	第八回
2009	第九回
2010	無
2011	無
2012	無

資料來源：日本外務省，2009-2012，〈大韓民国 過去の要人往来・会谈〉

日本與南韓在 2008-2009 年間因南韓李明博政府期望改善日韓關係而出現了較多的交流、對話，因為美國仍處於中東戰爭的泥淖中而無從關切東亞區域事務，在車氏的假說中，在歐巴馬總統第一任期前半段是美國對東亞盟國的安全承諾強度較為低落的時期，因此日本與南韓在小布希政府執政尾聲到歐巴馬總統執政初期有較為頻繁的互動，並且試圖尋求雙方合作以共同面對北韓問題，與其假說相符



合，而在 2010 年開始，歐巴馬政府逐步轉變的外交方針以及政策宣告美國將把外交事務重心由中東移往亞太地區，同時著手鞏固在東亞等地的同盟關係，在美日、美韓同盟關係相繼改善與增強後，日本與南韓的關係即如車氏假說中所認為的進入較為冷淡、摩擦較多的時期。

而從其他具體事件來看，日本與南韓的關係的確在美國對東亞盟國的安全承諾強度提升後再度出現雙邊關係降溫的跡象，在車氏的假說之中，日本與南韓之間的歷史問題是雙方始終難以信任彼此、建立穩定交流合作關係的背景因素，尤其在美國對同盟國安全承諾強度提升時，促使日韓合作的誘因減少，歷史問題往往會成為雙邊關係的重大阻礙。在歐巴馬第一任期後半段，隨著美國對亞太地區的關注增加、加強與東亞盟國的關係，美韓與美日關係均獲得提升後，歷史仇恨問題便再度成為日韓關係改善的絆腳石，2011 年年底，南韓李明博總統在訪問日本之際，「向慰安婦道歉」等歷史議題再度成為日韓之間爭論不休的問題(*The New York Times*, 2011/12/19)，2012 年南韓國內也持續出現要求日本正視「慰安婦」問題的聲浪，縱使李明博認為改善日韓關係對南韓而言有利，但南韓國內民意迫使李明博政府對日本的態度轉趨強硬，要求日本政府應該積極面對殖民與二戰時期所遺留的歷史問題。

李明博於 2012 年 8 月登上長期處於日韓領土爭議之中的獨島（竹島）（朝日新聞，2012/08/10），引發日本政府與民間的強烈不滿，日韓關係也隨即再度急凍，兩國元首在 2012 年後互動頻率也大幅下降，日韓關係的緊繃也一路持續；同時，從此處也可觀察到，當日本與南韓關係出現摩擦時，無論是否肇因於歷史問題，兩國之間的歷史仇恨仍是雙邊互動關係中難以跨越的高牆，歷史仇恨也時常被擴大為外交爭端，在近二十年來，日韓之間的摩擦導火線往往是歷史問題的爭端，而隨著領導人重視程度與面對歷史的態度不同，日韓間的歷史仇恨問題似乎也出現了

日益嚴重並且分歧程度上升的情況。



總結而言，歐巴馬第一任期中，美國、日本與南韓之間的兩組雙邊同盟關係、一組雙邊「準同盟」關係的互動與車氏所提出的假說一致：當美國（日本與南韓所共同擁有的同盟國）提高其給予同盟國家的安全承諾強度時，日本與南韓在區域中的安全感會因此而獲得提升，則日本與南韓的雙邊關係即會進入相對低盪、摩擦增加的時期，與此同時，對於此擁有共同威脅認知所組成的三組雙邊關係而言，被視為共同威脅的北韓在此時期的挑釁、不遵守原先承諾的行為是增加的，其造成威脅的程度有所提升，換言之，日本與南韓在面對日益強烈的共同威脅訊號、美國提升安全承諾強度的情況下，如車氏所認為的，仍受限於歷史仇恨等問題難以攜手合作，因此車氏的假說在歐巴馬總統的首任任期中仍能解釋美、日、韓關係的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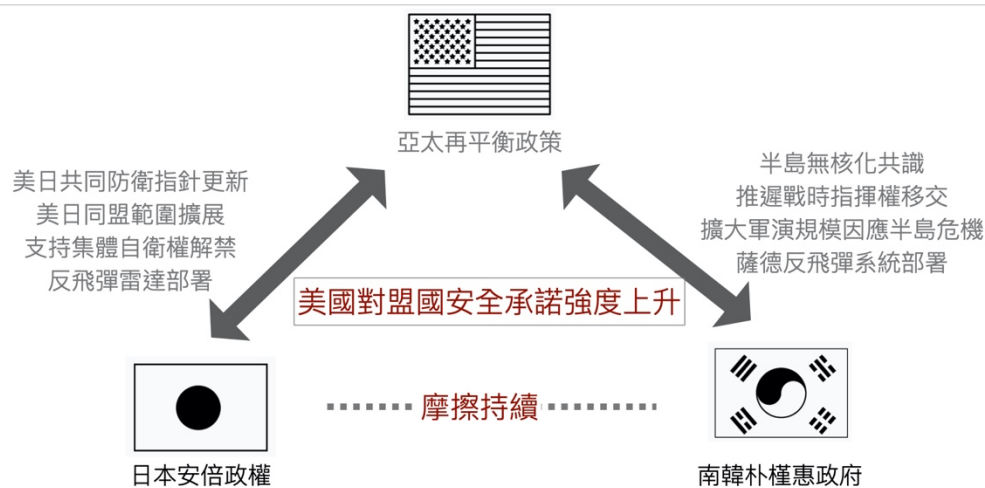
第三章

歐巴馬第二任期的美、日、韓關係

隨著第二任期的開展，歐巴馬政府擴大了重返亞太政策，更加著重「再平衡」的效果，期望透過鞏固同盟關係，並且積極參與亞太地區的國際事務，達到維持美國領導地位、增進國家利益的效果，而美日與美韓同盟關係也因重返亞太政策而獲得加強與深化。本章節將聚焦歐巴馬總統第二任中的重返亞太政策推展，以及受其影響的美日、美韓、日韓關係。

圖 3-1 歐巴馬第二任期的美、日、韓關係簡圖（作者自行繪製）

歐巴馬第二任期（2013-2016）的美日、美韓、日韓關係



第一節、歐巴馬總統第二任期的東亞外交政策



2012 年，歐巴馬總統再度於美國總統大選中勝出，順利取得連任資格，而其連任美國總統也代表著「重返亞太」政策將獲得延續，而歐巴馬政府在 2012 年中也將亞太政策的主要目的具體化，除了前一章所提到的「重新讓美國在亞太地區成為影響力深遠的大國」之外，在歐巴馬總統第二任期之中，亞太政策的核心包括了「區域內的權力再平衡 (Rebalancing)」，「再平衡 (Rebalancing)」政策隱含著美國期望透過外交政策的各種手段，使得東亞與整個亞太地區內的權力分配回歸至美國為主導的秩序之中，透過各種雙邊與多邊關係的加強與鞏固，使得美國所主張的價值觀念、安全承諾與區域秩序得以維持 (張凱銘、廖顯謨，2013：70-71)，而歐巴馬政府的發言、報告書等也明確指出中國在戰略安全議題上已成為美國的潛在競爭者，美國在區域內需要更強健的同盟關係與更宏觀的軍事戰略部署來因應中國的崛起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2012：2)。

而重返亞太政策之中也強調美國將把外交政策與經貿發展的重心由中東等地區轉移至亞太地區，同時也期望透過重心的轉移，以及更多多邊與雙邊合作關係的開展，避免美國持續陷入戰爭泥淖，並挽救因 2008 年金融海嘯重創而難以復甦的經濟情況，因此歐巴馬政府在第二任期中更為強調在東亞區域內的國際參與、經貿合作與軍事交流 (Davidson，2014：78)。

在歐巴馬第二任期中，除了國內需要面對國會對其外交經貿政策的質疑與不信任外，在東亞區域內所遭遇的挑戰也未見減少，除了日本與南韓兩大重要盟國再度經歷政權交替之外，區域強權中國對區域內既有秩序的挑戰意圖日趨明顯，其在太平洋西岸的軍事力量擴張也造成東亞其他國家的緊張，同時北韓持續進行的核子武器試驗、飛彈試射及零星的武力衝突都造成了南韓與日本的國家安全威脅，而




北韓持續精進的核子武器設施也對美國本土的安全構成威脅，金氏政權拒絕與美國及其他區域國家對話的強硬態度，也使得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難以趨緩。

與此同時，隨著歐巴馬政府所推動的「亞太再平衡」政策，駐在亞洲的美軍數量增加，而軍事花費的支出也逐漸增加，批評者認為歐巴馬政府此舉是在與中國進行軍備競賽（Arms Race），對於經濟衰退且國力有下降趨勢的美國而言無疑是沈重的負擔。伴隨中國改變區域秩序意圖而來的另一問題是可能爆發的戰爭，在東亞之中存在許多可能的熱點（Flashpoints），如朝鮮半島、台灣海峽、東海等（Binnendijk, 2016：99），歐巴馬政府的東亞外交政策必須審慎進行，避免戰爭的爆發，同時維持美國在區域中的影響力及安全承諾強度，避免喪失區域中的領導權。

具體而言，歐巴馬政府在第二任期之中對亞太地區的關注有增無減，而美國與東亞兩大盟國日本、南韓的關係也透過各項合作政策持續強化，透過同盟之間防衛指針的修訂、軍事演習的擴大舉辦、國防工業的技術指導等方式，持續維繫東亞盟邦與美國的關係，並加強盟邦對美國安全承諾的信任，而在面對區域重大威脅北韓時，歐巴馬政府的立場仍堅持北韓必須放棄發展核子武器並與周邊國家進行友善交流與溝通（Tow, 2015：14）。另一方面，歐巴馬政府雖然在各項軍事戰略報告書中將中國認定為潛在的軍事競爭對手，但歐巴馬政府仍致力於加強與中國之間的交流，同時避免日本等盟國與中國間的領土爭端成為戰爭的導火線，並將美國的軍事戰略部署重心轉往亞洲並期望遏止中國對區域乃至全球安全秩序的挑戰，並且給予東亞同盟國更為強力的安全承諾。

值得一提的是，歐巴馬政府在第二任期中，除了與第一任期同樣注重東亞傳統同盟國如日本、南韓的同盟關係鞏固之外，其對東亞區域的重視也延伸到美國在越戰後較少關注的東南亞，隨著東亞區域整合風氣盛行，日本與南韓兩個盟國也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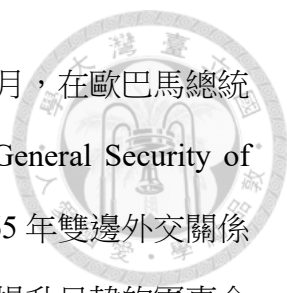


2000 年後相繼加入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的峰會體系之中（ASEAN+3），美國則在歐巴馬主政後於首度參與東協峰會，歐巴馬政府在 2015 年亦將美國與東南亞國協間的關係提升為戰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美國在重返東南亞的努力可見一斑（洪銘德，2015：154）。

而面對威脅美國與其同盟國安全的北韓，歐巴馬政府在第二任期中並未對其「朝鮮半島無核化」政策做出巨大調整，同時期望透過持續性的制裁迫使北韓金氏政權重新回到談判桌。

駐外美軍方面，駐在日本與南韓的美軍數量雖未顯著提升，但美國時任國防部長黑格於 2014 年宣布將增加美國在亞太地區地面與空中的軍事部署(Keck, 2014)，美國在軍事部署的重心從歐洲、中東地區轉移到東亞與太平洋地區，除了遏止美軍在東亞區域內的影響力流失，同時也是給予東亞同盟國家更強健的安全承諾保證：美軍預計將駐外美軍的 60% 轉移至亞太地區，同時在澳洲、菲律賓等盟國增加海軍部署以面對中國在海上軍事實力的擴張並保證國際海域的自由航行權（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12：21），隨著駐外美軍部署的調整，也象徵美國的戰略部署重心出現轉移，美國將更加注重亞洲太平洋地區甚至是印度洋週邊的區域安全和穩定，此一重心的轉移也可被視為對亞太盟國安全承諾的強化。

另一方面，歐巴馬的第二任期中也加強了同盟國間的合作關係推動，並特別著墨在東北亞最重要的兩大同盟國日本與南韓之間的軍事交流、軍事合作關係，雖然日本與南韓的雙邊關係在歐巴馬第一個任期末發生了李明博登獨島（竹島）事件而陷入低谷，但歐巴馬順利連任後並未放棄調停日韓之間的爭端。2014 年歐巴馬藉荷蘭核安全峰會促成日美韓首腦會談，雖然日本和南韓自 2012 關係惡化後即停止舉辦日韓首腦會談，但在歐巴馬的主持下，席間日韓領導人仍就北韓核武器等安全



議題進行意見交換（日本經濟新聞，2014/03/21）。2016年11月，在歐巴馬總統的強勢促成下，日本與南韓正式簽署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GSOMIA）》，是日韓之間自1965年雙邊外交關係正常化以來，首度簽署軍事合作相關協定，美國期望透過此協定提升日韓的軍事合作與情報交流關係，共同面對北韓、中國等區域威脅，由此可見對美國而言，促使日本與南韓之間的關係改善、和緩並進一步合作也是重返亞太政策中的重要環節。

綜言之，歐巴馬總統在其第二任期中的東亞外交政策仍不脫其鞏固同盟、對抗區域威脅以及提升亞太地區影響力及領導地位的重要政策目標，而相較第一任期末段較為著重於與日本、南韓兩個傳統盟國的關係強化，在其第二任其中美國更為積極地參與東亞區域內的各項國際整合，並加強軍事戰略的部署與建立其他夥伴或同盟關係，期望透過與更多國家進行雙邊和多邊的合作來確保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雖然本文的研究所著重的是美國與東北亞盟國的關係，但美國對整個東亞區域內議題、國際事務、區域經濟整合的關注提升並範圍擴大，同時也是宣示美國外交政策重心轉移的重要指標，因此本文認為，美國對東亞、東南亞的整體關注以及參與的增加，亦對其給予日本、南韓的安全承諾有加強效果；同時歐巴馬在第二任期中並未忽略與南韓、日本的關係深化，除了軍事方面合作的持續進行、駐軍的數量維持之外，美國也更加期望日韓之間能冰釋前嫌，攜手為美國所建立的東亞區域秩序貢獻一國之力。

第二節、美國與日本、南韓的同盟關係

隨著歐巴馬總統第二任期的展開，其重返亞太的外交政策也迎來下一篇章，對東亞區域事務的參與與積極爭取亞太地區國家的支持，是美國除了鞏固原有盟友關係外，重要的外交目標；在傳統盟國關係上，美國也透過各種政策與合作事項來

持續加固同盟關係，同時遏止中國在區域中軍事勢力擴張，在此情況下，日本與南韓做為防堵中國的第一線國家，美國的一舉一動都將牽動區域中的國際權力秩序，並改變美國與日、韓之間的同盟體系。



壹、美國與日本的同盟關係

2012 年年底，除了美國歐巴馬總統順利在大選中脫穎而出贏得勝利之外，美國遠在太平洋西側的盟國日本也迎來了國會大選，由安倍晉三所領導的自由民主黨（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中大勝，而安倍晉三也回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自民黨的親美立場，以及重視美日同盟體系的外交策略，被視為修補日本民主黨執政時期疏遠美日關係的一帖良藥，而在歐巴馬與安倍晉三的領導之下，美國與日本的同盟關係也步入了新的階段。

2013 年 2 月，安倍晉三展開訪美行程，於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of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發表“Japan Is Back”的政策演說，回應美國前國務卿阿米塔吉與學者奈伊於 2012 所提出的美日關係報告書（The U.S.-Japan Alliance Anchoring Stability In Asia.）中對日本外交政策與國際地位的提問，安倍晉三在演講中強調日本將持續保持在東亞與印太地區中各項議題與制度的倡議者，同時也將與美國等重要盟國共同維護普世價值，並且成為美國重要且有效的同盟夥伴（日本外務省，2013），此次訪美行程可視為安倍政府所領導的日本與美國進一步修補並鞏固美日同盟體系的重要宣告與開端。


安倍上任後不久即宣布美國與日本之間爭議已久，並在日本民主黨政府執政時期被延宕的沖繩普天間基地遷移案將重新進行討論，且向沖繩政府提出土地徵收要求，為普天間基地的遷移地點做出決斷，此強硬舉動雖然引發沖繩民眾強烈不

滿，但普天間基地遷移事件已經自 2006 年起不斷拖延，美方已多次表明期待日本政府可以盡快協助進行基地遷移，因此安倍此舉雖然可能引發民意不滿，但對於鞏固美日同盟關係有正面幫助（Green & Szechenyi，2013：17-18）。



2014 年 10 月所舉辦的美日 2+2 部長級會議，除了達成美日將在次年更新共同防衛指針的共識以外，美國與日本之間也簽署議定書將修改 2009 Guam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GIA)，為駐日美軍部分遷移至關島做細部的調整與規劃，並能在遷移同時力求維持日本防禦能力不減、國家安全穩定，從此處可以觀察得知美方仍願意提供強力且有效的安全承諾給日本，並且也更加尊重日本政府與國內民意對駐日美軍的看法與期望（Green & Szechenyi，2014：16-17）。

2015 年，美國與日本共同發表修改更新後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U.S.-Japan Defense Guidelines），此次修訂是以 1997 年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作為基礎，進一步就美日之間的軍事合作範圍、灰色緊急事態的應對等議題進行討論與界定，新版的防衛指針進一步擴充美日同盟合作的範圍，自日本周邊至全球，美國與日本之間將透過各項軍事合作「無縫（seamlessly）」保衛日本的國家安全，以及區域乃至全球的和平穩定，在強化同盟的具體事項上，除了原先已經存在的軍事合作以外，美日兩國將依照新防衛指針成立「同盟協調機制(Alliance Coordination Mechanism)」，共同評估國際情勢、進行軍事情報分享等合作。另一方面，美日同盟以往的軍事合作項目多著重於傳統防衛性武力與傳統安全層面，此次指針修改也將非傳統安全項目列入兩國軍事合作的範圍，力求使日本在各項安全議題上都能自美日同盟體系中獲益並保障國家與區域安全穩定（古詩涵，2017：22），在本文的研究脈絡中，此次美日防衛指針的更新可被視為美國與日本之間軍事安全承諾的有力承諾與關係強化。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受限於和平憲法而不能擁有正規的國家軍隊（主要受限於日本國憲法第九條），僅能成立以防衛國家為主要任務的自衛隊，安倍晉三在其第一次首相任期內即積極尋求日本國家正常化的政策推動，而在第二次回任首相後，安倍晉三也宣布將開始推動憲法修改等國家正常化的制度修改。2014 年起，安倍晉三透過新的憲法解釋、新安保法等手段解禁日本對外武力的使用限制，透過「集體自衛權」使日本自衛隊能在「與日本關係密切的鄰近國家」遭受攻擊時，依情勢決定是否出兵與他國交戰，而此一法律修改受到了美國歐巴馬政府的支持，認為日本在國家逐步正常化後，能更加有效地與美國進行軍事合作、維護區域安全秩序，並成為美國在東亞區域中更為對等、積極的盟友國家（Binnendijk，2016：111-113），而美國在日本提升軍事能力上的支持也成為美日同盟關係強化的催化劑，雖然此一政策支持並非傳統上的安全承諾給予，但本文認為在日本透過國內法律手段提升安全防衛能力並獲得重要盟友支持的情況下，此事仍可視為美國對日本安全承諾強度的提升。

另一方面，由於北韓持續性地進行核子武器試驗、飛彈與火箭的發射試驗等威脅東北亞區域安全，2013 年初起，北韓除了在 2 月進行核子試驗外，更在 5 月時朝日本海發射四枚短程的導彈，造成南韓、日本國內的緊張與恐慌，甚至引發朝鮮半島危機，2014 年 6 月北韓又再度朝公海發射疑似砲彈的飛行物體，幾次飛彈試射事件發生後，美國與日本開始就增加部署飛彈防禦系統作出討論，日本原先在 2006 年由美國海軍部署了第一部 AN/TPY-2 雷達，2007 年時部署了愛國者飛彈，而在 2013 年接連出現北韓飛彈試射後，美國建議日本應該強化其反導彈系統在本土的部署與運作，宣布將在日本境內部署第二部 AN/TPY-2 雷達，並與日本進行合作共同開發能有效反應北韓飛彈的反飛彈防禦系統（U.S. Department of Defense，2014），雖然此部署引發了北韓與中國的強烈不滿，但美國積極在太平洋西岸部署反飛彈防禦系統，除了其戰略安全考量之外，也是對盟國積極展現安全承諾強度的


重要指標。



而除了美方給予更為強力的安全承諾，以及表達對日本國家正常化的支持之外，美日關係的強化更體現在日本積極承擔同盟國與全球夥伴責任的層面上：美日同盟體系在歐巴馬總統與安倍首相的努力之下成功推進成為全球性的夥伴關係，而美國也期待美國與日本之間的互動能從雙邊關係轉變成多邊關係，亦即希望日本除了成為堅實盟友外，也能積極拓展對外合作（如東協），同時與美國在東亞、亞太區域的其他盟國進行交流，使美日同盟關係能成為美國與日本在區域內擴張影響力的基礎，也促使日本從一消極接受美國安全保障的盟國，成為更積極承擔區域安全與國家防衛責任的戰略夥伴（Envall，2017：28-30）。

在美國的強烈支持之下，日本的外交政策也確實在安倍晉三第二任期內出現具體變化，安倍首相在 2013 年所發表的「亞洲民主安全鑽石（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構想中提到美國、日本與印度、澳洲作為亞太地區民主國家，應該建立安全合作機制以維護亞太甚至是整個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隨後日本也積極加強與印度、澳洲的安全合作機制，在此安全鑽石架構中，關係相對緊密、堅定的美日同盟關係是重要基礎，而透過與美國其他友好國家的合作，日本在美國多組同盟關係中的地位也有所提升（Lee，2016：8-10），由此可見，美國所給予日本的安全承諾強度不僅提升，甚至成為日本對外擴展安全戰略合作關係的重要基石，美日之間的合作事務也不再侷限於東北亞區域內。

綜言之，在美國歐巴馬總統第二任期中，安倍晉三上任日本首相後所積極推動的國家正常化、同盟體系再加強都與美國重返亞太政策目標不謀而合，也因此美國與日本的同盟關係在此時迎來了更加緊密且擴大範圍的調整，新版共同防衛指針的提出也使得日本足以擔負更多安全責任，並且進一步協助美國維持區域乃至全



球的和平穩定，日本在國家正常化的道路上也獲得美國的支持，種種跡象均顯示美國與日本間的同盟關係穩定且安全承諾強度提升，而日本在美國的強力支持下也逐步成為東亞與亞太地區中發展多邊關係的重要樞紐國家，隨著日本自身外交策略的調整，美日關係的穩定發展是可以預期的。

貳、美國與南韓的同盟關係

2013 年 2 月，南韓新的領導者朴槿惠上任，有別於前朝李明博政府強調親美的立場，朴槿惠在上任之初即強調南韓除了需要維持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之外，也需要維持外交政策的平衡，與周邊國家保持良性互動，並為區域的和平穩定做出積極貢獻（Kuik, 2015），也因此南韓在朴槿惠的領導之下，並非一面倒的傾向美國，而是盡力在大國之間保持和諧且平衡的位置。

在北韓核武發展持續進行的情況下，雖然強調南北韓間應該持續加強信任以利後續交流，但在核武威脅上，朴槿惠也與歐巴馬總統維持一致立場，即北韓應該放棄發展核子武器，在半島無核化的基礎上才存在和平談判的可能（李明，2013：3），換言之，朴槿惠雖然強調南韓不應一味傾向美國，但其在鞏固同盟關係與對北政策上仍與美國歐巴馬總統所期望的相近，而美國與南韓的同盟關係也在此時期獲得一定程度的強化。

在朴槿惠總統上任之初，自 2012 年年底因北韓發射人造衛星遭受聯合國認定為彈道飛彈測試而遭受制裁後，所引發的一系列北韓言詞挑釁、核子試驗逐漸演變成朝鮮半島緊張情勢，2013 年 3 月在南韓與美國進行聯合軍演之際，北韓指控演習將造成威脅並宣稱若美韓不停止演習、進行談判將撕毀兩韓停戰協定，並在 3 月 8 日到 16 日之間，先後終止了兩韓互不侵犯條約、停戰協定等，重創兩韓關係，



也引發朝鮮半島危機。

為了避免北韓輕舉妄動，美國將駐在關島的 B-2 轟炸機派往朝鮮半島參加美韓聯合演習，並要求日本將三艘具有彈道飛彈防禦系統的驅逐艦部署至日本海，但此舉再度引發北韓強烈不滿，宣稱已部署火箭與飛彈準備攻擊美國在太平洋的基地，並在 3 月 30 日宣布進入與南韓的戰爭狀態，一旦面對南韓或美國的過度挑釁將予以回擊，因應半島情勢急遽升高，美軍將原先部署於沖繩基地的兩架 F-22 戰鬥機改派至駐韓美軍所在的南韓烏山空軍基地，宣示其捍衛盟國南韓以及半島和平的強烈決心。4 月起，北韓首先關閉了兩韓合作的開城工業區，宣布將進行鈾元素的生產，並在 5 月時朝向日本海方向發射四枚短程導彈，引發日韓不安，美國與南韓在 7 月時展開年度「乙支自由衛士」聯合軍演，力求嚇阻北韓侵略與引發戰爭的野心，然而北韓對外發出公開信譴責美韓才是引發半島局勢緊張的元兇，並要求停止演習未果，隨後 8 月兩韓再度於北方邊界線發生砲擊事件，朝鮮半島危機情勢仍未消退，雖然北韓在砲擊事件後並無進一步挑釁，但此次長達近半年的緊張氛圍使得南韓對於改善兩韓關係失去信心（O'Neil，2014：18）。而美國在此期間提供的強烈支持與安全維護也促使美韓關係有所升溫。

2013 年與 2014 年間，美國與南韓依慣例展開各項大型軍事演習，軍演規模甚至達到歷年之最（2014 年舉辦名為 Max Thunder 的聯合空中作戰演習），做為展現美韓同盟關係鞏固與美國安全承諾穩定的象徵。美國與南韓之間在 2014 年還達成了延遲「移交戰時指揮權」的時間，原先美國預計在 2015 年將戰時指揮權移交給南韓，但 2014 年美韓安保會議中兩國均同意將此移交時程推遲至 2020 年，以便因應北韓持續挑釁與東北亞區域安全秩序的變動；而駐韓美軍的人數雖然未明顯增加，但美軍仍強調會保持足夠數量的軍隊在此協助南韓防禦與嚇阻可能的武力威脅（The White House，2014），美韓之間也在 2014 年就駐韓美軍費用的分擔




達成全新協議，這些協議與共識對維持美韓同盟關係存在正面影響。

在其他軍事合作層面上，2014 年底，美國與南韓、日本三國共同簽署了關於北韓軍事情報共享的協定，使得南韓得以透過美國與日本進行北韓情報交流，藉此情報交流協定，南韓不僅可以獲得美國在北韓相關的軍事情報，同時也能獲得日本針對北韓新型飛彈所做的分析與評估，並據此進行軍事部署與防禦計畫擬定（劉德海，2017：35-36），美國促使南韓簽署情報交換協定一方面是期望改善日本與南韓的關係，另一方面也希望藉著軍事情報共享，南韓得以提升安全防衛能力。

而歐巴馬總統在其任期之中，對美韓同盟的期望不僅只有加強軍事情報交流與其他軍事合作，更重要的是希望南韓可以同意部署地對空的反導彈系統於南韓本土，起初南韓在 2015 年 10 月釋放消息願意部署「終端高空防禦飛彈（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薩德反導彈系統）」於境內，並承認已經開始與美國進行部署前的討論與準備，但隨後又因中國與國內民意的強烈反彈而改口，宣稱南韓並未確定要部署薩德系統，並稱薩德系統對國家安全的意義能須謹慎評估，試圖安撫北京避免中韓關係倒退。

2016 年 2 月北韓進行火箭試射，國際認為此舉代表北韓已在核子武器與長程洲際導彈上取得進展，並且已具有威脅美國本土的能力，半島情勢再度陷入緊張，在美國強烈要求以及北韓核武威脅明顯升高的情況下，美韓在 2016 年 3 月初即宣稱正在進行薩德系統部署的磋商，南韓也將薩德系統描述為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設施，最終在當年度 7 月美韓共同宣布將於南韓境內進行薩德系統的部署以反制北韓持續性的飛彈試射與挑釁行為。美國強勢要求南韓部署薩德系統不僅是因為透過反導彈系統的部署有助於提升對南韓的安全承諾強度，另一方面也是給予南韓強烈訊息：其應跟上美國與日本防範中國軍事實力崛起的腳步（李明，2016：49），



而南韓選擇不顧北京的強烈反對，接受美國部署薩德系統的提議，也代表南韓在戰略安全的考量上與中國相比，仍更加依賴美國所提供的安全承諾，願意配合美國於西太平洋的反飛彈部署（Noerper，2016：39），而從本文的研究脈絡而言，美國在南韓境內部署反導彈系統是安全承諾的加強，同時也是鞏固美韓安全合作關係的強力宣示。

綜上所述，歐巴馬總統在第二任期中仍然與南韓保持良好且穩定的同盟關係，在面對北韓持續進行核子試驗與飛彈、火箭試射的情況下，美國在軍事上的強力支持是穩定南韓國家安全危機的重要關鍵，而南韓在朴槿惠總統的領導下，期待在美國、中國、俄國等區域大國之間保持外交平衡，避免過度傾向任一國家，但在北韓持續威脅以及武力挑釁之下，朴槿惠的外交政策不得不進行調整，雖然極力避免激怒中國與其他鄰近強權國家，但美國所提供的核保護傘以及駐韓美軍仍是維護南韓國家安全的主要力量，因此在薩德系統部署的討論之中，北京的強烈不滿並沒有能夠避免南韓接受美軍提議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而美國在薩德部署事件上的強硬立場也顯示美國持續拉升給予南韓的安全承諾強度，也因此任車氏的假說之中，在此時期美國對南韓的安全承諾強度有所提升。

總體而言，歐巴馬總統第二任期之中，美國所延續的重返亞太政策積極加深與亞太地區盟國之間的關係，也藉由各項軍事部署調整強化其給予盟國的安全承諾，也因此美國與日本、南韓的關係在此期間仍保持在相對穩定且互相信任的情況，雖然南韓在朴槿惠總統的領導下，強調外交關係的平衡而更為顧慮中國等周邊強權國家，但南韓與美國的關係仍因北韓的強力挑釁獲得了鞏固與深化。而美國與日本的關係在安倍晉三上任後出現明顯好轉，安倍晉三親美且積極調整日本國家定位的政策，使得美日關係在經歷了日本民主黨政府期間的飄蕩後再度趨於穩定，飛彈防禦系統的研發與部屬、美日之間防衛指針的更新等等都使得日本在東亞區域中

的重要性更為提升，由此看來，2013-2016 年仍是美國所給予盟國安全承諾強度持續上升的時刻。



第三節、日本與南韓關係

日本與南韓之間的雙邊關係，自 2012 年南韓李明博總統登上日韓爭議領土獨島（竹島）後即陷入冰點，雙邊關係交惡直到兩國先後經歷大選並產生了新的領導者，隨著朴槿惠與安倍晉三的上任，美國與周邊其他國家均期盼兩位新的領導人可以為日韓雙邊關係帶來全新氣象，帶領兩國關係自低谷中走出。但事實上，日韓兩國之間的關係並未能夠在朴槿惠與安倍晉三的領導中出現長足進展，雖然有歐巴馬總統在其中穿針引線，而日韓兩國也的確在美國的要求之下推進了軍事合作層面上的關係，但實際上兩國仍未能敞開心胸、攜手前進。

在歐巴馬總統第二任期之中，美國主要的外交方向仍是以「重返亞太」為主軸，並且積極加強與東亞盟國的安全合作關係，試圖以穩固的同盟關係作為基礎，使得美國在亞太區域內的影響力有所增長，而日本與南韓在面對美國安全承諾強度大幅提升的情況下，若依照車氏的假說而言，日韓之間的雙邊關係則會反向的陷入摩擦，而從日本與南韓首腦與外交高層的會面次數看來（請見表 3-1），日韓關係確實在此時期急凍。

2013 年與 2014 年是北韓飛彈、火箭試射與軍事挑釁行為最為頻繁出現的時間，然而在面對北韓此一共同且強大的威脅之際，日本與南韓領導者仍是避不見面、王不見王，雙邊外交高層會談的次數極少，連透過電話進行商議與討論特定事項的機會都沒有出現，對比當時危機四伏、氣氛緊張的東北亞情勢，日韓雙方的互

動顯得過度「冷靜」，顯見當時日韓雙邊關係的冰封。而 2015 與 2016 年，隨著歐巴馬總統期望撮合美國在東北亞的兩大盟國攜手合作，日韓領導人仍往往是在高峰會上由歐巴馬總統穿針引線才得以進行會面，直到歐巴馬第二任期尾聲，日本與南韓之間的互動才有所增加，但主要仍是因為美國方面的強力要求與積極促成，才使得日韓關係看似有所回升。

表 3-1

2013-2016 日韓高層互動統計

年份	日韓領導人互訪 與會談（實際會 面）	日韓領導人電話會談	日韓外交部長會談
2013	0	0	3
2014	0	0	2
2015	1	1	7
2016	2	3	8

（單位：次數）

資料來源：日本外務省，2013-2016，〈大韓民国 過去の要人往来・会談〉

而從本文使用的另一項日韓安全關係指標「日韓安保對話」的舉行而言，日韓關係仍是枯木未逢春。如表 3-2 所示，第九回日韓安保對話在 2009 年舉辦後，日韓之間的安保對話便停止舉辦了 6 年，是自 1998 年首度舉辦後，停止舉辦間隔最長的一段時間，日韓直到 2015 年，同時也是日韓外交關係正常化五十週年之際，再度於南韓首爾舉辦第十回日韓安保對話，對話中同樣就北韓核武問題與東海軍事情勢進行意見交換，但仍未觸及更深入的軍事合作事項或其他討論，而 2016 年日韓安保對話再度中斷。



表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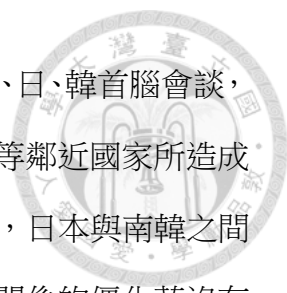
2013-2016 日韓安保對話統計

年份	日韓安保對話
2013	無
2014	無
2015	第十回
2016	無

資料來源：日本外務省，2013-2016，〈大韓民国 過去の要人往来・会談〉

從具體事實來看，2013 年朴槿惠就職後，其雖然肯定了區域內國家外交互動關係的重要，並認為南韓應該與周邊國家增加合作與交流，但南韓與日本之間的關係卻未見改善，主因是朴槿惠認為日本應該正視殖民與二戰時期對南韓與其他亞洲國家所造成的歷史傷害，同時以正確的心態處理歷史問題（Sakaki & Nishino，2018：749），而日本方面則認為日韓雙方已就慰安婦等問題討論多年且簽訂了相關協定，不應一再舊事重提造成雙方關係緊張，因此 2013 與 2014 年，日本與南韓的領袖並未如往常在就任後相互訪問、進行會談，而日韓雙邊的外交交流也大幅減少。然而在此同時，日本與南韓最主要的共同威脅北韓挑釁行為不斷，甚至引發半島危機，在此威脅程度上升的情況下，南韓與日本仍受限於歷史爭議等問題，未能攜手合作。

2014 年 3 月，美國眼見東北亞兩大盟國漸行漸遠，決定從中斡旋促使日韓雙邊關係回溫，除了期望促使美、日、韓簽署三國之間的情報分享合作協定，另一方面也是避免同盟國之間因關係疏遠而引發同盟結構不穩，因此歐巴馬總統便如首節所提及的，藉美、日、韓三國領袖均在荷蘭參加核安全峰會的機會，提出三國應




就北韓的核武問題進行討論，因此在峰會舉辦期間另行舉辦了美、日、韓首腦會談，希望透過美國的調解使日韓關係重回正軌，共同對抗北韓、中國等鄰近國家所造成的安全威脅（Sakaki & Nishino，2018：738）。然而此峰會過後，日本與南韓之間的關係並未改善，兩國仍未能恢復以往的交流與訪問，顯示日韓關係的僵化若沒有美國持續居中協調，一般而言難以順利恢復。

美國促成日本與南韓元首進行會面的目的，除了協調日韓關係之外，另一方面也期望促成軍事情報協定的簽署，日韓之間因為長久以來的嫌隙，其軍事合作事項若沒有美國的助力則少有進展，美國在 2014 年內推動美、日、韓之間的「對北韓軍事情報分享」協定簽署，雖然日韓關係在此時期仍是水火不容，但在美國的期待下，三國於 2014 年底正式簽署此情報互換與分享的協定（Panda，2014），然而日韓關係實質上並未大幅改善，日韓雙方僅同意開始就慰安婦問題進行討論，並未如美國所預期的解凍雙邊關係。

2015 年，日韓關係看似稍有起色，然美國仍是主導日韓關係進展的重要力量，在經歷數回關於慰安婦賠償的談判後，當年度 11 月初日韓雙方同意就歷史問題等議題進行安倍晉三與朴槿惠上任後的首度首腦會談，在此次會談後，日韓雙方在年底達成「日韓慰安婦協定」，日方將就慰安婦罪行公開道歉、進行賠償，而南韓也將成立專責扶助慰安婦的基金會，妥善運用日本的賠償金進行撫慰等相關措施，更重要的是，日韓雙方已經同意此一協議是針對慰安婦爭議「最終」且「不可逆轉」的解決方式（Tatsumi，2015），此次協定的簽署，雖然可被視為日韓雙方和緩關係的一步，然而雙方閃電達成協議的背後，仍是美國期望日韓修補關係並進一步簽署雙邊軍事合作協定的壓力所致。

2015 年底，隨著日韓簽署了慰安婦協定，美國即乘勝追擊，要求日本與南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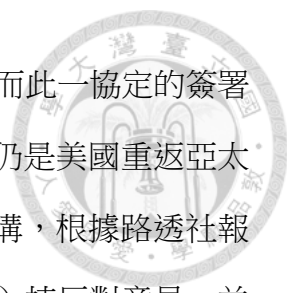


應該就延宕多時的雙邊軍事情報分享進行討論。早前在 2011 年時，南韓與日本曾就軍事情報分享作出討論與意見交換，然而雖然兩方在當時均表達出對於簽署協定的意願，但在簽署條約前意外將消息洩漏於大眾，造成南韓民意的激烈反對，南韓隨即在 2012 年取消了預訂的協定簽署，同時要求日本應積極面對歷史問題，日韓才能有合作共榮的空間與可能。隨後日韓關係的摩擦持續增加、新上任的領導者沒有意願增近日韓軍事合作等因素，使得日韓之間的軍事情報分享協定胎死腹中。

然而北韓核子武器的威脅仍在甚至有擴大的跡象，而日本對於北韓相關的情報掌握能力、國家軍事發展力量等均高於南韓，雙邊情報互換協定的簽署得以使兩國不需要透過美國即可以直接分享軍事情報（Park & Yun，2016），而南韓與日本對於北韓動向、核武情報的需求極高，兩國若能簽署情報分享協定，有助於提升兩國對北韓的情報掌握，適時對情勢做出預防或因應，而日本與南韓間在邦交關係正常化以後，始終沒有簽署相關的軍事合作協定，也因此美國期望透過此協定的簽署，進一步推動日韓軍事合作關係。


2016 年，日本與南韓因美國的斡旋再度重啟對朝軍事情報分享協定的談判，而安倍與朴槿惠也在 3 月底進行了首腦會談，討論就北韓持續挑釁行為的應對，以及肯認慰安婦協定的達成是日韓關係的一大進步（日本外務省，2016/03/31），9 月在東南亞國協會議中碰頭的兩人，也進行了當年度第二次的領袖會面，會中強調雙方都有強烈意願推動雙邊關係進展，也願意在解決北韓問題上攜手前進（日本外務省，2016/09/07），顯見在美國的推波助瀾下，日本與南韓的關係有所改變。

日本與南韓在 2016 年 11 月 23 日正式簽署了日韓軍事情報分享協定（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GSOMIA），美國對此表示樂見日本與南韓在軍事層面上攜手合作，而也期望日本與南韓能在東亞區域內部扮演更加重



要、幫助維持區域內和平穩定的角色 (Park & Yun, 2016)，然而此一協定的簽署並非全然代表著日韓關係的和緩與鞏固，實質上此協定的簽署仍是美國重返亞太政策之下所產生的結果，而日韓關係本質上仍有無法跨越的鴻溝，根據路透社報導，韓國民眾面對日韓之間 GSOMIA 的簽署有超過半數 (59%) 持反對意見，並認為將軍事情報與日本分享對南韓而言是極其危險的 (Park, 2016)，反對方認為日本於南韓而言是不可信任的敵國，與日本加深軍事相關的連結與合作只會帶來糟糕的後果，而 GSOMIA 的簽署也更加將南韓網綁於美國、日本、南韓的三角同盟關係框架中，南韓未來的外交政策就面臨更多限制，在 GSOMIA 的談判過程中也缺乏公開透明的審議過程，於南韓而言，簽署 GSOMIA 的損失過大，實不應因美國壓力而簽署 (Kang & Bang, 2017: 93) 而日韓之間的其他合作事項仍未見端倪，顯示雖然歐巴馬總統將日韓 GSOMIA 視為其第二任期中協調日韓關係的重要里程碑，然而除了 GSOMIA 的簽訂之外，日本與南韓之間的雙邊關係卻並無出現明顯改善。

從本文的研究脈絡而言，車氏認為當美國所給予的安全承諾強度提升時，日本與南韓對美國的信任感提升後，日本與南韓即會出現關係摩擦，而從上述所提及的情況來說，美國在歐巴馬總統第二任期中確實提升了給予盟國的安全承諾強度，透過更多的軍事部署轉移、軍事合作等政策加深盟國的安全感，因此若日本與南韓之間的雙邊關係摩擦增加，則此期間的美、日、韓三邊互動關係即應證了車氏所提出的假說，而日本與南韓之間的互動關係確實在美國透過重返亞太政策鞏固同盟關係後出現較多冷淡甚至摩擦的情況，雖然在 2015 年後受迫於美國所施加的壓力相繼完成了慰安婦協定與 GSOMIA 的簽署，然而在美國沒有從中介入的情況下，日本與南韓兩方則沒有明顯欲修補關係的意圖 (如 2013-2014)，因此撇除美方斡旋與協調而來的會面與協定簽署，日韓關係仍處於相對低點，並無明顯回溫或改善的情況，車氏的假說也因此仍適用於解釋本時期的美、日、韓三邊同盟與準同盟關係。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日本與南韓在此時期所面臨的共同威脅北韓，其威脅程度有擴張的趨勢，自 2013 年起北韓除了核子試驗的持續進行外，也時常朝向周邊海域進行飛彈試射與火箭發射，對東北亞區域內的安全環境造成壓力，也因此造成南韓與日本必須與美國更加緊密合作以對抗北韓核武威脅，在此時期三個國家所認知的共同威脅並未出現改變或動搖的情況，因此同盟關係上也相對穩固而無明顯變化，日韓也願意在外交政策上配合美國以謀求國家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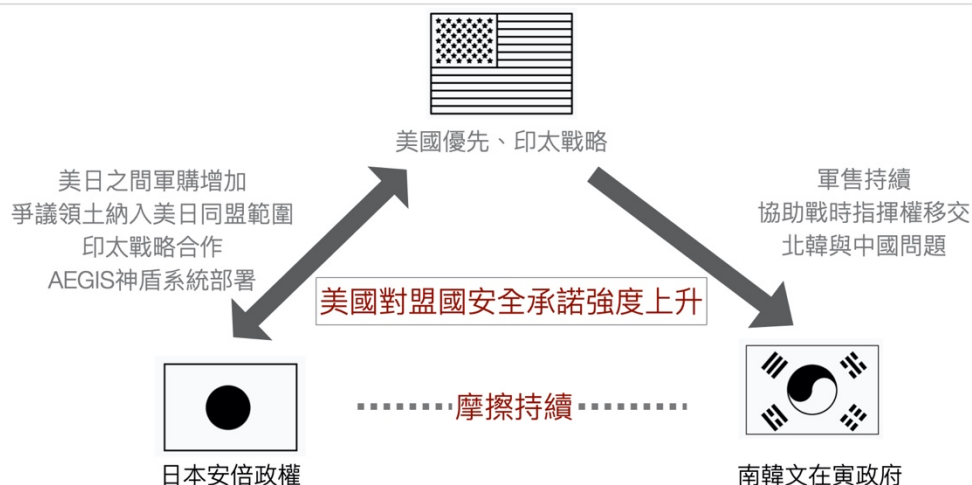
第四章

川普任期中的美、日、韓關係 (2017~2019 年)

第 45 任美國總統選舉，川普在一片不看好中拿下勝利，川普自競選起就高舉的「美國利益優先」旗幟也為美國的外交政策方針帶來改變，在更加重視對等關係的川普政府領導下，美國與盟友國的關係也出現變化，在經貿上、駐軍費用分擔上都錙銖必較的川普，為美國對外同盟關係帶來壓力。隨著 2018 年後，美國與中國對抗的局面趨於明顯，美日、美韓同盟的重要性也愈發提升。本章節將聚焦於川普上任後對美國外交政策帶來的改變，以及美日、美韓、日韓關係在此變局中的變化。

圖 4-1 川普任期的美、日、韓關係簡圖（作者自行繪製）

川普任期（2018-2019）的美日、美韓、日韓關係






第一節、川普總統任期的東亞外交政策

2016 年底，美國舉行總統大選，選舉結果跌破外界眼鏡，由共和黨提名人，訴求「美國利益優先」、「讓美國再度偉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的房地產大亨唐納·川普 (Donald John Trump) 贏得勝利。川普總統在 2017 年 1 月正式入主白宮後，外交政策主軸仍延續其在選舉期間不斷強調的「美國利益優先 (America First)」，川普總統認為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因為介入許多國際紛爭、區域衝突，導致美國必須部分犧牲己身利益以維護國際秩序，而受美國所保護、協助的國家卻未能付出相對應的支持與資源，只是片面享受美國所維繫的穩定秩序，這樣的情況應該被改變。

川普總統認為美國應該以其己身的利益為優先考量，並使其盟友國家、受保護之國家負起更多防禦任務或是軍事費用的分擔責任，避免美國的國家利益持續受到侵害與耗損，也認為盟友國家對於美國安全承諾的依賴是一種「使用者不付費」的「搭便車 (Free-Rider) 行為 (Anton, 2019)，在此情況下，川普總統認為調整美國與國際盟友間的互動、合作關係相當重要，與歐巴馬總統所主張盟友國應該增加其防衛能力不同，川普總統更加強調盟友國享受美國軍事安全保護傘之際應該付出相應的代價，否則就不該一味的仰賴美國的安全承諾來維持國家安全，美國的外交政策也隨著川普總統上任而出現許多調整。


在標舉「美國利益優先」的旗幟之下，川普總統除了亟欲兌現重要競選承諾：於美國與墨西哥接壤的邊境築起高牆，防止中南美洲非法移民進入之外，川普總統在美國外交政策上所掀起的改變浪潮，所席捲的對象不僅有本文所討論的東亞及亞太地區，還有長期以來做為美國重要盟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川普總統認為北約組織成員國長期以來仰賴美國的



核安全傘保護，卻未能夠付出相對應的代價來換取區域的穩定和安全。在川普上任後首度參加的北約高峰會議（2017年5月）上，川普總統發表演說抨擊北約會員國對美國的依賴以及疾言厲色要求北約會員國應該付清這幾十年來所積欠的軍事相關費用，並且拒絕明確地重申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的集體安全條款（歷年來此條款都被北約會員國與外界視為美國的重要安全承諾展現），引發北約會員國的不滿及不安（Gramer, 2017），而川普總統此舉被外界視為其改變美國既有外交方針的重要宣示，象徵美國在川普的領導下，不僅將更加注重己身利益的維持，也將避免因維持國際秩序的必須而損傷國家利益，縱使是歷史悠久、關係強健的北約組織也難逃此一檢討、修正。

而美國外交政策改變的大浪也撲向了太平洋西岸的東亞盟國，川普總統曾公開批評東亞盟國菲律賓在杜特蒂（Duterte）親近中國，對美國這個傳統盟友的態度不佳，也不願負起盟國責任，導致川普上任後雖然展現想與菲律賓修補關係的企圖與善意，並維持與菲律賓的同盟關係（Kenney, 2017），但美菲關係仍漸行漸遠。川普總統同樣對日本與南韓兩大盟國有所微詞，不僅因為駐韓與駐日美軍的軍費分擔問題，川普也對美日與美韓之間貿易不平衡有許多不滿，認為在這樣不平衡的貿易與軍事合作關係下維持的同盟關係對美國而言是極為不公平的，而經濟貿易上的平等於美國而言是與軍事合作同等重要的國家利益，因此川普也誓言調整與南韓、日本在內的東亞盟國之間的經貿關係，在維持軍事同盟的情況下使雙邊關係更加對等（Cronin, 2017）。

然而，看似對同盟國態度苛刻的川普，其仍然肯定同盟國是美國維持區域內影響力的重要夥伴，甚至開始拉攏更多國家進入美國的同盟與全球夥伴體系之中，2017年10月，時任國務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於美國知名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發表演說，演說中提




到美國將不僅著重於太平洋區域內的全盟與外交關係，也將把印度洋納入美國的戰略佈局之中，因此除了鞏固與太平洋週邊盟友的關係外，美國也將與印度進行軍事、經濟層面的合作，兩國將致力於創造一自由、開放的印太區域，此一演說內容被視為川普「印太倡議」的濫觴。

川普政府所提出印太倡議也與日本安倍晉三首相第二次回任首相後所提出的「亞洲民主安全之鑽」的構想有所雷同，顯示美國在川普總統的領導下，雖然更加強調與同盟國家、夥伴國家間的對等、公平關係，仍然著重國際影響力的維持與加強，而隨著國家戰略部署的觸角深入印度洋與太平洋兩大地區，美國與區域中強權中國的互動也備受矚目。

2017 年 12 月，白宮公佈川普總統上任後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7），在此次報告書中明確指出除了舊有流氓國家如伊朗、朝鮮等威脅之外，俄羅斯與中國是目前正透過科技、經濟等力量，試圖削弱美國的國際影響力，並改變其所建構之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者」，而美國必須透過軍事、經濟、價值等不同方式來避免由美國所領導的國際現狀遭到挑戰甚至是改變（Trump, 2017）。相對於歐巴馬總統時期較為隱晦地提及中國是美國潛在的競爭對手，川普總統則更為明確地指出中國與俄羅斯將是美國在軍事戰略與經濟文化上的敵手，而美國與中國的對抗態勢也趨於明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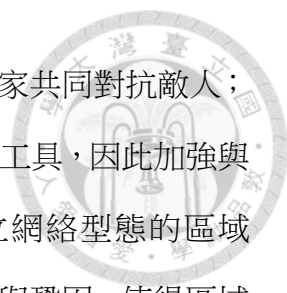
2018 年 1 月，美國國防部公布《國防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2018），內容中再度提到中國與俄羅斯作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在軍事層面上透過領土的軍事化（如中國在南海島嶼建立軍事化設施）、以武力或經濟力量脅迫他國等方式，亟欲改變當前的國際秩序與國際價值體系，並形塑國際環境為對其發展有利的情況，此一舉動尤其衝擊美國在印太地區主張的開放與自由倡議，因此美國應該採



取更多措施來遏止修正主義國家的擴張，包括具有震懾力量的軍事創新及突破、鞏固現有的軍事同盟關係、增加與區域中其他國家的嶄新夥伴關係等，才得以使美國在軍事影響力出現萎縮的時期仍能維持國家安全與經濟上的繁榮（U.S. Department of Defense，2018），從五角大廈此一報告中也可以看出，雖然川普總統看似對盟友更加嚴厲，但美國在軍事戰略佈局上仍需要與盟友國家保持穩固關係。

由上所述，可以窺見川普總統在其上任後，強調美國利益優先之餘，對於敵對國家所造成的國家安全、國際領導地位威脅也有所忌憚，甚至出現了直接起身對抗的舉措，而在兩大外交目標：「美國利益優先」與「對抗中國崛起」的權衡之下，川普總統的外交政策也因此時常出現看似矛盾的情況，這一點在美國於東亞國際事務的處理與政策上亦可見一斑，一方面川普總統期望在經濟與軍事合作的層面上與東亞盟友達成更為平等、公正的協議與責任分擔，另一方面也期望能夠藉由加深軍事等各方面的合作，拉攏舊有同盟國家以及新興夥伴國家，藉以合作對抗區域強權中國，在 2018 年 10 月副總統彭斯在公開演講上指名道姓抨擊中國對美國乃至全球經濟與民主自由的危害（The White House，2018）後，美國與中國之間相互競爭、對抗的態勢幾成定局，而在此情況下，亞太地區盟國對美國的支持與信任便顯得格外重要。

2019 年 6 月，美國五角大廈公佈《印度-太平洋戰略報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文中重申俄羅斯及中國對美國所領導的區域與全球秩序持續造成威脅，而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利益與周邊盟國的安全均受到中國的挑戰與侵害，美國國防部認為美國勢必須要透過不同政策工具來維持在印太地區的領導地位與影響力，因此報告書除了宣告美國將「印太倡議」進一步擴大成為「印太戰略」之外，也提出針對中國不斷在東海、南海擴大軍事力量影響區域穩定的政策解方：準備（Preparedness）足夠可靠



的軍事力量，透過強大力量進行嚇阻，並聯合盟友國家與夥伴國家共同對抗敵人；夥伴關係（Partnerships）的經營將是美國對抗中國等敵國的重要工具，因此加強與日本、南韓、澳洲等盟國的合作關係極為重要；促進並建立網絡型態的區域（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透過雙邊、多邊關係的建立與鞏固，使得區域與美國之間的關聯加深（U.S. Department of Defense，2019）。

綜上所述，川普總統在其任期前半段之中，最為明顯的外交政策轉變即是將中國視為區域與全球層面上的重要競爭對手，並期望透過同盟關係、軍事力量嚇阻等方法，試圖對抗國力大幅提升的中國，尤其在東亞、印太區域之中，美國與盟國面對中國在周邊海域的島嶼軍事化、大型演習頻仍等種種安全威脅，川普政府勢必得有所因應，也因此從印太倡議到印太戰略，美國在區域內的著力加深，其與盟國的關係強度與穩定度更是美國能否如其所期望的持續居於領導地位的重要關鍵，然而，雖然川普政府在印太戰略中所做出的政策宣示在本文的研究脈絡中可被視為對盟國安全承諾的加強，但川普政府對於盟國提出較以往更加嚴苛的要求（無論是軍事或經濟層面上）也屢見不鮮，因此在下一小節中，將透過美國與日本、南韓之間的關係變化來檢證美國的安全承諾強度變化是提升或是相較歐巴馬總統時期下降。

第二節、美國與日本、南韓的同盟關係

川普總統對東亞盟國的態度時有矛盾，一方面美國期望與同盟國之間建立更加對等的關係，一方面又期望仍能透過穩定的同盟關係維持在東亞的領導地位，在川普總統亟欲維護美國國家利益與外交優勢的情況下，美國與日本、南韓兩大盟友國家的同盟關係也有波動，除了兩組軍事同盟關係所涉及的軍事合作、軍費分擔議題外，川普總統也格外關注區域中的既存威脅如朝鮮核子問題、中國軍事擴張，而




日本與南韓作為第一線面對區域威脅的國家，在外交政策上的選擇與目標也連帶影響著與美國的關係，以及維繫同盟關係至關重要的共同威脅認知，在川普總統不段透過經濟、外交等不同手段，期望同盟國家擔負起更多防衛責任或費用分擔的情況下，美日與美韓同盟關係都相繼出現了不穩定甚至是疏離的現象。

壹、美國與日本的同盟關係

安倍晉三在回任首相後，日本的外交政策即被調整回親近美國的老路，對安倍而言，美日同盟關係是其對外開展外交關係與戰略佈局、對內修改和平憲法與解禁集體自衛權的重要基礎，美日關係的穩定可說是安倍政權最重要的外交目標，而在歐巴馬總統主政時期，美日關係強化且雙方均有意願維持同盟關係，而川普卻在選前屢次提及東亞盟國對美國造成利益損失，因此在川普甫一勝選，安倍立刻著手安排與川普於紐約進行會面，並於 2016 年底與即將上任的美國新任總統進行面談會議，雖然安倍對外宣稱此一面談不涉及政府事務，但仍可見日本方面對美國政權轉換與後續美日關係維持的重視，然而在日本此一極力維持同盟關係穩定的表象下，美日之間事實上仍存在許多矛盾，這些癥結在川普總統走馬上任後一一浮現，使得原本相對平和的美日同盟關係出現波折。

隨著「美國利益優先」成為川普政權外交政策的主軸，美國與東亞盟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成為川普所關注的焦點，做為亞洲重要駐軍地的日本，其與美國之間軍事費用的負擔問題也再度受到注目。川普在競選時即批評盟國對於美國而言是沈重的負擔，而日本尤其未能善盡盟國責任卻依賴數量龐大的駐外美軍保障國家安全，此番言論造成美日關係出現波動，美國所給予日本的安全承諾似乎也即將在川普總統任內出現不穩。在川普總統實際上任後，其便要求日本應該負擔更多駐日美軍的軍費，或者應該透過購買更多美製武器來提升日本己身的防衛能力，否則就



不應該持續依賴美國提供「廉價且有力」的安全保障(Landler & Hirschfeld, 2017)；川普總統也要求重新檢討美國與日本之間的相關經濟、貿易協定，原因是美日之間的貿易逆差對美國的經濟發展而言是極為不公平的，這些要求都使得日本國內對於美日同盟關係產生質疑與憤怒，認為美國是以其安全承諾要脅日本做出軍事與經濟上的讓步，雖然最終日本同意增加對美軍購支出，將購買美國所提供的戰鬥機等軍事武器，並且也在 2019 年與美國簽訂全新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但川普政府這些對日本而言有些嚴苛的要求卻也為美日關係造成影響 (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9)。

而川普上任後，另一項衝擊美國與日本之間互信關係的重要政策則是「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TPP 談判在 2008 年美國加入後即轉變為美國所主導的跨太平洋合作協定，而日本起初因國內產業保護政策而並未加入，是在美國歐巴馬總統的極力要求下才決定加入 TPP 談判，日本的加入被視為美日關係由軍事同盟升級成為全球夥伴關係的重要宣示，雖然日本在談判中仍堅持農業保護政策而與美國產生爭執，但 TPP 仍是美日關係在區域與全球經濟貿易合作與戰略佈局上的重要里程碑，然而川普總統卻在上任後即宣布美國退出 TPP 談判，無疑是在安倍親美政策上的一大打擊 (Takashi, 2018)。雖然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軍事與外交合作層面，但川普此舉動搖的不僅有美日之間原有的經貿合作關係，還有美國與日本之間對於建立全球夥伴關係的重要信任基礎，因此仍可被視為美日關係波動的重要事件。


矛盾的是，在川普政府一連串看似施壓於日本的政策與手段之外，美國與日本實際在軍事安全與全球戰略的佈局上的合作卻日趨緊密，美國給予日本的軍事支持也持續加強。2017 年 2 月美國政權交替後，新任國防部長 James Mattis 首度訪問日本，與安倍首相進行會談後發表聲明，除了重申美日同盟條約第五條 (美日同

盟作為防禦同盟，日本受到攻擊時，美國將給予協助)之外，更首度將尖閣諸島(釣魚台列嶼，台灣與中國均宣稱為其領土)納入同盟條約第五條的日本領土範圍之中，此舉被視為美國給予日本在尖閣諸島領土爭議中的強力支持(村田晃嗣，2017)。

隨著上一小節所提到的「印太倡議」推動，美國特別強調將積極塑造自由且開放的印太地區秩序，此一觀點與安倍晉三對印太地區的自由、民主、開放的「亞洲自由民主之鑽」概念不謀而合，美日雙方也共同宣布將就此目標進行雙邊與多邊合作，期望以美日同盟為基礎發展更多樣的國際互動關係，致使印太地區繁榮穩定(Ayres, 2018)。2017年11月，川普總統首度訪問日本，訪日期間川普總統也不斷肯定日本是美國最忠誠且值得信賴的盟友，美國與日本也就朝鮮問題達成共識，認為加強施壓朝鮮是可行手段(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9)，從此觀之，川普政府雖然在經濟層面要求日本讓步，但在兩國的軍事同盟關係上，日本仍被美國視為可靠且信任的盟友國家，美方也願意在同盟關係穩定的基礎上給予更為強力的支持與安全承諾，而對美國而言，日本在區域內的重要性也有所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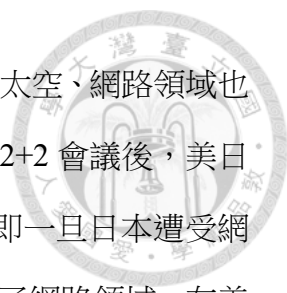
而除了在言詞與安保條約上的再加強，美國與日本實際上在軍事層面的合作也有所進展，2017年由於北韓金氏政權自年初起一系列飛彈試射威脅南韓與日本安全並引發半島又一次危機。在此期間，美日同盟的因應與動作也反映了美國捍衛同盟國安全的決心，2017年7月在北韓再度進行飛彈試射並落入日本海海域後，美國與日本旋即在7月30日與8月16日進行聯合軍事演習，目的在施壓北韓並遏止北韓進一步試射飛彈的企圖(Gady, 2017)。

對於日本而言，北韓數次飛彈試射落點均均在日本經濟海域中，造成日本國家安全的重大威脅，美國透過聯合軍事演習所展現的強硬立場不僅是對北韓的嚇阻，



也是給予日本強而有力的安全承諾保證，而隨著北韓在 8 月起多次因美國與日本、南韓所進行的軍事演習與國際制裁，進行多次飛彈試射，甚至在 9 月發射飛彈飛越日本本土威脅日本國家安全之後，除了與日本、南韓進行例行性的年度軍事演習之外，美國也在 2017 年 12 月與日本、南韓進行聯合演習，演練追蹤北韓彈道飛彈的相關事宜，此次演習也顯示美國、日本和南韓在北韓軍事情報交換上已有具體機制（Reuters，2017/12/11），持續不間斷的軍演背後所代表的不僅是美國施壓北韓的決心，也表明了美國與日本之間的軍事同盟關係穩固，且兩國在面對與處理北韓核武問題上共識明確，美國也對日本展現了其保護同盟國的安全承諾強度並未降低。

從軍事武器採購來看，美國與日本之間的軍事安全合作體系也在川普總統任期之中獲得強化，2018 年，美國與日本之間敲定九架「E-2D 鷹眼空中預警機（Hawkeye airborne early warning and control aircraft）」的追加軍售案，是繼 2015 年日本向美國購買四架 E-2D 預警機後，再度添購美國所出產的空中預警機（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19），目的在全面汰換原先日本空中自衛隊所使用 E-2C 預警機隊。2019 年，美國與日本宣布將追加部署兩套陸基神盾飛彈防禦（AEGIS Ashore）系統於日本自衛隊基地，目的在於強化日本國土的飛彈防禦體系，避免北韓飛彈造成重大安全損失（Gady，2019），日本也在 2011 年到 2019 年間，連續 8 度提升國防武器採購預算，預期將在 2019 年後增加購買更多美製或美日合作的軍機、防禦性軍事武器等（Kelly，2019/12/20），軍購的增加與軍事預算的提升，顯見在東亞安全環境持續不穩的情況下，日本對美國以及兩國同盟關係的安全依賴將進一步提升，而從兩國持續增加的軍售案而言，雖然美國在川普時期更加強調同盟關係的對等性，但在日本同意增加軍購預算的情況下，美國仍舊願意提供安全層面的支持與武器銷售，協助盟國維持國家安全並進一步鞏固同盟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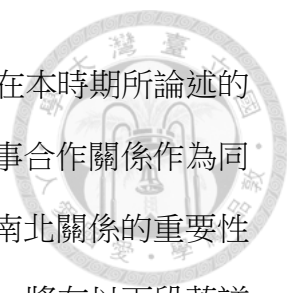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隨著軍事科技的進展以及國際對抗型態的更新，太空、網路領域也成為美國與日本進行軍事合作的全新標的，2019年4月的美日2+2會議後，美日發表共同聲明並肯認美日安保條約將進一步涵蓋網路領域，亦即一旦日本遭受網路攻擊，美國也將介入幫助日本抵禦（日本外務省，2019）。除了網路領域，在美國於2019年成立太空軍種後，日本也宣布將與美國進行相關軍事合作，亦即美日同盟合作關係將擴展至太空範圍（Wright，2020），大抵而言，美國與日本之間的同盟關係與軍事合作均在近兩年來獲得進展與擴增，美日安保條約所涵蓋的範圍也大幅增加，可見美日同盟關係的穩定與茁壯。

綜上所述，川普總統雖然十分強調美國利益優先，在經濟層面施加不同壓力於盟國日本，但在軍事與安全層面上，美日兩國的同盟關係卻是實質加強且鞏固的。尤其在美國對抗中國的態勢趨於明顯後，日本成為美國圍堵中國勢力擴張的重要夥伴，也因此美國不僅在印太倡議、印太戰略上與日本攜手合作，美日在軍事上的聯合軍演、安保條約第五條涵蓋範圍擴增、軍售的增加、軍事合作關係的持續加深與擴展都再再表明兩國的同盟關係在歷經川普上任初期的短暫風波後仍在穩定發展的軌道之上，並且持續前進。川普政府在言語與經濟上的施壓除了是為了維護美國的商業利益外，更有藉此與日本進行對等合作關係談判的意味，由此觀之，在本文的研究架構之下，美國與日本的軍事合作關係在川普與安倍的主政之下，美國給予日本的安全承諾強度並未出現顯著下降，兩國的軍事合作關係也有所加深。

貳、美國與南韓的同盟關係


作為美國在東亞地區另一個極為重要的同盟國，南韓在川普總統任期中所展現的外交政策立場、目標與共同認知均出現了變化。文在寅在2017年4月提前舉辦的南韓總統大選中順利勝出，在其上任後，南韓的外交政策、南北政策目標均有



所改變，也使得美國與南韓之間的同盟關係面臨全新局面，因此在本時期所論述的美國與南韓關係與變化，將與本研究在第一章所述的以雙邊軍事合作關係作為同盟穩固程度評估有所落差，主因是南韓調整了國際外交關係與南北關係的重要性排序，導致南韓在與美國的軍事合作上出現了不願意接受的情況，將在以下段落詳述之。

文在寅在 2017 年 5 月上任後，延續其在選戰期間所強調的：南北韓和解、改善因部署薩德系統而緊張的中韓關係、調整與美國之間的距離等等政策目標，積極尋求與北韓、中國的溝通對話空間，並且調整朴槿惠時期一面倒向美國的外交政策（Lee，2017）。然而，韓美同盟在朴槿惠時期中建立了同盟關係確立以來最密切且穩定發展的合作關係，文在寅倘若一味推翻前朝政策，也將動搖南韓與最親密盟友國間的信任關係，況且南韓在國家安全與防衛上仍需要美國的大力協助，但南韓在與美國增進合作關係的同時，薩德系統(THAAD)的部署也引發中國的強力不滿，對於亟欲調整南韓外交政策的文在寅而言，此一情況是複雜難解的局面，而川普總統的「美國優先」政策，也對盟友國南韓產生壓力（Nilsson-Wright，2017），在南韓與美國各自出現外交目標改變的情況下，此一時期的美韓同盟關係也受到衝擊。


對美韓關係而言，北韓核武發展與飛彈試射問題始終是維繫與團結美韓之間同盟關係的重要關鍵，同時也是影響東北亞區域安全的重大威脅，在川普總統期望透過強硬手段如增加經濟制裁強度、頻繁軍演、外交上言語逼迫等，試圖將北韓再度逼上談判桌，使得美國重新奪回半島核武問題的主導權之際（李明，2017：15-16），文在寅則是認為北韓問題勢必須要透過積極對話與談判解決，因此期望透過兩韓關係的拉近與和解，軟化北韓的強硬態度，另一方面也期望透過取消薩德系統（THAAD）的永久部署，改為僅進行機動性較高的暫時性部署，以和緩韓中關係，藉中國北京當局的介入來共同化解北韓核武問題（李明，2017：38-39）。



然而，川普的強力施壓政策卻使得朝鮮半島局勢在 2017 年再度陷入緊張，北韓在 2017 年年初起便進行多次飛彈試射威脅南韓與日本安全，此次朝鮮半島危機使得文在寅的對北和解政策受到強烈挑戰，也使得文在寅對美國在北韓問題上的強硬立場感到不滿，但在半島局勢一觸即發的情況下，美韓之間仍必須攜手合作。

文在寅在 2017 年 6 月訪問美國白宮，與川普總統就美韓同盟的軍事合作達成進一步共識，美國將解除對南韓政府施加的飛彈彈頭重量限制，使得南韓得以開發更多抵禦北韓飛彈威脅的反導飛彈，也使南韓在其軍事防禦自主的路上更邁進一步。川普給予南韓的軍事安全協助不僅於此，在其 11 月訪問南韓後，也宣布考慮批准南韓海軍引進核動力潛艦的軍售案 (Sheen, 2017: 43)，由此可見雖然在北韓問題上，美韓之間雖有意見不合之處，但美國並未降低給予南韓的安全承諾強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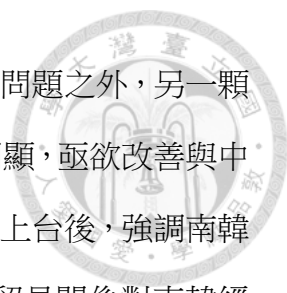
2018 年，北韓態度戲劇性軟化，金正恩在 2 月與南韓總統文在寅於首爾進行兩韓對話，象徵兩韓關係破冰，而美國川普總統在 6 月與北韓金正恩在新加坡進行歷史性會面，是韓戰之後首度進行的美國-北韓高峰會談，而隨後兩韓、美國與北韓之間相繼進行多次談話討論半島局勢與核子武器問題，卻未能就「半島無核化」達成共識或解決方式，2019 年在金正恩與川普在板門店（兩韓邊界）進行歷史性會面後，北韓仍宣布將持續進行洲際導彈設施的相關試驗，顯示 2018-2019 年中的關係和緩並未帶來實質成果 (Asia Unbound, 2019)。在軍事安全層面，此次兩韓、美國與北韓的關係緩和帶來的最大影響則是大型軍事演習的相繼取消，2018 年中美國五角大廈正式宣佈取消美韓年度例行的「乙支自由衛士演習」 (Park & Cho, 2018/06/21)；無獨有偶，2019 年初，美國國防部再度宣布將取消春季的美韓軍事聯合演習（鵠鷹、關鍵決斷演習），外界認為美韓之間大型軍演的取消或推遲，是為了維持北韓的談判意願 (Cooper, 2019/03/01)。



值得注意的是美韓之間幾次大型軍事演習的取消，其主要原因是南韓文在寅政府認為在處理北韓核武問題上，三方均需要有更為彈性、靈活的空間，因此美韓兩方在磋商後認為取消軍演可達到安撫北韓、爭取更多談判可能的效果，因而取消軍事演習（Noerper，2019），所以在本文的研究脈絡中，大型軍演的取消在此事件上並不是美國降低給予南韓的安全承諾強度。

而美國與南韓之間的軍事合作關係，在北韓問題持續延宕難以解決之際仍有所進展，在歐巴馬總統任內所推遲的「戰時指揮權」移交，預計在 2021 年完成，而 2018 年起，美軍持續幫助南韓進行移交後模擬演習與初始戰鬥能力培養，避免南韓在全面獲得戰時指揮權後無法順利運作，同時各項軍事合作與情報交流也並未停止。

美國在 2019 年中後，也陸續批准對南韓的軍售案，再度對南韓出售包含海鷹直昇機（MH-60R）等尖端軍事設備（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20），顯示美國仍願意提供南韓安全層面上的協助，然而這些正面措施未必能彌平美韓同盟關係之間的摩擦（Noerper，2019：39,46），美國在川普總統上任後所要求的貿易均衡、軍費負擔、軍購增加等，對南韓政府與人民造成沉重負擔，而南韓政府在貿易協定等雙邊關係上的持續讓步，也造成民意不滿，使得文在寅政府對於修補與鞏固美韓關係興趣缺缺，而美國在日韓關係破裂時要求南韓與日本和談的態度，也引發南韓不滿（Jachson，2019：74），因此美韓關係之間的裂痕日趨擴大，南韓政府甚至考慮不再依賴美國提供軍事設備，並自行發展國防工業（Larsen，2019）。眾多現象顯示，美國與南韓之間的同盟關係變化，在川普與文在寅主政時期之中，不僅受到美國安全承諾強度的影響，南韓本身的合作意願與外交政策目標出現變化時，也將影響美韓之間的同盟關係穩定程度。



美韓同盟鞏固雙邊關係所面臨的阻礙，除了日韓關係、北韓問題之外，另一顆巨大的絆腳石即是中國，隨著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對抗態勢愈發明顯，亟欲改善與中國關係的南韓政府，便成為了夾在兩強之間的夾心餅乾。文在寅上台後，強調南韓與中國需要建立順暢溝通的外交關係，同時南韓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關係對南韓經濟而言也至關重要，換言之，要加入美國所帶領之對抗中國的陣營，並且與中國再度關係惡劣，將造成南韓經濟損失，而原先期望透過中國調解半島局勢的期待也勢必破滅，對文在寅政府而言，一面倒向美國陣營是不可能的（Jackson，2019：72）。

另一方面，南韓與美國之間相當不對稱的國力、軍力，造成南韓對同盟關係有所懷疑，一方面需要美國協助維持國家安全，一方面卻認為美國藉同盟關係影響南韓的外交政策走向，對美、日、韓體系也充滿不信任感，使得南韓始終對美國所給予的安全承諾有所懷疑（Bong，2017：52-55）。隨著川普政府推出印太倡議，南韓雖然依舊是美國極為重要的同盟夥伴，然而其外交政策立場的擺盪、對美國安全承諾的懷疑，使得美國與南韓之間的同盟關係出現變數，動搖的同盟關係又反過頭加深了南韓的焦慮及恐懼，在認為可能被美國所拋棄的情況下，南韓的恐懼與對美國的質疑，為美韓同盟關係蒙上陰影。

綜上所述，相較於美國與日本之間的同盟關係在川普主政時期穩健前進，美國與南韓之間的同盟穩定度在此時期則遭遇波折，文在寅上任後所強調的外交平衡政策，在美國與中國對抗態勢日漸明朗、北韓拒絕放棄核子武器的情況下，南韓非但難以保持在大國之間的外交均衡，也難以就半島無核化、兩韓和解（甚至是統一）的議題與北韓保持良好關係。而美國雖然在川普總統主政下更加強調經濟貿易、軍費負擔比例的對等，但從增加軍售項目、在北韓議題上態度配合南韓而軟化等等，顯示美國仍然願意與南韓維持良好且穩定的同盟關係，而在美國透過各種外交與軍事手段期望提升在印太地區影響力的情況下，南韓仍是美國重視且不願失去的



盟友與夥伴國家，換言之，在本文所採用的研究架構中，美國對南韓所提供的安全承諾強度沒有降低，但在南韓持續態度搖擺、對美國安全承諾的信任降低的情況下，此時期的美韓同盟關係實際上是陷入低潮的。

川普總統在上任後仍強調美國應該更加維護己身的國家利益、與其他國家建立平衡且對等的夥伴關係，在「美國優先」的政策的推行下，的確對東亞兩大盟國造成負擔與疑懼，但隨著印太倡議的提出、對抗中國的情勢明朗化，美國需要日本與南韓在印太地區共同面對中國對國際秩序的挑戰，也因此願意透過不同軍事合作手段提升同盟關係，同時也給予盟友國更為穩定的安全承諾。美國與日本的關係雖然仍因貿易協定的重新談判而出現風雨，但大體而言仍是穩固且有所強化的同盟關係，美日安保體系也隨著適用範圍的逐步擴大，漸漸轉變為全球性的戰略夥伴。而美國與南韓之間，在川普主政初期，最主要的關注重心是解決北韓核子武器問題，但隨著北韓問題再度停滯不前、對中國的忌憚，美國仍願意在軍事安全層面給予南韓幫助，並且強調美韓同盟的重要，但南韓文在寅政府陷入的外交尷尬情況，使得美韓同盟關係出現低潮。

上述也回應了本文所提出的第三個研究問題，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調整代表著其在「對抗中國」的目標之下，為了加強與盟國的安全合作關係，並未在「美國利益優先」的議題上對盟國緊逼不捨，而以本文的研究架構而言，美國給予日本、南韓的安全承諾強度並未降低，但三國互動體系中所出現的變化，會在下一章中討論。

第三節、日本與南韓的關係

在歐巴馬總統任期最後，日本與南韓的雙邊關係出現了歷史性進展，對北韓情

報互換協定（GSOMIA）的簽署，雖然是日本與南韓在二戰結束後首度簽署軍事合作層面的協定，但日本與南韓之間的外交關係仍受限於歷史問題，難有更近一步的進展。隨著南韓新任領導人文在寅 2017 年上任，其鮮明的反日立場也使得日韓關係冷淡，而美國在川普政府的領導下，其政策也未如歐巴馬政府一般，做為和事佬撮合日韓雙方，導致日本與南韓的關係未見突破，最終漸行漸遠，甚至來到了關係破裂的邊緣。

隨著川普總統對印太地區的重視，東亞盟國對於美國來說，重要性不減反增，鞏固同盟也成為要務，在美國安全承諾強度提升的情況下，從車氏的假說出發，日本與南韓之間的關係會因此而陷入低潮，且在美國缺乏調停意願的情況下，日本與南韓的雙邊外交互動可能更加冷漠，而實際上日本與南韓之間首腦與外交高層的互動情況也的確沒有出現熱絡的跡象（見表 4-1）。

表 4-1

2017-2019 日韓高層互動統計

年份	日韓領導人互訪 與會談（實際會 面）	日韓領導人電話會談	日韓外交部長會談
2017	2	9	13
2018	3	2	7
2019	1	0	10

（單位：次數）

資料來源：日本外務省，2017-2019，〈大韓民国 過去の要人往来・会談〉

與上一章歐巴馬總統第二任期相比，日韓之間的外交高層互動在 2017 年雖有增加跡象，但仍是電話會談居多，受限於電話熱線，雙方多半僅簡單進行意見交



換，難以討論重大合作事項，當年度 6 月後所進行的 8 次電話會談多半是就北韓飛彈試射與朝鮮半島緊張情勢交換意見，並強調雙方應該在北韓問題上攜手合作（但除了 GSOMIA 之外，並無實質性合作事項）。

兩次首腦的實際會面是藉 G20 峰會與東方經濟論壇機會，在 G20 會議期間所舉行的日韓領導人會談是南韓文在寅在上任後首度與日本安倍晉三進行領袖會談，會間雙方強調在北韓問題上應該共同尋求解決辦法，也期待能透過增加雙邊交流，化解日韓人民對彼此的誤解與惡意，並確保區域中的和平（日本外務省，2017/07/07）；而在 2017 東方經濟論壇會面的兩國領袖，除了再度討論朝鮮半島危機情勢以外，也談到了日韓之間因歷史問題所起的齟齬，安倍強調日本已善盡賠償與道歉的立場（日本外務省，2017/09/07），由此可見文在寅對日韓歷史問題的在意已經使得日本方面感到困擾。

2018 年是日韓關係急轉直下的關鍵點，此期間日韓雙邊的外交對話與互動，除了同樣注重朝鮮半島局勢變化以外，歷史問題也成為對話主軸，2 月安倍晉三藉平昌冬季奧運機會訪問南韓，除了北韓問題以外，日韓領導人在談話時再度聚焦於日本二戰時期徵用南韓青年的徵用工問題，日方也重申日韓已經就歷史問題在朴槿惠時期達成「最終且不可逆轉」的協議，要求南韓應該遵守雙邊協議（日本外務省，2018/02/09），而在後續兩次會面與電話會談中，日韓之間也不斷就慰安婦、徵用工等歷史問題進行討論（日本外務省，2018/05/09 & 2018/09/25），雖然雙方都強調日韓之間應該持續發展穩定友好的外交互動關係，但很明顯地，歷史仇恨仍是橫亙在雙方之間的巨大鴻溝。

而本研究所使用的另一項日韓雙邊關係指標：日韓安保對話，也顯示出日韓關係陷入谷底，2018 年 3 月，時隔三年再度舉辦的第十一屆日韓安保對話成為此時



期唯一一次舉行的雙邊安保對話，此次安保對話中，日韓國防官員就美、日、韓三邊的軍事合作進行意見交換，並強調北韓問題仍須透過共同合作解決（日本外務省，2018 & 朝日新聞，2018/03/16），但隨後日本與南韓的雙邊關係急轉直下，關係交惡的雙方再無舉行安保對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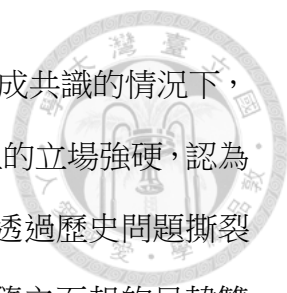
表 4-2

2013-2016 日韓安保對話統計

年份	日韓安保對話
2016	無
2017	無
2018	第十一回
2019	無

資料來源：日本外務省，2016-2019，〈大韓民国 過去の要人往来・会談〉


2018 年 10 月底，南韓最高法院判決認定日本多家在二戰時期使用過徵用工制度的企業必須就此事負起賠償責任，告訴方的律師團甚至要求法院凍結這些日本企業在南韓的資產以施壓其負起責任，此次判決再度引發日本與南韓間就徵用工、慰安婦等歷史問題的爭論，日本認為日韓雙方早在 2015 年就已經就相關歷史問題達成共識與解決，而 1965 年所簽訂的日韓請求權協定（財産及び請求権に関する問題の解決並びに經濟協力に関する日本国と大韓民国との間の協定）也已經載明了相關賠償的辦法，南韓法院的判決無疑是違背雙方協定的無效判決，而南韓法院則認為雙方在 2015 年所達成的協定是針對慰安婦問題，在徵用工問題上，日韓雙方並未協調出適切的賠償責任歸屬與安排，而 1965 年的協定也不應被視為最終解決方式（日韓請求權協定並未提及「個人索賠權」），因此南韓方面認為日本與日本企業應該賠償，南韓政府也表達了尊重法院判決的看法，引發日本政府與國內



民意反彈 (Hurst, 2018)。在雙方政府無法再度就徵用工問題達成共識的情況下，日本與南韓的雙邊關係在此後進入緊張，而文在寅在歷史問題上的立場強硬，認為日本不應持續推卸責任，日本安倍政府也表達了厭倦南韓反覆透過歷史問題撕裂日韓關係的看法，並期望南韓政府能夠妥善處理此次判決以及隨之而起的日韓雙邊關係緊張 (Yamagichi, 2018)，然而卻事與願違，日本與南韓之間的摩擦愈演愈烈。

2018 年底，在日韓關係持續緊張之際，12 月 21 日日本防衛省召開記者會，宣稱 20 日下午日本海上自衛隊巡邏機在進行任務時遭到南韓海軍驅逐艦雷達多次鎖定瞄準，日本防衛大臣也批評這樣意圖不明的瞄準行為可能引發雙方出現不必要且危險的軍事衝突事件，然而南韓軍方僅承認在事件當下的確使用了射控系統雷達，但並無瞄準日本軍機，隨後南韓外交部又在 24 日改變說詞，強調雷達瞄準事件是不存在的，批評日方就不存在的事實挑起雙邊爭端極為不智，引發日本政府強烈不滿，並在 28 日釋出自衛隊巡邏機在事件發生時所拍攝的照片 (Panda, 2019)，在此事件上雙方對話沒有交集、各說各話，無疑對已經觸礁的日韓關係再掀波瀾。

2019 年伊始，日本與南韓關係由於雷達瞄準事件仍未回溫，雙方外交互動降到冰點，情況持續直到 6 月在日本大阪舉辦的 G20 高峰會，安倍晉三與文在寅雖然在會議上碰頭，但僅短暫握手表示禮貌，並無更多交流與會談，顯示雙方均無改善惡劣關係的意願。日本在會議結束後不久的 7 月初限制與半導體、面板產業相關的三項重要原料（含氟聚醯亞胺、光阻劑、蝕刻氣體）出口至南韓，引發南韓強烈反彈，認為日本是針對南韓經濟命脈的科技業進行施壓。然而日本面對南韓政府的抗議並未停止相關措施，更在 8 月初宣布將南韓自貿易安全國名單（貿易白名單）之中移除，出口至南韓的商品若被懷疑有所疑慮，日本政府相關單位即可要求留置、審查，對日本與南韓之間的商品貿易造成阻礙，南韓為了反制日本政府的行



為，也在幾日後宣布將日本自貿易白名單之中移除，至此日韓的雙邊爭端正式從歷史仇恨問題演變成兩國的政治外交與經貿對抗（Kim，2019），雖然本文主要討論的日本與南韓之間的軍事安全合作關係，但本次日本與南韓之間的貿易戰主因是兩國原有的歷史仇恨問題，而日韓貿易戰是一種政治性報復手段，且貿易戰的出現也引發兩國間軍事安全合作關係的動搖，因此仍可被視為雙方關係交惡的重要線索。

2019年8月底，南韓青瓦台召開國家安全會議，決議將終止2016年與日本所簽訂的軍事情報分享協定（GSOMIA），符合GSOMIA內容中所載明在中止協定前90日通告對方國家政府的規定，因此若無其他意外，南韓的決定已經等同於撕毀GSOMIA，日本與美國對於南韓撕毀協定的舉動均表示大為震驚，但文在寅政府的態度堅定，認為在日本對南韓持續進行經濟報復的情況下，終止GSOMIA是合理且保護國家利益與安全的做法，然而在北韓問題持續懸而未決、美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也急轉直下的情勢下，南韓此舉不僅動搖了日韓之間的信任與安全合作關係，更影響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佈局（Smith，2019：103-104）。

美國在日本與南韓關係交惡初期並未採取強烈介入手段調停，然而在南韓宣布毀棄GSOMIA後，美國才真正決定介入日韓此次爭端，美國國防部印太防衛事務助卿（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Indo-Pacific security affairs.）在Cha的訪問中提到，美國期望日本與南韓在歷史問題上的爭論能與軍事安全合作事務分離，而GSOMIA的存在不僅是維護日本與南韓國家安全的重要關鍵，也將影響美日韓三國互動關係的穩定（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2019）。

在美國介入後，南韓在協定終止的前一天，2019年11月22日宣布將維持GSOMIA，雖然外界普遍認為是川普政府在與南韓進行駐韓美軍軍費談判時，對南

韓進行施壓，使南韓在考量美韓同盟的穩定與區域情勢後，才勉強同意留在日韓 GSOMIA 之中 (Rich & Wong, 2019/11/22)。



從日本與南韓關係近年兩次惡化 (2012 年南韓李明博登獨島、2018 年徵用工判決爭議) 均仰賴美國出面調停、施壓兩國的情況來看，日本與南韓的外交與安全合作關係在實質上仍然冷淡且陷入低潮，雙方雖然仍願意保持對話與簽訂 GSOMIA，但並非是出自雙邊關係的和緩或和解，而是在共同盟友美國的壓力之下不得不為之，2019 年底，日本與南韓領袖在中、日、韓高峰會上進行徵用工判決爭議出現以來的首次首腦會談，會中雖然均強調雙邊將持續對話、合作，使區域情勢穩定，但仍未見更進一步行動 (日本外務省，2019/12/24)，由此觀之，日本與南韓的雙邊關係短期內仍難以修復。

在 2017 年-2019 年的日韓關係，單純機械性的層面上仍符合車氏假說中所提到的：美國給予的安全承諾強度上升後，日本與南韓的關係摩擦便會增加，隨著川普政府在 2017 年末提出印太倡議，美國對於東亞盟友的重視程度提升，日本與南韓的雙邊關係即進入摩擦較多的寒冬時期。對於自歐巴馬總統主政時期即不熱絡的日韓關係而言，2018 年徵用工賠償問題所引發的外交、經濟、軍事合作領域的爭論、摩擦，對雙邊關係影響甚鉅，造成的損失也不僅限於經濟層面，還擴及了日韓雙邊的信任關係、兩國對對手國家的觀感等，可能持續損害未來的日韓雙邊關係。

然而，實際上在川普總統執政時期的美、日、韓之間的互動，其解釋邏輯已經改變，由於車氏在其研究時間區段中，美國與日本、南韓的共同威脅認知並未出現變化，因此僅需要觀察美國安全承諾強度的變化，但在川普總統主政期間，美、日、韓三國之間對於外在威脅的共同認知已有所改變 (將在下一章進一步討論)，北韓

與被美國視為競爭對手的中國所帶來的威脅，未必能夠再度促使美、日、韓進一步團結與合作對抗威脅來源。



另一方面，歷史仇恨問題在近年的日韓爭端中往往是重要的導火線，並且其嚴重性有日漸增加的情況，與車氏傾向將日韓之間的歷史仇恨問題視為較為穩定、不變的背景因素有所不同，從慰安婦問題到徵用工賠償，歷史問題漸漸成為日本與南韓關係難以前進甚至是持續惡化的主因，顯示此問題可能實際影響南韓政府的外交決策。

綜言之，日韓關係在近十年的變化仍能符合車氏所提出的假說，但隨著美國對抗中國的政策強度提升、日本與南韓的外交自主能動性提升等等情勢轉變，國際環境已與車氏所討論的冷戰背景有巨大不同，也導致了維持美、日、韓互動關係的主要前提：「對外共同威脅認知」出現變化，因此下一章節將就這些變化進行討論，藉以補足 Cha 假說中未能涵蓋的情勢改變。



第五章

美、日、韓共同威脅認知改變



在車氏的假說之中，美國、日本、南韓之所以可以透過兩組雙邊同盟關係以及一組「準同盟」關係進行互動與合作，乃是因為美、日、韓三國之間存在對外部敵人的共同認知（common recognition），也就是說美、日、韓之間存在必須合作對抗的外部威脅，這些威脅國家的存在促使三個國家在國家安全議題上互相依賴，換言之，共同威脅認知是維繫美、日、韓三角關係的重要力量，然而，隨著國際環境與外交政策方針的改變，此存在於美、日、韓之間共同認知也出現了變化。

第一節、北韓所造成的核武威脅

自 1953 年韓戰結束，朝鮮半島依北緯 38 度線分裂為南、北韓以來，北韓所採行的獨裁政體、1990 年代開始發展的核子武器，使其成為東北亞區域安全體系所面臨的重大威脅，在蘇聯解體、冷戰落幕後，北韓也成為美日、美韓同盟關係中最主要的共同敵人，但在處理北韓問題上，美國雖然是聯盟體系中的主導者，但由於南韓與北韓之間複雜的情感與政治問題，使得美國與南韓未必能在北韓問題上維持立場一致；而與朝鮮半島相隔著日本海的日本，在北韓問題上往往扮演著協助者的角色，但隨著北韓飛彈技術發展，北韓對日本所造成的國家安全威脅程度提高，使日本在北韓問題上必須更加仰賴美國的幫助，因此通常會跟進美國的政策立場，而對朝核問題的政策立場搖擺程度不同，也成為影響美韓、美日關係的重要原因。

自 1990 年代美國開始懷疑北韓具有發展核子武器意圖後，美國即透過條約、



國際制裁、經濟與建設援助等手段，試圖誘使北韓放棄核子武器研發，然而 2005 年，北韓透過官方電視台對外宣佈其擁有核子武器，隨後開始一連串的武器試驗，使得美國的對北韓外交政策正式由遏止北韓擁有核子武器，調整為透過外交、制裁等手段迫使北韓放棄已經擁有的核子武器技術，並將政策目標設定為朝鮮半島無核化（U.S. Department of Defense，2018），2008 年歐巴馬總統上任後，主要期望透過重啟「六方會談」嘗試解決北韓核武問題，並堅持朝鮮半島應該「無核化」，南韓在李明博上任後也附和美國所提出的朝鮮半島無核化要求，導致兩韓關係惡化（李明，2013：19），但總體而言，在李明博執政時期的美、韓以及日本對於北韓的態度與要求是一致的；2012 年，朴槿惠就任南韓總統，朴槿惠認為兩韓應在北韓拋棄核子武器的前提下進行交流（李明，2013：3），也因此朴槿惠執政時期，南韓仍未偏離美國對北韓的外交政策立場。

2017 年，文在寅代表南韓共同民主黨競選南韓總統勝選，在其競選與上任之初即強調南韓的對北政策應該延續金大中、盧武鉉執政時期的和平政策，與北韓進行交流與建立互信基礎，認為李明博與朴槿惠執政時期一味跟隨美國施壓北韓的政策無法真正解決兩韓問題以及北韓核武問題，在此強硬手段下也僅會迫使北韓拒絕與美國、南韓進行談判（Lee，2017）。

隨著川普總統加強制裁北韓，南韓的對北政策也與美國逐漸出現不同調的情況，文在寅的兩韓政策強調和平交流、積極對話，並期望透過兩韓相互合作建立半島的永久性和平機制，並透過此和平機制進一步解決北韓核武問題，以及使兩韓統一得以水到渠成，在適當時機完成半島統一（Moon，2019：10-11），但誠如上一章節所述，川普總統在 2018-2019 年與北韓金正恩談判未果後，其對北韓的政策再度轉趨強硬，與文在寅所堅持的交流、和解有所差距，而文在寅在謀求兩韓統一上的堅持態度，也標誌著南韓在文在寅政府的領導之下，對北韓的敵意下降，自然而


然在政策立場上出現與美國不同路線的情況，換言之，在對北韓的共同敵人認知上，南韓已經逐步顯示出與美國、日本不同的態度，此一立場轉變也將影響美國、日本、南韓三國的同盟體系。



在對北韓的認知上，美國與日本自北韓擁有核子武器以來均是將北韓定位為威脅、敵人，尤其在北韓的核子武器、洲際飛彈技術日漸提昇並頻繁進行試驗後，美國與日本更將北韓視為破壞東北亞安全環境的主要原因，也因此美國與日本在對北韓政策的立場通常保持相同，但與北韓接壤，與北韓具有民族、文化情感的南韓，則在文在寅主政後出現與美、日不同的立場，雖然南韓仍然強調朝鮮半島應該往「無核化」方向前進，但文在寅政府對北韓的和解政策與美、日的軍事、經濟施壓制裁有所不同，文在寅也強調南北韓的統一是其亟欲奮鬥推行的目標，顯示南韓已經逐漸改變對北韓的敵我認知，此改變不僅將改變南韓的對北政策，也將造成美韓同盟體系的變化，在北韓核武問題陷入僵局的情況下，美韓同盟在對北韓政策不同的情況下將如何前進，將是值得關注的重要議題。

第二節、中國崛起的挑戰

美國與中國自 1979 年建交後，隨著中國在經濟、軍事、科技等各方面持續發展並對外國發揮影響力，美中關係也隨之轉變，美國在冷戰結束後所建立的國際秩序受到中國國力大幅提升的挑戰，同時中國在其領土邊界、領導與經濟海域內的軍事擴張也對區域中的安全環境造成影響，此一情況在歐巴馬總統第二任期之中逐步明顯，在歐巴馬總統致力於推動重返亞太計畫的同時，美國與中國在軍事戰略、貿易經濟、外交方面的權力競逐也逐漸明朗，雖然歐巴馬總統並未公開且指名道姓的點出中國將是美國在 21 世界最主要的競爭國家，但其在東亞區域之中與同盟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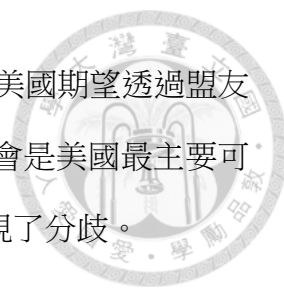


的積極合作，以及在南海海域增加的軍事力量部署，都顯示美、中之間的關係已出現本質性的改變，然歐巴馬總統任內所推動的重返亞太政策並非是為了圍堵崛起中的中國（何思慎，趙春山編，2015：11-12），而是穩固美國在亞太區域中的實質影響力，換言之，在歐巴馬總統主政時期，美國與中國的互動關係雖然出現變化，但並未進入全面對抗的狀態。

2017 年川普總統上任後，其首先透過「美國優先」政策向各盟國要求平衡貿易逆差、增加盟國負擔駐外美軍費用的比例，隨後不久也將矛頭指向了長期與美國之間有貿易不平衡問題的中國，同時也在其國防與軍事類報告中直指中國將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而 2017 年底美國印太倡議的提出，其目的也被認為是為了制衡中國在印度洋、太平洋日益擴張的軍事力量，而 2018 年中所開始爆發的一系列美國與中國之間的關稅、貿易逆差等經貿爭端，除了象徵美國在經濟上不再容忍中國等國長期利用低關稅、低價格的產品進入美國市場之外，也代表著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對抗號角已然吹響，中國正式成為美國所認為的，對國家安全與國際外交秩序的構成威脅的競爭者（Glaser & Flaherty，2018：22-23）。

伴隨著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戰展開的對抗局面，標誌著美國的對華政策已經由和平共處轉向為全面對抗，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國也成為川普政府對抗中國的第一線，第四章中提到的美國於 2018 年起陸續加強與日本、南韓間的同盟關係，以及增進與印度、澳洲的軍事合作，均代表美國除了增加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以外，拉攏盟國以對抗中國也是重要的政策目標，川普總統在 2018 年後的政策也表明，對抗並透過盟友國家圍堵中國已是超越「美國優先」的重要外交目標，尤其在經濟、軍事層面上，美中的對抗局面已清晰可見。


而在美國與中國對抗的態勢日益明朗後，美國在東北亞的兩大盟國日本與南



韓，其二國與中國的外交互動關係也成為外界矚目的焦點，倘若美國期望透過盟友的力量共同制衡中國在區域內漸增的影響力，則日本與南韓將會是美國最主要可以依賴的夥伴，但在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上，日本與南韓仍舊出現了分歧。

日本在安倍晉三的領導下，其外交政策多半與美國相近，同時不斷加固的美日安保體系也成為日本對外發展軍事合作的重要基礎，而中國在周遭海域不斷擴增的海軍力量、與日本舊有的領土爭議（如釣魚台列嶼）、日軍侵華歷史鎖帶來得仇恨，種種因素都使得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存有隔閡，而日本在面對中國軍事實力提升的憂慮則使其更加依賴美國所提供的安全承諾，且由於地理的鄰近性，日本在 2005 年便已經將中國視為新興威脅來源，認為中國在東亞海域內的軍事擴張將威脅日本的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因此雖然日本其防空體系、反導彈系統的部屬等都是主要針對來自北韓的飛彈威脅，但中國仍被日本國防當局視為可能威脅日本與東亞區域安全的新興強權（Wong，2015：1250），雖然日本與中國之間同樣存在重要的經貿合作往來，但在軍事安全的層面上，日本顯然與美國存在更加緊密的互動關係，在對抗中國軍事力量擴張的層面上，美日的腳步一致。

另一方面，南韓的情況則顯得複雜許多，朝鮮半島直接與中國領土接壤，而影響南韓國家安全的北韓則與中國保持著友好的外交關係，南韓自六方會談架構形成以來，即有透過中國斡旋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的意圖，而小布希總統與歐巴馬總統在北韓核問題上的停滯不前，也使得南韓將希望轉移至中國政府，而北韓威脅一直是維持美國與南韓關係的重要因素，當中國得以透過北韓問題獲得南韓政府的重視，再加上南韓對於美韓同盟關係的懷疑、對於美日同盟的猜忌以及對未來強權關係不明確性的恐懼，使得南韓持續希望保持在美國與中國兩大強權中的平衡關係，以躲避可能的風險與威脅（Kuik，2015），雖然南韓在面對中國的軍事擴張威脅時，仍傾向於向美國尋求軍事安全承諾，但由於中國與南韓之間的經濟貿易關係是維




繫南韓經濟的重要命脈之一，導致南韓在外交政策上仍期望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避免遭受中國的經濟手段報復，因此南韓與日本在對中政策上逐漸顯露出不同（Wong，2015：1265-1266），而日本、南韓與美國是否能夠在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上建立起共識，形成得以鞏固同盟互動關係的共同敵人認知，在南韓態度與意向尚未明朗的情況下，仍有待觀察。

第三節、日本與南韓的相互認知

日本與南韓自 1965 年簽訂《日韓基本關係協定》後，外交互動的正常化並未帶來雙邊關係的明顯改善，日本與南韓之間由於殖民歷史、領土爭議等問題，縱使共同擁有美國此一重要盟友國家，卻仍舊無法真正和解並且合作面對區域內的安全威脅與國際情勢轉變，而在第二至第四章，本文已經透過車氏所提供的假說，探討了美國的安全承諾強度變化將影響日本與南韓的雙邊關係互動，而在此處，則期待透過補充說明日本與南韓人民對彼此的認知與觀感，使得日韓關係互動的影響因素更為完整。


根據日本非營利組織「言論 NPO（The Genron NPO）」長期針對日本與南韓民眾做出的民調顯示，日本與南韓民眾對於彼此的正、負面觀感在近幾年中出現了微妙的變化，在日本的民意調查中顯示，對南韓抱有正面觀感的民眾占比逐年下降，抱持負面觀感的民眾占比則逐年攀升，近一步細究原因後，對南韓抱持負面觀感的日本民眾多數認為南韓仍不斷重提二戰期間與殖民朝鮮半島時的歷史問題，並藉以要求日本道歉與賠償，是讓他們對南韓抱持負面看法的主因，另一方對於南韓抱有正面觀感的日本民眾則認為韓國影劇與娛樂產業的興起、消費文化（2019 年新增選項）都讓其深受吸引，因此對於南韓的觀感較為正面；而在南韓的情況則相反，在接受調查的南韓民眾中，對日本抱持正面觀感的佔比在近年來有所提升，而



抱持負面觀感的民眾占比則逐年下降，而對於日本抱持負面觀感的民眾多數認為是由於日本並未就歷史問題做出妥善的補償與道歉，以及日本與南韓在領土爭議上的互不相讓，是導致南韓民眾難以對日本抱有正面想法的主因，而比例逐漸上升，對日本抱有正面觀感的南韓人則認為原因是日本在經濟發展上的成就以及人民的親切友善，使其對日本抱持正面想法（The Genron NPO，2019），換言之，日本與南韓民眾在對彼此的觀感上出現了反轉跡象，隨著交流增加，雖然抱持正面觀感的比例仍不超過 4 成，日本的經濟發展成果與文化已逐漸使得南韓民眾對其觀感改變，而對於日本民眾而言，南韓多采多姿的娛樂產業以及與日本不同的文化風采，是嶄新且有趣的體驗，但是更為明顯的事實是，歷史問題仍是橫亘在兩國之間的巨大鴻溝，而歷史問題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僅僅大幅影響南韓多數民眾對於日本所抱持的看法，也逐漸開始扭轉日本民眾對於南韓原本的良好印象。

而歷史仇恨以及殖民歷史影響的不僅僅是兩國人民對彼此的觀感，同時也是影響兩國人民敵我認知的重要因素，從「言論 NPO」所釋出的調查結果而言，日本與南韓民眾對於「敵國」的認知有所差距：日本民眾認為可能威脅國家安全的前三個國家分別是北韓、中國以及俄羅斯，然而南韓民眾卻認為除了北韓與中國以外，日本也是可能造成軍事安全威脅的國家之一（The Genron NPO，2019），雖然民意所顯示的敵我認知未必會完全影響並主導政府決策，但在民主國家中，民意仍是支持政府政策的主要支柱，在南韓民眾仍對日本的軍事力量抱有疑慮的情況下，南韓政府的對日政策勢必受到影響，日本與南韓之間的軍事合作關係也難以持續前進。

在車氏的假說中認為歷史問題是存在日本與南韓關係中的背景因素，但並非是影響日本與南韓準同盟關係的主要原因，美國所給予的安全承諾強度才是影響兩國關係的最主要變項，但事實上，歷史問題所帶來的影響在近年來有逐漸增加的



趨勢，由於南韓政府與人民仍相當在乎日本在二戰前後為朝鮮半島所帶來的傷痛，因此南韓難以建立與日本之間的互信友好關係，而從日本的角度出發，日本政府與人民顯然已經厭倦了一而再為了改善日韓雙邊關係，不斷就歷史事件道歉、賠償與爭論不休。

在上述情況交織之下，導致了日本與南韓雖然在 2016 年於美國的斡旋之下簽訂了 GSOMIA，仍在 2018 年底因為徵用工判決問題引發日韓貿易戰，並進一步撕裂日本與南韓的雙邊關係，不僅是軍事安全合作停擺，其他外交互動與經貿交流也幾乎陷入冰點，在歷史問題難以解決的情況下，日本與南韓恐怕難以建立良好且穩定的互動關係。

第四節、小結

在美國、日本與南韓的同盟體系之中，自冷戰後持續存在的共同敵人北韓仍是三國必須合作對抗的主要威脅來源，而美國自調整外交政策期望遏止中國崛起並與其爭奪國際領導權以來，美中對抗的局面也使得東北亞的安全秩序受到挑戰，因此美、日、韓之間是否能就中國再度形成一共同的威脅認知是未來必須持續觀察的重點事項；而南韓在對北韓外交政策上的搖擺、對兩韓統一的期望都將影響南韓是否仍願意與美國、日本共同抵禦來自北韓的安全威脅；另一方面，在南韓持續對日本抱有防備與敵意的情況下，日本與南韓的準同盟關係即存在難以克服的障礙，雖然至今日韓之間並未出現相互敵對的情況，但由於共同威脅認知的改變，仍可觀察到三國在外交政策上的調整已經造成同盟體系的動搖，而一旦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持續惡化，在此美中對抗的架構中，美、日、韓三國的互動關係也勢必會因為上述因素持續出現變化，同盟體系是否能夠持續維持穩定並且合作對抗外來威脅仍是未知數。

第六章

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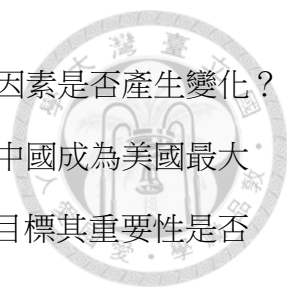
在 2009-2019 年間，美國、日本、南韓都歷經了領導者的改變以及外交政策的調整，而對於期待重新確立亞太地區領導地位的美國而言，歐巴馬總統以及川普總統的外交政策無一不是為了提升美國在亞太甚至是印太地區的國際影響力，並且維護美國在區域中的經濟、軍事安全利益。

對於南韓與日本而言，美國的外交政策調整直接衝擊著美國所給予的安全承諾強度，對於在軍事防衛上相當依賴美國的日、韓而言，美國的安全承諾代表的不僅僅是同盟關係的穩定，更深深影響著兩國的防衛安全體系以及其所處的區域安全秩序，隨著美國的國力萎縮，日本與南韓的外交政策也趨向力求自主與平衡，美國、日本、南韓三國的同盟與準同盟體系在近十年內面臨轉變與挑戰。

第一節、主要研究發現

本文所採用的研究架構是車氏於 1999 年出版 “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 The United States-Korea-Japan Security Triangle” 一書中的假說一，即「美國的安全承諾強度將影響日本與南韓之間的雙邊關係」，車氏認為當美國的安全承諾強度提升，日本與南韓的關係則會出現摩擦，反之則亦然，而本文在第一章中所提出的三個研究問題包括：

(一) 在歐巴馬與川普主政時期，車氏的理論假說是否仍能夠描述日韓關係在 2009 年後經歷美國外交政策調整與同盟安全承諾強度變化下所產生的變化，並與其假說的結論相符合？



(二)而符合或者不符合間，其三國互動關係所面對的背景因素是否產生變化？

(三)而美國的外交政策在川普主政時期出現重大變化，在中國成為美國最大戰略對手之後，積極的拉攏東亞盟友國家共同對抗中國的政策目標其重要性是否將凌駕川普總統所追求的提升美國單邊利益目標？

三個問題均已在本文前幾個章節之中獲得充分討論與檢證，因此本小節將簡述研究發現與成果。


壹、針對第一個與第二個研究問題的研究發現

一、歐巴馬總統執政時期

在歐巴馬總統執政的初期，由於中東事務繁雜，雖然歐巴馬總統不斷強調亞太地區的重要性，但仍無法實質性的將外交重心轉移至東亞，但隨著中東戰事趨緩，美國透過重返亞太政策加深與東亞盟國、亞太地區的連結，一系列深化同盟關係與軍事合作的政策，使得美國與日本、美國與南韓之間的同盟關係均有所鞏固，在美國所給予的安全承諾強度提升的情況下，日本與南韓之間也正如車氏的假說所提到的，出現了較多摩擦與紛爭，也使得日本與南韓關係在歐巴馬總統第二任期的前半時間陷入冰點，雖然後期在美國的強勢介入之下，日本與南韓仍簽訂了軍事情報互換協定 GSOMIA，但總體上，歐巴馬總統執政時期的美、日、韓關係仍符合車氏所提出的假說。

二、川普總統執政時期

2017 年初，川普上任美國總統，其對於美國國家利益的保護、經濟貿易關係的平衡、盟友關係的對等都有其堅持，也因此在此在川普總統執政之初，其對於盟友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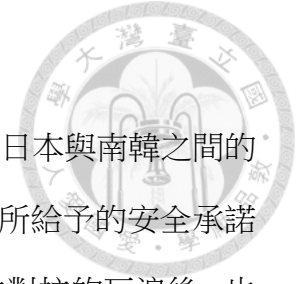


的要求有些嚴苛，除了要求重新與日本、南韓談判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之外，也期望日本與南韓在駐外美軍的費用負擔上能承擔更多比例，同時也希望日、韓能在防衛國家安全的層面上付起更多責任，這些要求看似動搖且降低了美國所給予的安全承諾。

但實際上川普政府對於東亞盟國的重視並未減少，除了增加軍事合作之外，軍售增加也代表著美國僅是轉變了舊有的政策，改為透過提升盟國己身的防衛能力來協助盟友國家抵禦外來威脅，也因此雖然川普總統執政期間，美國對外的許多外交政策造成了美日、美韓等關係出現看似矛盾的情況，但實質上美國並未削減其對亞太地區及東亞盟國的重視，而在美國與中國開始出現貿易爭端、美中對抗的情況出現，美國也更加重視與日本、南韓之間的同盟關係，雖然日、韓領導人對川普政府的反應不一，而在政策選擇上也有所分歧，美國仍維持著較高強度的安全承諾，而日本與南韓的關係在此時期大體上也符合車氏假說，日本與南韓的雙邊關係在美國安全承諾強度維持的情況下，出現了極為嚴重的爭端與衝突事件，日、韓之間歷史問題的死結成為爭端核心，造成日韓關係急凍。

貳、針對第三個問題的研究發現

根據第四章之中對川普政府外交政策及美日、美韓關係的探討，本文發現雖然川普政府十分注重與同盟國之間的經貿、軍事合作關係對等，同時也強調同盟國對安全的維持需要負起一定責任，但在 2018 年美國與中國出現貿易爭端，並在 2019 年進一步確立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之後，川普政府與同盟國之間除了討論關係對等化的軍費負擔等問題外，更加著重於與日本、南韓的軍事合作加強，由此可以看出美國對東亞盟國的重視，因此本文認為川普政府在美國利益優先與對抗中國的重要性排序上，明顯選擇將團結盟友國家共同對抗中國視為首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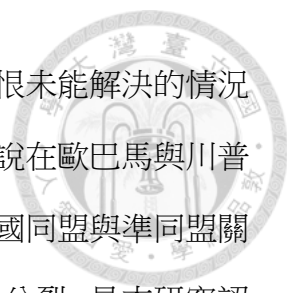


總結來說，車氏的假說時至今日仍能夠解釋近十年來美國、日本與南韓之間的互動關係，三國在東亞所建立的同盟與準同盟體系仍深受美國所給予的安全承諾強度影響，隨承諾強度變化而出現改變；而川普總統在掀起美中對抗的巨浪後，也調整並加強了給予東亞盟國的安全承諾強度，以期順利達成「對抗中國」的外交政策目標。

然而，在本研究中構築美、日、韓三國同盟與準同盟體系的主要前提是，三國之間存有對外共同的威脅認知，而長年以來此一共同威脅的來源即是 20 世紀開始發展核子武器並且造成區域安全極為不穩的北韓，然而隨著南韓政府在政權交替後的外交政策調整，南韓對於北韓的敵對意識有所降低，也造成了共同威脅認知的改變；另一方面，川普總統執政後，美國與中國對抗的態勢明朗化，在美國政府亟欲拉攏東亞盟國，齊心對抗中國對外的軍事擴張與國力崛起時，南韓也在抗中政策上有所遲疑，也就是說美、日、韓之間也未能在面對新興威脅來源中國時，順利建立起共同的威脅認知，也因此三國同盟與準同盟體系在川普執政時期，事實上已出現了與原有 Cha 假說所提到的解釋邏輯不同的情況。

第二節、理論意涵

雖然在本文的研究時間範圍內，車氏的假說仍舊能解釋美國、日本與南韓之間的互動關係，但構築出三國同盟與準同盟體系的前提是存在著共同的威脅認知，而最主要支撐著三國軍事合作的共同威脅北韓，隨著南韓政府對於外交政策的調整以及對於兩韓統一的渴望，雖然北韓核武問題仍舊懸而未決，但此一共同威脅認知已經出現動搖的情況；另一方面，美國對於中國的敵意愈趨明顯，日本與南韓是否能夠準確跟隨美國的腳步，進入對抗中國的局勢之中，並且與美國攜手合作，仍在



未定之天；而日本與南韓關係的根本問題是歷史仇恨，在歷史仇恨未能解決的情況下，南韓難以消解對日本的敵對意識，也就是說，雖然車氏的假說在歐巴馬與川普總統執政時期仍能夠機械性地解釋美、日、韓的互動關係，但三國同盟與準同盟關係的體系是否能持續維持，支撐體系的重要威脅認知是否會出現分裂，是本研究認為在未來需要持續觀察的重點，而在重要的共同威脅認知持續崩解的情況下，車氏的假說在實質面上已經難以涵蓋川普主政以來的美、日、韓關係，也因此放眼未來，美國與日本、南韓的三國互動可能隨著美中對抗的情勢加劇而更加動盪，車氏假說的解釋力也將隨著可能出現的威脅認知不同而下降。



參考文獻



第一節、中文資料

壹、專書

何思慎、蔡東杰等著，趙春山主編，2015年，《東亞區域安全形勢評估（2014-2015年）》，臺北：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貳、期刊論文

王信力，2019，〈川普能重構亞洲權力平衡？解析美國印太戰略的虛實〉，《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5卷第2期：頁67-102。

林賢參，2010，〈沖繩普天間美軍基地問題與日美同盟〉，《展望與探索》，第8卷第7期：頁1-9。

林賢參，2018，〈日印關係與印度太平洋戰略〉，《歐美研究》，第4期：頁47-56。


古詩涵，2017，〈從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看美日新型安全關係〉，《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第11卷第2期：頁17-37。

何思慎，2012，〈日本民主黨政權的中國政策（2009-2011年）〉，《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3卷第1期：頁1-50。

何思慎，2018，〈川普亞洲行後的美日關係及東亞局勢〉，《海峽評論》，第325期：頁23-25。

李大中，2010，〈歐巴馬政府之東北亞政策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31期：頁19-26。

李大中，2019，〈川普的印太戰略與美中戰略競爭〉，《軍事社會科學專刊》，第15期：頁3-14。

- 
- 李瓊莉，2012，〈美國「重返亞洲」對區域主義之意涵〉，《全球政治評論》，第 39 期：頁 87-103。
- 李明，2012，〈美國重返亞太：南韓的視角〉，《海峽評論》，第 261 期：頁 12-16。
- 李明，2013，〈歐巴馬政府的朝鮮半島政策（2009-2012 年）〉，《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4 卷第 2 期：頁 1-52。
- 李明，2013，〈朴槿惠勝選與未來周邊國際安全〉，《全球政治評論》，第 41 期：頁 1-6。
- 李明，2016，〈「薩德」系統衝擊東北亞戰略結構〉，《海峽評論》，第 308 期：頁 48-51。
- 李明，2017，〈文在寅的內政與外交初探〉，《海峽評論》，第 318 期：頁 37-40。
- 李明，2017，〈川普政府因應北韓挑釁捉襟見肘〉，《展望與探索》，第 15 卷第 9 期：頁 14-20。
- 洪銘德，2015，〈美國重返亞洲政策之研究〉，《全球政治評論》，第 51 期：頁 147-165。
- 唐欣偉，2015，〈歐巴馬近期外交政策評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49 期：頁 7-12。
- 晉林波，2012，〈民主黨政權下的美日關係〉，《國際問題研究》，第 5 期：頁 32-45。
- 張景全，2012，〈日美同盟與美國重返亞洲戰略〉，《國際問題研究》，第 5 期：頁 46-54。
- 張凱銘，2011，〈論歐巴馬政府的東亞戰略選擇〉，《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7 卷第 3 期：頁 175-194。
- 張凱銘、廖顯謨，2013，〈歐巴馬政府的亞太政策：門戶開放下的超區域霸權戰略〉，《全球政治評論》，第 42 期：頁 63-90。

- 
- 張中勇，2016，〈川普政府亞洲政策走向的初步觀察與對策〉，《戰略安全研
析》，第 139 期：頁 5-16。
- 黃奕婷、張登及，2017，〈冷戰後韓美同盟變遷之研究〉，《遠景基金會季
刊》，第 18 卷第 4 期：頁 61-112。
- 劉德海，2010，〈近期東北亞安全局勢中的南韓角色〉，《全球政治評論》，第
31 期：頁 1-6。
- 劉德海，2017，〈歐巴馬時代的美國與韓國關係〉，《韓國學報》，第 30 期：
頁 21-43。
- 蔡增家，2017，〈當同盟不再漂流：安倍再次上台後美日關係之轉變〉，《全球
政治評論》，特集 005：頁 25-40。
- 蔡維心，2015，〈美韓同盟的昔與今：從同盟理論觀之〉，《東亞研究》，第 46
卷第 1 期：頁 65-105。

參、學位論文

- 蔡維心，2017，《冷戰後美韓同盟轉型之研究：從權威式同盟理論探討》，國立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

第二節、外文資料

壹、專書

- Binnendijk, Hans. 2016. *Friends, Fo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U.S. Partnerships in a
Turbulent World: Strategic Rethink*. California : RAND Corporation.
- Bong, Youngshik. 2017. "Continuity Amidst Change: The Korea – United States
Alliance." In *Global Allies Comparing US Alliances in the 21st Century*. Ed.
Michael Wesley. Australia : ANU Press.

Cha, Victor D. 1999. *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 : The United States-Korea-Japan Security Triangle*. New York : Studies Of The Weatherhead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Envall, HDP. 2017. "Japan: From Passive Partner to Active Ally." In *Global Allies Comparing US Alliances in the 21st Century*. Ed. Michael Wesley. Australia : ANU Press.

Pettyjohn, Stacie L. 2012. "Expeditionary Defense in Depth, 1990–2011." In *U.S. Global Defense Posture, 1783–2011*. California : RAND Corporation.

Matteo, Dian. 2014. *The Evolution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The Eagle and the Chrysanthemum*. London : Chandos Publishing.

Terrence, Kelly K. & Dobbins ,James & Shlapak, David & Gompert, David & Heginbotham, Eric& Chalk, Peter & Thral, Lloyd. 2014. *The U.S. Army in Asia, 2030–2040*. California : RAND Corporation.

貳、期刊論文

Cooney, Kevin J. & Scarbrough, Alex. 2008. "Japan and South Korea: Can These Two Nations Work Together?"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Vol. 35, No. 3 : pp. 173-192.

Cha, Victor D. & Katz, Katrin. 2011. "South Korea in 2010: Navigating New Heights in the Alliance." *Asian Survey*. Vol. 51, No. 1 : pp. 54-63.

Davidson, Janine. 2014. "The U.S. 'Pivot to Asia'."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 21.Special Issue : pp.77-82.

Goh, Evelyn. 2011. "How Japan matters in the evolving East Asian security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7, No. 4 : pp. 887-902.

Green, Micheal J. & Szechenyi, Nicholas. 2013. "Back on Track." *Comparative*.



- Connection*. Vol.15, Issue 1 : pp.17-24.
- Green, Micheal J. & Szechenyi, Nicholas. 2014. "Big Steps, Big Surprise." *Comparative Connection*. Vol.15, Issue 3 : pp.15-22.
- Glaser, Bonnie S. & Flaherty, Kelly. 2018. "Hurling Toward A Trade War. " *Comparative Connection*. Vol.20, No.1 : pp.19-32.
- Haffa, Robert P.. 2017. "Defense Decisions fo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 11, No. 1 : pp. 25-48.
- Jackson, Van. 2019. "Botched Diplomacy: How America Is Losing Both Koreas." *Global Asia*. Vol14, No.4 : pp. 71-75.
- Kang, David. & Bang, Jiun. 2017. "What Goes Up, Must Come Down." *Comparative Connection*. Vol. 18, No. 3 : pp. 91-101.
- Lee, Lavina. 2016. "Abe'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and Quadrilateral Initiative: 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30, No.2 : pp.1-41.
- Moon, Chung In. 2019. "President Moon Jae-in and the Korea Peace Initiative." *Global Asia*. Vol.14, No.2: pp.10-17.
- Noerper, Stephen. 2016. "Fire, Ire, and Exercise." *Comparative Connection*. Vol.18, No.1 : pp.37-44.
- Noerper, Stephen. 2019. "Friction, Impasses and Projectiles." *Comparative Connection*. Vol.21, No.2 : pp.39-46.
- Nilsson-Wright, John. 2017. "Navigating Turbulent Waters: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for South Korea's New Government. " *Global Asia*. Vol.12. No.2 : pp.18-22.
- O'Neil, Andrew. 2014. "Command Without Control ? Nuclear Crisis Instabilit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North Korean Review*. Vol.10, No.1 : pp.7-21.

Shin, Gi-Wook. 2012. "Identity Politics and Policy Disputes in U.S.-Korea Relation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27, No. 2 : pp. 289-310.

Sohn, Yul & Kang, Won-Taek. 2014. "South Korea in 2013: Meeting New Challenges

with the Old Guard." *Asian Survey*. Vol. 54, No. 1 : pp. 138-144

Sheen, Seong Ho. 2017. "Between A Rock and A Rocket Man: South Korea's

Anxiety." *Global Asia*. Vol.12 No.4 : pp.42-46.

Sakaki, Alexandra & Nishino, Junya. 2018. "Japan's South Korea predicam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4, No.4 : pp.735-754.

Smith, Sheila A. 2019. "Post-War Calm Can't Hold Amid Present-Day Politics." *Global*

Asia. Vol.14, No.3: pp.98-105.

Shifrinson, Joshua. 2019. "Security in Northeast Asia."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 13, No. 2 : pp. 23-47.

Tow, William T.. 2015.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in 2014: Reconciling Rebalancing

and Strategic Constraints." *Asian Survey*. Vol. 55, No. 1 : pp. 12-20.

Wong, Audrye Y. 2015. "Comparing Japanese and South Korean Strategies Toward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 All Politics Is Local." *Asian Survey*. Vol.55, No.6:

pp.1241-1269.

木村幹，2013，〈新政権下の日韓関係：日韓両国は何故対立するか〉，《問題

と研究》，第42巻第4期：頁1-39。

村田晃嗣，2017，〈トランプ新政権と日米関係〉，《問題と研究》，第46巻

第1期：頁1-20。

参、報告書

Armitage, Richard L. & Nye, Joseph S.. 2007. *The U.S.-Japan Alliance Getting Asia*

Right Through 2020.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Armitage, Richard L. & Nye, Joseph S.. 2012. *The U.S.-Japan Alliance Anchoring Stability In Asia*.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Kim, Jiyeon & Friedhoff, Karl. 2011. *South Korean Public Opinion on North Korea & the Nations of the Six-Party Talks*. The 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肆、政府文書

Clinton, Hillary. 2010. *Remarks o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ashington, D.C.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arack, Obama. 2010.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0*.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Donald, Trump. 2017.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7*.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Manyin, Mark. & Chanlett-Avery, Emma & Nikitin, Mary Beth & Taylor, Mi Ae. 2010. *U.S.-South Korea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nyin, Mark. & Daggett, Stephen. & Dolven, Ben. & Lawrence, Susan. & Martin, Micheal. & O'Rourke, Ronald. & Vaughn, Bruce. 2012. *Pivot to the Pacific?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balancing" Toward Asia*. Washington, D.C.: 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0.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10*.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1.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2011*.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2.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4. *Second Missile Defense Radar Deployed to Japan*.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8.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2018*. Washington

D.C.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8. *U.S. Relations With North Korea*. Washington

D.C.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9.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7. *The U.S.-South Korea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9. *The U.S.-Japan Alliance*. Washington,

D.C.: 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20. *U.S.-South Korea Alliance: Issue for*

Congress. Washington, D.C.: 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The White House. 2014. *President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Park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The White House. 2018.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China.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日本防衛省，2010、2013、2018、2019，〈防衛白皮書〉，東京：日本防衛省。

日本防衛省，2018，〈韓国海軍艦艇による火器管制レーダー照射事案〉，東

京：日本防衛省。

安倍晉三，2013，〈Japan Is Back〉，東京：日本外務省。

日本外務省，2019，〈Joint Statement of the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2019〉，東京：日本外務省。

伍、網路資料來源



- Anton, Michael. 2019. "The Trump Doctrine An Insider Explains the President'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In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4/20/the-trump-doctrine-big-think-america-first-nationalism/>.
- Armitage, Richard L. & Cha, Victor D. 2019. "The 66-year alliance between the U.S. and South Korea is in deep troubl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In <https://www.csis.org/analysis/66-year-alliance-between-us-and-south-korea-deep-trouble>.
- Ayres, Alyssa. 2018. "The Quad and the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 <https://www.cfr.org/blog/quad-and-free-and-open-indo-pacific>.
- Asia Unbound. 2019. "Challenging Pile Up on U.S.-South Korea Alliance Agend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 <https://www.cfr.org/blog/challenges-pile-us-south-korea-alliance-agenda>.
- Clinton, Hillary. 2011.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In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 Cronin, Patrick M. 2017. "Trump's Post-Pivot Strategy." *The Diplomat*. In <https://thediplomat.com/2017/11/trumps-post-pivot-strategy/>.
- Choe, Sang-hun. 2018/11/29. "South Korean Court Orders Mitsubishi of Japan to Pay for Forced Wartime Labor" *The New York Times*. In <https://www.nytimes.com/2018/11/29/world/asia/south-korea-wartime-compensation-japan.html>.
- Cooper, Helene. 2019/03/01. "Pentagon Again Suspends Large-Scale Military Exercise with South Korea." *The New York Times*. In <https://www.nytimes.com/2019/03/01/world/asia/us-military-exercises-south>



korea.html.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9. “The Importance of U.S.- Japan-Korea Trilateral Defense Cooperation.”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https://www.csis.org/analysis/importance-us-japan-korea-trilateral-defense-cooperation_

Denmark, Abraham M. 2019. “The U.S.-ROK Alliance and Policy Coordination Toward Chin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 <https://www.cfr.org/blog/us-rok-alliance-and-policy-coordination-toward-china>.

Fackler, Martin. 2011/12/19. “South Korea Urges Japan To Compensate Former Sex Slaves.” *The New York Times*. In <https://www.nytimes.com/2011/12/19/world/asia/south-korea-urges-japan-to-compensate-former-sex-slaves.html>.

Gramer, Robbie. 2017. “Trump Hands Putin a Win at First NATO Meeting.” *Foreign Policy*. In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7/05/25/trump-nato-meeting-brussels-defense-spending-transatlantic-alliance/>.

Glaser, Bonnie S. & Mastro, Oriana Skylar. 2019. “How an Alliance System Withers Washington Is Sleeping Through the Japanese-Korean Dispute. China Isn’t.” *Foreign Affair*. In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9-09-09/how-alliance-system-withers>.

Gady, Franz-Stefan. 2017. “US, Japan Conduct Military Exercise in Hokkaido.” *The Diplomat*. In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8/us-japan-conduct-military-exercise-in-hokkaido/>.

Gady, Franz-Stefan. 2019. “Japan Awards Contract to Lockheed Martin for 2 Solid State Radar for Aegis Ashore Batteries.” *The Diplomat*. In <https://thediplomat.com/2019/11/japan-awards-contract-to-lockheed-martin-for->



2-solid-state-radars-for-aegis-ashore-batteries/.

Hurst, Daniel. 2018. "Forced Labor Court Decision Opens Rift In Japan-South Korea Ties." *The Diplomat*. In <https://thediplomat.com/2018/11/forced-labor-court-decision-opens-rift-in-japan-south-korea-ties/>.

Kim, Jack and Colvin, Ross. 2010/05/20. "South Korea says North Torpedoed Ship." *Reuters*. In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idUSTRE64I26F20100520>.

Keck, Zachary. 2014. "America's 'Military First' Asia Pivot." *The Diplomat*. In <https://thediplomat.com/2014/08/americas-military-first-asia-pivot/>.

Kelly, Robert E. 2014.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US Alliance in Asia." *The Diplomat*. In <https://thediplomat.com/2014/04/unintended-consequences-of-us-alliances-in-asia/>.

Kuik, Cheng-Chwee. 2015. "Decomposing and Assessing South Korea's Hedging Options." *The Asan Forum*. In <http://www.theasanforum.org/introduction-decomposing-and-assessing-south-koreas-foreign-policy-options/>.

Kim, Heung-kyu. 2017. "China and the U.S.-ROK Alliance: Promoting a Trilateral Dialogu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 <https://www.cfr.org/report/china-and-us-rok-alliance-promoting-trilateral-dialogue>.

Kenney, Carolyn. 2017. "Trump's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the Philippines."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In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security/news/2017/06/14/433950/trumps-conflicts-interest-philippines/>.

Kelly, Tim. 2017/12/11 "Russian Military Chief Criticizes U.S., Japan and South Korea Drills." *Reuters*. In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northkorea-missiles-japan-russia/russian-military-chief-criticizes-u-s-japan-and-south-korea-drills-idUSKBN1E50X9>.



- Kelly, Tim. 2019/12/20 “Japan Government Approves Eighth Straight Defense Spending Hike to Record High. ” *Reuters*. In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japan-economy-budget-defence/japan-government-approves-eighth-straight-defense-spending-hike-to-record-high-idUSKBN1YO05N>.
- Kim, J. James & Kang, Chungku. 2019. “South Korean Attitudes about ROK-Japan Relations on the Rocks.” *The 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In <http://en.asaninst.org/contents/south-korean-attitudes-about-rok-japan-relations-on-the-rocks/>.
- Kim, Hyung-jin. 2019. “South Korean President: North Korea, US Both Need to Do More” *The Diplomat*. In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1/south-korean-president-north-korea-us-both-need-to-do-more/>.
- Kim, Tong Hyung. 2019. “South Korea Strikes Back, Removes Japan From Trade White List.” *The Diplomat*. In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8/south-korea-strikes-back-removes-japan-from-trade-white-list/>.
- Lee, Seong Hyon. 2017. “Moon Jae-in’s Foreign Policy & Roh Moo-hyun’s Shadow.” *The Asan Forum*. In <http://www.theasanforum.org/moon-jae-ins-foreign-policy-roh-moo-hyuns-shadow/>.
- Landler, Mark. & Hirschfeld, Julie. 2017/11/06. “Trump Tells Japan It Can Protect Itself by Buying U.S. Arms.” *The New York Times*. In <https://www.nytimes.com/2017/11/06/world/asia/trump-japan-shinzo-abe.html>.
- Larsen, Morten S. 2019. “Tired of U.S. Dependence, South Korea Seeks to Build and Sell Its Own Weapons.” *Foreign Policy*. In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11/01/south-korea-weapons-production-united-states/>.



Miller, J. Berkshire. 2014. “Gang of Three? Why Obama Must Bring Seoul and Tokyo Together ?” *Foreign Affair*. In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northeast-asia/2014-04-13/gang-thr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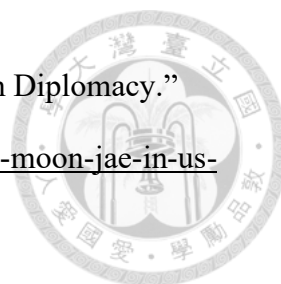
Panda, Ankit. 2014. “US, South Korea, Japan Start Sharing Intelligence on North Korea.” *The Diplomat*. In <https://thediplomat.com/2014/12/us-south-korea-japan-start-sharing-intelligence-on-north-korea/>.

Panda, Ankit. 2019. “Japan Releases Audio of Alleged Radar Lock-on Incident With South Korea Warship.” *The Diplomat*. In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1/japan-releases-audio-of-alleged-radar-lock-on-incident-with-south-korean-warship/>.

Park, Jaehan. & Yun, Sangyoung. 2016. “Korea and Japan ‘s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A Final Touch for the Pivot?” *The Diplomat*. In <https://thediplomat.com/2016/11/korea-and-japans-military-information-agreement-a-final-touch-for-the-pivot/>.

Park, Jumin. 2016/11/23. “South Korea, Japan agree intelligence sharing on North Korea threat.” *Reuters*. In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southkorea-japan-military/south-korea-japan-agree-intelligence-sharing-on-north-korea-threat-idUSKBN13I068>.

Park, Seo Hyun. & Cho, Il Hyun. 2018/06/21. “The Pentagon Has Officially Canceled Military Exercise with South Korea. Here’s What Comes Next.” *The New York Times*. In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8/06/21/the-pentagon-has-now-officially-canceled-military-exercises-with-south-korea-heres-what-comes-next/>.



- Park, S. Nathan. 2019. “Trump’s Penny-Pinching Dooms His Korean Diplomacy.”
Foreign Policy. In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12/10/trump-moon-jae-in-us-south-korea/>.
- Rich, Motoko. & Wong, Edward. 2019/11/22. “Under U.S. Pressure, South Korea Stays in Intelligence Pact With Japan.” *The New York Times*. In <https://www.nytimes.com/2019/11/22/world/asia/japan-south-korea-intelligence.html>.
- Silberstein, Benjamin Katzeff. 2019. “Tensions between South Korea and Japan Benefit No One.”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n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19/07/tensions-between-south-korea-and-japan-benefit-no-one/>.
- Swicord, Ellen. 2019.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Japan and South Korea to Make Up.” *The Diplomat*. In <https://thediplomat.com/2019/10/the-united-states-needs-japan-and-south-korea-to-make-up/>.
- Snyder, Scott A. 2019. “Why the Japan-South Korea Dispute Just Got Worse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 <https://www.cfr.org/in-brief/why-japan-south-korea-dispute-just-got-worse>.
- Tatsumi, Yuki. 2015. “Japan, South Korea Reach Agreement on Comfort Women.” *The Diplomat*. In <https://thediplomat.com/2015/12/japan-south-korea-reach-agreement-on-comfort-women/>.
- Tillerson, Rex. 2017. “Defin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for the Next Century.”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https://www.csis.org/analysis/defining-our-relationship-india-next-century-address-us-secretary-state-rex-tillerson>.
- Takashi, Terada. 2018. “How and Why Japan Has Saved the TPP From Trump Tower



to Davos.” *The Asan Forum*. In <http://www.theasanforum.org/how-and-why-japan-has-saved-the-tpp-from-trump-tower-to-davos/>.

The Genron NPO. 2019. “The Japan-South Korea Joint Public Opinion Poll 2019.” *The Genron NPO* In https://www.genron-npo.net/en/opinion_polls/archives/5489.html.

Wright, John. 2020. “Where No Alliance Has Gone Before: U.S.-Japan Military Cooperation in Space.” *The Diplomat*. In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2/where-no-alliance-has-gone-before-us-japan-military-cooperation-in-space/>.

Yamaguchi, Mari. 2018. “Japan Again Urges South Korea to Overrule Court’s Forced Labor Decision.” *The Diplomat*. In <https://thediplomat.com/2018/12/japan-again-urges-south-korea-to-overrule-courts-forced-labor-decision/>.

日本外務省，2008，〈第8回日韓安保対話の開催（結果）〉，日本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h20/11/1184764_919.html。

日本外務省，2009，〈第9回日韓安保対話の開催（結果）〉，日本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21/12/1204_04.html。

日本外務省，2009-2019，〈大韓民国 過去の要人往来・会談〉，日本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korea/visit/index.html>。

日本外務省，2012，〈日韓首脳会談〉，日本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jck/summit2012/jk_gaiyo.html。

日本外務省，2017/07/07，〈日韓首脳会談〉，日本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a_o/na/kr/page4_003113.html。

日本外務省，2017/09/07，〈日韓首脳会談〉，日本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a_o/na/kr/page3_002213.html。



日本外務省，2018/02/09，〈日韓首脳会談〉，日本外務省，

https://www.mofa.go.jp/mofaj/a_o/na/kr/page4_003747.html。

日本外務省，2018，〈第11回日韓安全保障対話の開催（結果）〉，日本外務

省，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5795.html。

日本外務省，2018/05/09，〈日韓首脳会談〉，日本外務省，

https://www.mofa.go.jp/mofaj/a_o/na/kr/page1_000525.html。

日本外務省，2018/09/25，〈日韓首脳会談〉，日本外務省，

https://www.mofa.go.jp/mofaj/a_o/na/kr/page4_004357.html。

日本外務省，2019/12/24，〈日韓首脳会談〉，日本外務省，

https://www.mofa.go.jp/mofaj/a_o/na1/page4_005531.html。

黒田勝弘，2017/07/01，〈文在寅大統領への「ホメ殺し」 人生のルーツを持ち出し反米、親北、親中にブレーキ〉，《産経ニュース》，

<https://www.sankei.com/world/news/170701/wor1707010017-n1.html>。

加藤弘一，2014/03/21，〈日美韓将在荷兰海牙举办三国首脳会談〉，《日本經濟新聞》，[https://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8559-](https://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8559-20140321.html)

[20140321.html](https://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8559-20140321.html)。

《朝日新聞》，2018/03/16，〈邦人退避協力を要請 日韓安全保障対話〉，

《朝日新聞》，<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3404717.html>。

陸、媒體

《朝日新聞》，2012/08/10，〈韓国大統領、竹島に上陸 野田首相「極めて遺憾」〉